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5-101号

版权声明

本书由陈国新、杨成果、袁群等翻译，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未经许可，不得复制或传播。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归云南大学出版社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历史及其现实意义 转 (英)密尔沃德 (鲍勃)著；陈国新等译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书名原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陈国新、杨成果、袁群译 陈国新、杨成果、袁群译

I ①马 ②密 ③陈 ④陈 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IV ⑥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1 号

书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历史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英〕鲍勃·密尔沃德 著 译者：陈国新 杨成果 袁 群 等 策划编辑：徐 曼 责任编辑：龙宝珍 装帧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4 字 数：400千字 版 印 次：2005年 10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书 号：ISBN 7-5487-2111-1 定 价：28.00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650091) 电话：0871-6503111 传真：0871-650311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言

西方许多评论家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的解体敲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丧钟。然而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总是尽力指出，20 世纪后期的事件反而证明了马克思观点的正确性。因为马克思的方法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核心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十分清楚他所创立的理论框架必须随着时代而不断地发展。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内在变动性，因而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在不断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从局部拓展到国家，最终走向世界。然而，马克思所作出的基本的批判性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同样的有效性和逻辑合理性。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阶级的劳动以及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并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观点，无论是在 19 世纪、20 世纪还是在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其中，马克思还提出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将单向地经历一系列的阶段：首先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然而，马克思坚持认为每一阶段都为下一阶段准备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因此它们都不能被跨越。只有在一个阶段崩溃以后，下一阶段才会在旧社会的废墟中产生出来。俄国革命在俄国经济尚未达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时候就发生了，实际上当时它刚刚脱离封建社会，行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就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早阶段接管了国家政权，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变动性，没有意识到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重

要作用，而这些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列宁试图把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应用到这一独特的环境之中，以建立一个能够通过可控制的资本主义来引导经济发展的体制。这就是列宁所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其目的在于促进市场交换，增加私人财产，并鼓励创业。列宁在 1924 年的早逝标志着这一战略的结束，从此苏联步入了一个导致经济僵化的发展进程。尽管赫鲁晓夫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戈尔巴乔夫在 20 世纪 80 年代都曾尝试改革这一进程，但最终仍然没有能避免苏联解体的命运。

中国的经验与此相类似：中国革命实际上发生在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农业经济时代。在遭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之后，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已开始从探索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转移到建立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实行对外开放的轨道上来。这表明中国已意识到跨越历史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能的，同时也表明中国对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发展战略的毫无异议的认同，即要通过渐进式改革引导经济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因此，上述事件不但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想体系中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反倒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前提及其分析方法的正确性。

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写作的。目的在于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持久的、甚至更强的有效性，并尽力使马克思的理论框架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同时使人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变动性及其必然灭亡的逻辑结论。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际化也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垄断资本主义导致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被其他国家所支配，而且资本通过把生产转移到生存工资最低的国家并把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返回本国的方式来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所有这一切都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誉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并发明出所谓 裁军（没有替代方案）的新名词。希望本书能纠正这种观点，并勾勒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文版序言

运作机制的更加清晰、精确的画面，从而使人们坚定这样的信念：作为其内在逻辑，资本主义最终必将走向灭亡！

鲍勃·密尔沃德
英国普雷顿中部兰开夏大学

二〇一四年 缘月

致 谢

我十分感谢阅读本书的早期手稿并提出宝贵建议的几个同事，尤其是布兰·阿肯逊、保罗·麦可恩和彼特·贝可。我也受益于近几年来与学生们的讨论，这些讨论有助于澄清我自己心中某些方面的疑惑，由此便产生了本书。我十分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并希望能够引起这样的批评，因为只有通过批评才能产生启发。尽管我受到了这些帮助，本书所有的缺点和错误都由我个人负责。

我要感谢允许我使用版权材料的以下出版社：

新左派评论公司：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由本·福克斯、哈曼兹沃斯和庞圭翻译，~~1971年~~英语版；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由大卫·芬巴翻译，伦敦，~~1971年~~英语版；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由大卫·芬巴翻译，伦敦，~~1971年~~英语版。

路特莱公司：表格 ~~1971年~~和表格 ~~1971年~~ 来自于 ~~1971年~~肯伍德和 ~~1971年~~路夫伊德著《国际经济的增长》，~~1971年~~版。

剑桥大学出版社：表格 ~~1971年~~ 来自于 宰 ~~1971年~~加塞德著《英国在 ~~1971年~~—~~1971年~~间的失业：公共政策研究》，~~1971年~~版。

皮尔森教育有限公司：表格 ~~1971年~~ 来自于 ~~1971年~~霍华德和 ~~1971年~~金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哈洛和朗曼出版社，~~1971年~~版。

劳伦斯与韦沙特公司：卡尔·马克思著《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1971年~~英语版。

前进出版公司：卡尔·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源

致 谢

日》，1976年英语版。

牛津大学出版社：表格 1.1 来自于 詹姆斯·考斯怀特和 詹姆斯·路索恩著《是供选择的战利品吗？多国公司和国际生产的地理学》，《牛津经济政策评论》，1982年版；表格 1.2 来自于 戈登·格莱纳斯特和 詹姆斯·希尔斯主编《福利国家：社会开销的经济学》，1982年版；表格 1.3 来自于 詹姆斯·詹姆斯·马修斯著《英国经济增长 1950—1980》，1982年版。

如果有被忽略的版权所有者，我将在尽早时机采取必要的措施。

最后，我要感谢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编辑们对我的帮助和指导，并感谢圣安妮·拉菲克，她在编辑我手稿的时候充满着巨大的耐心和专业精神。

鲍勃·密尔沃德

目 录

一、绪 论	(员)
第一部分 理论和历史	(员)
二、马克思的方法	(员)
三、价值理论	(圆)
四、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猿)
五、转形问题——一些复杂的迂回	(缘)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远)
七、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	(愿)
八、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产品实现危机	(怨)
九、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	(员)
第二部分 历史及其现实意义	(员)
十、垄断资本主义	(员)
十一、失 业	(员)
十二、公共部门	(员)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员)
十四、结 论	(员)
注 释	(员)
专业术语	(圆)
符号的涵义	(圆)
译名对照表	(圆)
参考书目	(圆)
译者后记	(圆)

一、绪 论

在 20 世纪之初，一本探讨马克思著作的经济学意义、哲学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的书，必须解释为什么马克思的著作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毕竟，有人可能会说：资本主义已战胜了共产主义，苏维埃集团已经瓦解，而其遗留下来的国家在金融上依赖于西方世界；中国已经开始充分利用自由市场的进程，并正在逐步脱离国家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观。此外，古巴有严重的经济问题；越南有与市场交换相联系的高度外向型贸易战略；前南斯拉夫则陷入了内战、社会混乱及与纳粹德国相类似的暴行。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不再盛行，随着它的灭亡，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作为重要理论家和哲学家等方面重要价值的修正主义，并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远未处于崩溃的边缘，事实上在财富日益增加和‘民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是唯一能够有效分配资源的制度”。那么，我们为什么必须重读马克思的著作？为什么它在今天就像在 19 世纪后半期一样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答案存在于理论和现实争论的几个层面，要求我们重新评价那种把马克思理论贬低为只是对资本主义有趣却无效的批判之类的观点。所谓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却产生着失业、贫穷、不平等、毒品和性服务的自由市场等问题，而这些都是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它允许国家间不平等的存在，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而一少部分人却奢侈地浪费着稀缺资源的现状熟视无睹。^员资本主义持续地产生着更加频繁和持久的经济衰退，且市场机制失效，破产增加，整个经济都陷入了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全球化，其衰退所影响的地域将日益扩大，以至于中东的事务（如金融市场、就业和收入水平等），对拉美、北美和欧洲有着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因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垮台从而就不存在一种能够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的想法就等于使人类永远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该社会通过刺激和失业来确保持续的利润，通过贫穷来确保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不稳定，因为这些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属性。

并且，我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根本不能清楚地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持续发生危机的原因。经济学家分裂为相互对立的流派，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新凯恩斯主义者，新李嘉图学派，新奥地利学派，供应学派和混沌理论学派（其中包括想通过数学模式计算来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周期危机原因的计量经济学家）。他们都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危机的顽固性，而只是试图发展他们的观点，并运用为他们经济现实主义那一派服务的杂志来诋毁其论敌。^① 马歇尔、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这些仍然代表着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的边际效用学派放弃了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对价值的客观测量，而保留了使用“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这两种手段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方法。现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上仍是边际效用学派革命时期所提出的那些东西，如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瓦尔拉斯关于拍卖式的一般平衡分析以及在自由市场条件下通过主观“测量”个体效用来确定个体商品的价格等。该分析的基础是他们所描述的经济制度是配置稀缺资源的最好、最适宜的制度，因此它可以被当作“经济民主”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人都有投票权，选票采取货币的形式，在相互竞争的商品中进行选择。^② 该进程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所有资源都可得到最有效配置、所有人可以最大发挥自己特长的社会。一些人（尤其是马歇尔）持有与这种理

^① 参考 托哈曼：《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国际社会主义》，1955年第 7 期，第 38 页；马奥麦洛德：《经济学的死亡》，伦敦，1955年。

一、绪论

想相偏离的观点，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任何所需干预，特别是国家的干预，必须与新古典主义所提出的“规律”相符合。该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达到模型最适度所必需的假定前提缺乏现实性，而且缺乏动态性，即在分析中不能考虑到时间因素。其结果是产生一个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统”模型，该模型所需的前提是一些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假定，并对于一个富于变化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去进行静态的分析。凯恩斯挑战了萨伊法则和那种认为供求曲线在定价（尤其是确定工资）中处于首要地位的观点，从而调和了新古典主义理论，但是在承认在某些政策领域（特别是失业问题）仅仅通过市场手段不能使自由市场达到最适度的前提下，他又继承了自由市场的优越性这个中心主题。然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基本上属于新古典主义传统，而且战后凯恩斯学派丧失了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致意见，这自然地导致其重新回到基于新古典主义“正统”理论的战前政策。这导致主流经济理论不能够提出良方来解决他们提倡的经济制度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一些人试图遵循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认为若像 19 世纪 70 年代的“黄金时代”那样，重新运用凯恩斯的干预措施，再加上自由市场的手段，就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①。因此就出现了两种主张，一种主张继续保持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市场，另一种主张改革资本主义，在保留自由市场的前提下通过干预措施来消除资本主义危害社会的因素。显然这两种方法在历史上都没有获得成功，因此在将来也很难获得成功。

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及其后来者的著作对于今天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专业的学生仍然

^① 请参考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剑桥，1998 年 1 月第 1 版；辛西娅·赫顿：《我们所在的国家》，伦敦，1997 年 1 月第 1 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具有重大的意义。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您就拥有了一种思想体系，您可以用它来评价社会的所有方面，考察其历史背景，并挑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派学说。马克思代表着一种社会科学家的传统，他们认为社会科学需要研究的内容不能只包括我们现在所划分的狭窄的一门独立学科，因此，马克思的著作代表着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综合。他的著作在哲学方面继承了黑格尔，在经济学方面继承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在政治科学方面继承了费尔巴哈、蒲鲁东和傅立叶。因此，毫不奇怪，对于哲学家来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对于社会学家来说，马克思又主要是一个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马克思又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家。然而那些给了马克思启发的人们都不会赞同马克思的分析；马克思既不属于黑格尔学派，也不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然而可以说他有两种学派的传统，他的学术贡献是通过那个时代的理论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思考而达到的。因此他的观点是所有社会科学的集成，以至于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可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属于他们那一派。我认为马克思代表着所有的这些学派，但是在本质上，马克思的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依赖于他的经济学，经济分析是其理论的核心。对所有这些原理进行综合所产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理论 and 与众不同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社会科学家可以从各种不同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因此，本书能够让以上不同专业的学生和其他人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并把这种理解运用于关于当今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合乎逻辑、前后一致的讨论过程。

本书被分为相互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有关历史背景下考察了马克思的方法和理论，并讨论了一些难点和争论，这些争论来自于马克思著作中某些部分的不明确性所引起的歧义^獭以及马克思对所谓“正统”理论的威胁所引起的敌对

源

一、绪论

反应。第二部分探讨了第一部分所提出框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着重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看待 19 世纪之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启示。

继第一章绪论之后，在第二章考察了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显示了它是一种独特却又真正合理的分析资本主义内部逻辑的方法。许多人可能会认为马克思完全与众不同的方法有点让人迷惑，但这种方法可以代替那种基于自然科学的经济分析中所采用的方法。该方法包含着黑格尔的传统辩证法，而辩证法在分析中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变动性。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使他认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并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由此他能够构建一种理论，该理论是变动的，它基于经济学并包括了阶级斗争，它认为只有彻底理解系统的整体才能够彻底理解所存在的矛盾。所以我们说马克思的方法非常独特，是对所谓的主流方法的挑战，从而导致“正统”方法对它的不断攻击。然而，为了避免在随后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出现混淆和错误的批评，我们就必须了解马克思的方法，尤其是辩证法和经济结构的首要性，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就是以这两个核心概念为基础的。

在第三章我们探讨了根植于 18 世纪、19 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价值理论。然而价值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特有的，价值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是因为产品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才采取商品（几乎完全为了交换而生产）这种形式。激烈的争论随之而来：首先，劳动价值理论是否有根据？其次，要得出资本主义利润起源的结论，劳动价值理论是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认为，价值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不是因为如果没有它马克思的理论就不能成立，而是因为运用劳动价值理论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剩余价值的生产及该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分配。因此，如果没有劳动价值理论，我们的分析就达不到足够的深度，由此开始了我们在第四章的讨论。在第四

章我们探讨了马克思是怎样地通过批判古典经济学、陈述古典价值理论中的根本缺点来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的。这包括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资本理论、工资理论、竞争理论和所谓的“转形问题”，从而使他能够着重指出古典经济学中的逻辑混乱，纠正这些根本错误，并构建特定于资本主义的综合理论。

第五章讨论了马克思著作中最有争议的部分——转形问题。我们认为这些争论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价值转变为价格的说法是马克思分析中的根本缺点；另一类则认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被误解、被误释了。因此，本章试图通过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所写的内容来紧密仿效他的步骤，随后本章又讨论了那些对他的批评和所谓的“解决方法”，以揭示那些把它当作马克思理论的根本缺点的人们为什么要采用“复杂的迂回”。随后在第六章我们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动性来论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探讨的主要特点。我们从发展阶段的概念和原始积累的作用开始，分析了圈地运动的历史以及最近关于原始工业化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和原始工业化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有关争论。通过考察多边贸易的作用（其关键部分是奴隶贸易），我们可知国际贸易是原始积累的一个因素。在解释资本家获得生产资料的方式之后，本章又考察了马克思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模型，该模型既是一个静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又是一个日益增长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我们强调马克思在这一部分并非是为了探讨这个增长进程，而是希望揭示生产阶段中产生的利润是怎样在流通进程中实现的，并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动特点是历史和不断变化着的生产关系的产物。第七章从资本家积累财富的欲望和竞争进程促进了创新和在生产中引进节省劳动的技术的角度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变动性。这里认为资本家角色是进行积累的社会动力，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因素，这与那种认为资本家进行积累的原因是其避免挥霍的正直

一、绪 论

品格的理论正好相反。随后又解释了积累水平是怎样确定的，积累与创新的联系，积累怎样导致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出现以及失业的关键因素等。第八章讨论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产物——产品实现危机。本章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性质怎样地导致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违反了资本家的个人愿望，事实上正是资本家扩大利润率的愿望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我们从资本有机构成（这与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概念有关）的角度考察了这种趋势，由此，在资本技术构成上升的过程中生产力得以增长，而同时资本价值构成将会下降。一些人认为这种分析有问题，但是马克思在定义资本有机构成这个概念之后能够清楚地揭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是怎样地因原料价值变化或生产技术的改变而增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危机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价值的实现问题，它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概念，但马克思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待它，把它作为特定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概念。这形成了马克思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波动的基础，其根源有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外的震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内部因素，而后者更加突出。尤其是购买力的缺乏降低了资本家实现在生产阶段所创造剩余价值的的能力，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剩余价值生产出现了许多困难。

在第一部分的结束我们探讨了本世纪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这两个人都从马克思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此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卡莱茨基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功能和该制度所包含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过剩生产能力、商业周期以及停滞和失业的倾向。其方法的核心是生产关系、达到和维持资本主义充分就业的政策影响以及资本家对基于该政策的政府战略的反应方式。他区分了商业循环的两个时期，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其衰退期可以被克服，但结构危机就不能被克服。卡莱

茨基认为投资是其关键因素，因为尽管投资增加了有效需求，但是由于它增加了资本积累，从而导致了过剩生产能力，因此也是危机的来源之一。这种动态进程导致了周期波动。并且他能够揭示该循环过程中的平均就业率将低于充分就业的峰值，认为劳动储备大军和过剩资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现象。另一方面，皮罗·斯拉法试图揭示转形问题是怎样地因为从生产条件和收入分配的知识直接得出价格这个过程而成为一个“复杂的迂回”。因此，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转化为价格、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是多余的，损害了马克思的根本法则即正利润反映了正剩余价值并被正剩余价值所反映。这就给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若把斯拉法的分析置于平衡理论框架之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使它对马克思的批判显得软弱无力。

我们在第二部分的开始探讨了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过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探讨资本以合并和吞并形式日益走向集中的历史之前，我们解释了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其后是关于全球化的讨论，这虽然不是一个新现象，却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对此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使民族国家被边缘化了；第二种观点认为为了获取对市场的领导权，资本家企业把竞争扩展到国际领域，从而需要民族国家的政府为了资本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职能以推动国际合作。第十一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以马克思的观点讨论了失业或叫劳动储备大军的关键因素，揭示了与其他有偏见的模型（比如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模型和失业的滞后模型）相比，这种解释更能令人信服。第十二章我们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公共部门问题，解释了国家作用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揭示了国家被资产阶级的要求所影响，从而为资本主义的繁荣提供了必需的环境。尽管马克思关于国家作用的问题论述不多，我们还是解释了马克思的处理方法，这种自相

一、绪 论

矛盾来自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资本家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关于公共部门的作用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新古典主义认为国家干预越少越好，而社会民主党则认为只有国家干预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无秩序性并在社会中统一思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下，二者皆不适用。在本章的结束部分我们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公共部门问题，并认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对单个国家的调控能力太乐观了。福利国家的危机（如第十三章所述）表明，由于资本主义不断发生危机，它必须找到解决该制度固有矛盾的办法（其矛盾是：由于资本主义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有一定的失业，因此福利制国家就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环境不相适应）。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一，通过对在业者收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以便维持无法劳动者的最低收入；其二，废除国家福利制度，并允许私人企业来承担这个责任。若实行前者，将会引起一个价值实现危机，并可能会引起动力危机；而实行后者需要工人阶级骤然降低其期望值，并且需要对私营企业家进行一次道德的再教育，使他们懂得为什么个人在提供福利方面的道德责任比集体更重要。本书认为是历史造成了这种局面，因为福利制国家的产生是为了与工人达成和解以便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战后重建提供条件。然而这个传统却以福利制国家的形式延续了下来，即使 1980 年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也没有把它废除掉。

本书的结论把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串在一起，并认为尽管有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的争论数不胜数，它仍然是一个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富有成效的、合理的框架。现在仍然有许多研究工作需要我们去，尤其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兴起以及在全球剥削下落后国家所面临的形势等方面。我们认为，在 20 世纪之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对于当代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专业的学生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怨

事实上，它比那些追随新古典主义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者或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要高明得多。

本书在许多方面纯粹是我对世界形势的个人看法，我从现今世界的经济结构、政治组织、哲学观点及其对我们的启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考察，但它不是对有无限可能的未来社会的预先规定。本书追随马克思批判了当今社会，并根据分析的逻辑，认为某些特定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并不预测资本主义会在哪一天哪一刻垮台，并在其废墟中产生一种特定的制度。这本书不是为了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而是希望它能够引起讨论，并挑战教育机构规定学生所必修的和经常阅读的许多主流经济理论。

第一部分 理论和历史

二、马克思的方法

导 言

马克思的方法代表着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与众不同的方法，人们常常认为它可以代替那种基于自然科学的经济分析中所运用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是通过哲学来研究经济学的，且他的分析根源于社会理论。结果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比其他经济思想流派更具有综合性。然而，这种方法的与众不同之处引来了“传统”方法的批评。例如，鲍博认为马克思采用了“历史决定论”，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规律，从而导致马克思采取了“经济决定论”，而这一点是鲍博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认为人类行为具有个性特点，从而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①然而，鲍博的指责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因为马克思无疑将会同意鲍博的论据可能会成立，但是他会指出，人类在创造历史的时候，他们所处的条件却不是他们所能够选择的。相反的，人类会被与他们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所限制。

因为考虑到历史不断变化的进程和马克思是在 19 世纪著书

^① 鲍博：《推测和辩驳：科学知识的增长》，第四版，伦敦，1963年。见鲍博《推测和辩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一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写作这一事实，或许对待马克思著作的最好方法是把它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应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必须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现在的情况。有人可能会说列宁正是采用了这种做法，在一个资本主义还未成熟的国家里运用这个框架，意大利的葛兰西和匈牙利的卢卡奇也是这样。这也包括中国的毛泽东和古巴的卡斯特罗。他们的共同之处并不是他们有同一个不可改变的意识形态，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仅把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当作理解他们所处社会制度的出发点。事实上，在运用一个极为重视历史的方法论的时候，却称此方法论可以预测以特殊方式依赖于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就像任何其他思想流派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一个独特的、完全独创的理论。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批判地接受各种各样的已有观点而得到发展的，其结果是马克思的独特性，但是它根源于早期的哲学、社会理论和经济学。

黑格尔的传统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致力于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并因此而使马克思认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尽管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人”与“公民”、“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类，然而他认为市民社会、经济关系领域背离了政治社会进程，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核心即经济强制的崩溃所导致的。因此，“自由”劳动力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得以出现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可被看作是经济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从马克思开始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起，他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来发展自己的论点，日益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理解市民社会的经济机制，并逐渐地把这种经济机制当作社会发展的动力。

黑格尔在 18 世纪早期所关注的是“表象”与“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的方法

别，认为表象或现象并非一定是假的，但它可能会误导人们；而本质是隐藏于所观察现象之下的基本有机关系^①。黑格尔认为历史不是历史事件的随机时序，而是完全由客观规律所支配的进程。我们只有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客观的规律。这个进程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许多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包含着推理的辩证形式，但是在黑格尔这里，辩证法是一种推理的自我否定和自我产生的进程。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里，真理（绝对观念）是整体，这个整体通过一系列概念和意识形态的辩证演化，从最简单的东西向最复杂的东西逐渐展开。这种概念演化开始时显得不完整且相互矛盾，随后逐渐演化到比较完整的概念，此时又产生了新的矛盾^②。人类历史是绝对观念借以达到自我意识的工具，但是人类不是这一进程的主题。

黑格尔在提出辩证法的时候，明确地表达了辩证法的三条规律。第一条规律是关于由量到质的变化和由质到量的变化，其中，新质产生于表面上并不显著的量变。因此，持续的变化只有到发生质变的那一点时才会改变事物的性质。辩证法的第二条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黑格尔认为运动产生于矛盾，现实的矛盾形成了一个统一整体。因此，表面上只是昙花一现的事物往往是整个正在进行的进程中的某一部分，且是此进程的关键因素。因此，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就是探求由固有矛盾所产生的变化和运动。第三个规律通常被称为正题—反题—综合，其较为正式的名称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最初的理论被与其相反的、矛盾的理论所代替，然后又由一个综合了论题因素和对立面因素的理论所代替，即“综合”。

黑格尔认为，我们只有通过从整体上考察矛盾的有机进程才

^① 见黑格尔：《方法论和经济学：一个批判的序言》，伦敦，配林出版社，1828年，第155页。

能够理解现实。因此，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可用对立双方的矛盾来解释。这些矛盾在综合阶段相互妥协，而这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历史在本质上是推理的演进，并且每时每地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观点。因此，观念的辩证发展是历史的原动力。然而黑格尔的著作特别地晦涩难懂，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许多不同的黑格尔派之间的争议，尤其是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哲学界。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保持着联系，该派强调黑格尔哲学中的变化因素，而不是那种把普鲁士政府尊为神和历史顶点的保守解释^①。然而，尽管马克思的历史观继承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变化因素，他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黑格尔的“唯意志论”，这种观点认为“精神”或“意识”第一，物质第二。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以及《巴黎手稿》（1845）的结论部分中明确地批评了黑格尔哲学“神秘”的一面。马克思像费尔巴哈那样把黑格尔哲学比做神学，因为他认为这两者都是人性的异化形式。尤其是黑格尔把人类的思考映射为一个虚构的东西——绝对观念，而绝对观念又产生了经验世界。

关于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程度的大小现在仍有许多争议。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且其早期作品受黑格尔的影响更加明显。^②然而，在《资本论》中我们很难辨识出这种影响的痕迹，这导致一些人认为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主要在于词汇方面。索维尔认为《资本论》受黑格尔影响仅仅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变动性的强调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此，马克思辩证法的特点与黑格尔的并不相同：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他甚至在观念的

^① 恩格斯：《马克思 资本论 导读》，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70 页。

二、马克思的方法

名称下把它变成了独立的主体)是现实的创造主,而现实只是创造主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性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性的东西而已。”^①

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开始时是一种对黑格尔浪漫唯心主义的反应,关于黑格尔主义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点是它涉及历史和社会变化,而这二者是哲学态度的核心。马克思保留了历史和社会变化的观点而批判了其唯心主义的成分。

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从黑格尔那里马克思学到了辩证法,这种影响在其早期著作中特别明显,他的观点主要在 1844年至 1845年期间得到表达,并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1844年他写了一个粗略的草稿即《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或《巴黎手稿》,在这里他集中探讨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提出这种关系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的。此时马克思也受到黑格尔的批判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影响,吸收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或人种的观点即人的再生产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使生产从属于非人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这是违反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自然关系的。其本质是,随着前资本主义生产让位于社会生产,工人(生产者)远离于最终产品,远离于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因此被劳动产品所异化。在《巴黎手稿》(1844)关于异化的较长的讨论中,马克思谈到人的异化:被劳动、劳动产品和其同事所异化。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用单独的章节来讨论异化,相反,它是一个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的概念。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认为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之一,劳动因资本家的剥削而与劳动者相异

^① 译文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95年版,第100页。

化，工人聪明才智的潜能被生产资料所异化以及商品购买人这种异化。在第三卷，他认为随着资本积聚发展成为资本的日益集中，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从它成为资本家借以获得权利这个意义来说它被异化了，而工人被生产条件所异化。

在 1845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文章是对他们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明确的阐述。从 1845 年开始，马克思尽力地进一步发展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陈述的基本框架：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

这个框架开始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观点：为了生存人们必须生产生活资料，为此他们需要以劳动分工的方式一起工作。因为生产的任何发展阶段是历史的产物，所以生产的发展伴随着合作形式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而发展。因此，社会是通过以不同财产形式所区分的前后相继的阶段而得到发展的。在古代社会，社会财产

^① 译文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845年版，第 108-109 页。

二、马克思的方法

基于对奴隶的剥削；在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基于对农奴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私有财产基于对毫无财产的雇佣工人的剥削。这些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代表着比前一阶段更高的生产发展状态，但每一阶段都产生着使下一阶段的到来成为必需的条件。

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但是其最著名的总结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1859)这篇文章里：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

出现的。”^①

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认为经济结构可以解释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社会政治革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关系变得不再适应。然而，参加这场变革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而是从其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虽然马克思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明确说明，但是马克思认为任何生产方式都涉及与阶级分化相关的劳动分工。阶级制度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而这个生产力是能够生产出剩余产品（定义为超过确保再生产那个产量水平所需的产品）的生产力。最主要的阶级关系总是一个或更多阶级剥夺其他阶级所生产剩余产品的那样一种阶级关系，核心的阶级关系是剥削关系。其主要的理论困境在于在有一整套公民自由制度的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下怎样确定剥削进行的方式。因此，生产关系可被解释为阶级关系，且采取财产关系（法律术语）的形式。阶级关系形成了政治上层建筑产生的真正基础，且与此基础相对应形成特定形式的社会意识。因此，核心制度是生产资料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因为它使剥削阶级控制国家成为可能。从而，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来自于统治阶级，支配的观念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物质关系的体现。马克思把这种观念的特性描述为“意识形态的”，此阶级理论也包括主导生产方式变化的历史发展规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与它所处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统治阶级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在一个冲突的过程中，能够允许社会生产更大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就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这种矛盾和随之而来的阶级冲突在意识上是通过思想斗争来表达的。因此，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以虚假的意识、思想来

^① 译文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95年版，第159-160页。

二、马克思的方法

表现。换言之，参与社会生产的人们不自觉地通过他们自己的活动来创造和再创造社会结构。然而，这种社会结构与这种活动所创造的可能性发生了冲突，他们通过对他们本身的真正历史重要性进行幻想来解决这些矛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冲突中的阶级不能够理解斗争的真相，而是把它当作不同信条或原则的斗争，就这样，阶级利益的冲突以此种方式反映于意识形态框架，以至于看上去仿佛原则的斗争是唯一有效和合理的因素。

经济结构的首要性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可用经济结构的重要性来解释，其中包括社会意识的主要形式，正是该理论的历史品质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属于唯物主义。社会制度从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中产生，因此社会制度一定能够允许生产关系及其所含阶级关系充分发挥其作用，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将因不同的经济结构而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雇佣劳动在阶级关系中必须“自由”，因此选举民主制给人们以通过议会实现行动自由和平等代表的幻想。然而，这仅仅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并延长了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形成的阶级关系的寿命。例如，在封建制度中，这种行动和代表的自由是不必要的，因为那种阶级关系是一种直接由统治阶级控制的束缚劳动的关系。

在法律领域，据说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人人平等，但事实上它却被统治阶级所控制。法律的指导原则是保护财产权和执行由生产关系所确立的契约，因此国家的统治权通过法律关系而得到维持，而这种法律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社会只能根据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这种改变是通过一个辩证进程而进行的，但多少总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给冲突的根本原因戴上了面纱，因此，国家总是不断地得到改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以满足生产关系的要求，以便隐藏冲突的真正原因，并延长现有经济结构的存在。马克思认为这一点也适用于法律领域，法律领域虽在表面上是半独立的，但事实上它也被其所处的经济结构所决定。图 10.1 从概念上说明了这一点（输入值是历史），解释了这个结构是怎么得出的，输出值是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因此，要理解社会的个别方面，就必须理解其结构的整体。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仅仅是由其基础即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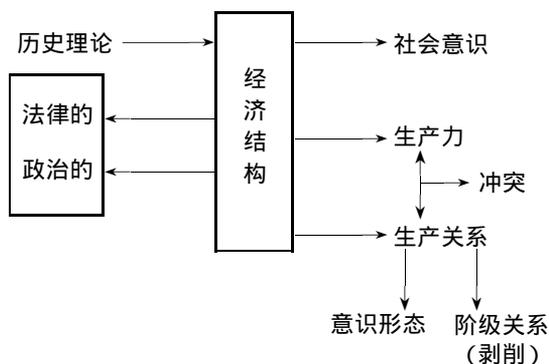


图 10.1 经济结构的首要性

在经济学方面，马克思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属于剩余传统，因为其基本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剩余的起源、数量和增长。在此，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把经济学研究置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的最早尝试，马克思认为这一点使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方法论上讲更加有效实用^①。布劳格认为《资本论》中的推理方法与李嘉图的《政治

^① 参阅霍华德和基尼主编：《马克思经济学：说明和评论选读》，莫斯科自修大学，莫斯科，1972年版，第127页。

二、马克思的方法

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所用的相同^①。马克思的许多经济方法包括着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批评，批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形式，批评他们尤其是李嘉图不能够前后一致地运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论原则。

“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量，资本所以被生产出来，只是因为它能够和利润一起被生产出来。因此，英国的经济学家为利润率的下降而忧虑不安。”^②

“这种〔利润率下降的〕单纯可能性使李嘉图（同样使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学派）忧虑不安，这恰恰证明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有着深刻的理解。李嘉图被谴责为对‘人’漠不关心，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这恰恰是李嘉图最有意义之处。”^③

剩下的问题是，斯密和李嘉图是马克思的先驱呢，还是马克思的理论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该问题是经济思想史学家之间长期争论的主题，但事实上对于我们现在的讨论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我们只要能理解马克思把他的经济学研究牢固地植根于古典传统，但他的方法与斯密和李嘉图所采用的并不相同这一点就可以了。然而我们可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之间有许多相似处和不同点，这一点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更加丰富、实用。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

支配马克思经济分析的一个主要思想是生产领域为经济总体的根本，他是根据他对科学以及科学研究的本质的理解而得出这

① 配布劳格主编：《经济理论回顾》，第 缘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员圆年，第 圆页。

② 译文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员圆年，第 猿页。

③ 译文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员圆年，第 猿页。

个想法的。马克思把科学当作一种通过调查事物表象背后的现象来获得知识的进程。这种进程被描述为从表面世界的复杂性开始，然后构造最简单却又最抽象的概念。由于概念之间的矛盾和相互联系，复杂性不断产生和发展直至表象的复杂性被再生产出来。这个抽象过程产生了与物质现实一致的一系列概念以及概念的逻辑顺序，由此可见，它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之外的纯粹唯心主义的进程。法因和哈里斯从两个层次结构的角度来探讨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从简单到复杂或从较高抽象到较低抽象进行思维所产生的概念层次。第二个结构是一个与真相及真相之间真实的决定关系有关的现实层次。尽管这两个层次结构之间并不是以简单方式直接相连，但是我们可以说二者之间有某种特定的、必然的联系。

“这两个层次结构之间的必然联系是由于抽象的层次等级并非任意确定。它是关于现实的理论，同时又是该理论的结果，因此与正在分析的现实有某种特定的关系。这并不能保证理论的‘真实性’，但同时它排除了那种认为概念的任何层次结构之间没有区别的相对主义观点。”^①

因此，马克思强调了一种观点的重要性，这种观点虽然本身不是完全根据经验的，但却对正确理解经验世界十分关键。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点是马克思的观点并非是让事实完全从属于理论，因此公正地说，他的观点是辩证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认为全局或总体比构成它的部分更重要。因此，整体可被当作赋予部分一系列属性的一组关系，部分若分离开来就得不到这些属性。从而，要想充分理解一个系统，我们要看的就不是该系统的部分，而是要看该系统的整体；要获得对系统某部分的彻底理解就必须

^① 法因和哈里斯：《重读资本论》，伦敦，企鹅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二、马克思的方法

理解整体。整体具有内部改变的能力，因为人类现实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个既定的状态，所以部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变化的动力，正是部分之间的冲突改变着整体，因而人类历史总是处于“变动”的状态，其中，整体内部的否定因素是前进的动力。

马克思不是直接地以其他事实来解释现实的事物，而是从并不直接可见的实体的角度来对其加以解释。因此，在马克思的观点和想要解释的经验事实之间有一个中间阶段。该中间阶段包括一个理论结构，该结构与一些虽定义明确却看不见的因素有关。首先，定义的准确性使这个理论结构与想像分开；其次，其不可视性又使它与想要解释的事物分开。这种方法并非马克思独有，它是一种被称做唯物主义的普通方法。唯物主义的主要对手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力求通过形成理论来解释经验现象。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由涉及可视因素之间关系的规律所组成。它基于一种信念，认为科学知识仅仅适用于可见的物体。因此，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理论必须被限定于与经验事实有关的话语。与该方法完全相反，马克思从不可视范畴的角度形成了必然性的机制。这个机制构成隐藏于经验常规之后的“本质”或“隐藏的本体”。关键是，马克思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唯物主义形式，其表现是这样一个事实：他的理论是一个社会理论，经验现象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得以解释，而社会关系有其自己的规律来支配个人以及它所包含的自然实体的特点。然而，这些社会关系本身不能被归结为可视实体，正是马克思方法论的这一点导致其方法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决定论的。

马克思的决定论

“决定论”这个词并非一定意味着观点、选择和决心等不存在。它主要指主观并不能起一个独立的作用，主观只是一个人类活动的真正决定因素的传输媒介。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纯粹采取

一种决定论立场，那么他一定会把个人仅仅作为社会力量的承受者。然而，马克思却认为人类获得了对其环境的有意识的控制（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达到对人类自身的控制）。第一眼看上去这显得有点自相矛盾，人类有意识的主观决定的作用被马克思抬得很高，这违背了决定论的要求。然而在其他地方，马克思仿佛又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人类自主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赋予历史以二元论。事实上，这并不矛盾。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关键意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巨变一样，都由同一种力量所引起的，因此，它的兴起是必然的。然而，无产阶级的独特历史作用是它要结束史前时期，它被当作人类意识起决定因素的第一次历史行动。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一场阶级革命，同时又是一次反对人类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生存条件的革命。这种意识是无产阶级所处社会环境的产物，其内容是对非人的生存条件以及非人化根源的真正反映。因此，它并不像以往的革命阶级那样受虚假意识或意识形态的虚幻方面所支配。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从生产资料意义上来说使用“资本”的生产方式。相反，他用更准确的词汇（包括生产力的私有产权等词汇）来定义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属性结合起来可以定义资本主义：（葬）一种商品生产的制度；（遭）一种雇佣劳动制度；（糟）一种贪财的制度；（凿）一种理性组织的制度。但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市场交换来协调“自由行为者”的经济行为的制度，因此它必然要求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其劳动时间使用权的雇佣劳动制就必须存在，因此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过程就是剥夺劳动者生产资料的过程，这个过程把社会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变为资本，又把小生产者变为雇佣劳动工人。马克思把这个过程描述为通过圈地运动以暴力方式剥夺农业人口的所有

二、马克思的方法

权，并通过国家立法强迫这些被剥夺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通过奴隶贸易、殖民化和海盗行为来创造增加商业利润的条件。这导致了财富的积累，而这些财富能够被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马克思把这个进程叫做“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变动的，它通过增加技术知识和扩展市场关系作用的范围而使经济得到快速的增长。然而，它也包含着自己不能通过内部改革来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使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和私人剥削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由于专业化和市场交换的扩展，生产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与此同时，处于支配地位的财产关系又确保利益和动机是私有的。这种矛盾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就是利润率的日益下降和失业率的不断提高，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又往往使其更加突出。关于后一点，我们可以说凯恩斯只是重新强调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但他只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有偏见的分析。

小 结

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适用于社会理论的各个方面，所以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更加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黑格尔那里马克思获得辩证法的重要概念来作为他分析的基础，并由此发展了历史理论，然而它并不纯粹是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而是通过批判黑格尔而得到的方法。因此，这种分析是动态的，却又以阶级冲突和经济结构的重要性（其本身又是历史理论的结果）等为其基础。因此，我们只有理解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后，才能够理解社会的所有方面。学习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大学毕业生首先学习微观经济学，然后才学习宏观经济学，因此他们可能会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所迷惑。马克思认为，这种学习顺序是不合逻辑的，是一种错误的假定，因为要获得对任何体系的彻底理解就必须首先集中注意系统的整体，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理解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那些赋予整体以变化能力和变动性的局部矛盾。在这方面，那些采用个人主义、弄虚作假甚至用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研究经济的人不能够使他们的主要方法以现实为基础，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毫无基础的，缺乏经济或社会分析的相关性。

三、价值理论

导 言

在过去一百二十多年中，关于价值源泉问题的讨论一直都是被边际效用理论所支配，该理论的创立者主要有：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0）、门格斯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0）、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1874）。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价值源泉的讨论一直被各种解释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支配。因此，二百多年来，关于商品和服务为什么有价值以及怎样决定它们价值大小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相反，新古典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主观的边际效用理论。主观的效用是个体或家庭通过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所获得的一种满意程度。它基本上可以量化，而个体获得商品和服务是为了提高他们自身的效用。因而每个人似乎对不同的商品和服务有着不同程度的偏好，每个人都是他自身效用的最好的评判者^①。这就有一种可能给相对众多所要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估算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着从这些商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效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独立于新古典主义教科书的消费世界之外的一种“值得怀疑的体验”^①。然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效用”被认为是一个有价值的物品的基本要素，但不决定于它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产生于稀缺性和生产成本。如李嘉图说：

“商品的价值，或与其他商品交换的数量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尽管效用是商品绝对必不可少的，但效用不

^① 托马斯·皮凯蒂：《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个极端的理论》，载《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换句话说，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它就没有交换价值，即使它是稀缺的，或者生产这种商品需要耗费一定量的必要劳动。”^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关于“剩余价值的取得途径”是什么，他们认为对价值和分配理论的阐述都与一种经济制度能产生剩余价值有关。也就是在生产中生产一定量的超过生产成本的剩余。然而问题是要揭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和分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起源于资本家强迫工人劳动的时间超过他们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时间。因此，要衡量剩余，价值理论是必需的，借此我们可以比较不同时期剩余的多少、组成和分配^②。

对马克思而言，价值理论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因此，价值的概念对于他解释盛行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十分关键。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包括历史上的一切社会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经济概念的历史相对性。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价值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产品”与“商品”是有重要区别的两个术语，因为在一切经济形态中都生产产品，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才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为了交换而专门生产的产品。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马克思采用的价值理论体系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它们是商品的两个因素。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商品靠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人类需求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

① 罗斯拉法主编：《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107 页。

② 休萨多尼主编：《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和现代政治经济学：英国哈科特论文选》，伦敦，1981年版，第 107 页。

三、价值理论

商品的这种特性：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①

马克思清楚地阐明物体的有用属性是历史的产物，所有有用的东西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这样，一种物可能有多种有用性。然而，对马克思而言，使用价值不是一个纯粹的主观概念，因此不能孤立地存在于消费者的头脑中。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②

商品生产者在交换他们产品的过程中，与其他商品产生了一种数量关系，马克思把这种关系叫做交换价值。在商品生产中，生产的社会特征通过商品交换表现出来，商品交换活动同时也是生产者劳动的交换，商品交换关系也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因而，马克思的价值观念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体现。这样，商品的社会性方面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对此，马克思作如下表述：“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③ 因而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在商品市场上同另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12月第1版，第181-18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12月第1版，第182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12月第1版，第182页。

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一系列比例。

“传统”经济学认为，商品满足人类需求，也就是物的有用性决定了它的使用价值，与生产商品需要的劳动量无关。正如我们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样，交换价值自身的存在是以不同使用价值相交换的数量关系而存在，这种数量关系随着时间、地点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为了说明这些，我们假定有两种商品：铁、谷物，他们之间的交换比例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谷物等于若干量的铁，如：

员夸脱谷物 越曾吨铁

这个等式说明，在 员夸脱谷物和 曾吨铁这两种不同的物质里面均具有某种等量的共同东西，它既不是铁，也不是谷物，但谷物、铁必须与它等量，谷物、铁都必须能转化为这第三种东西，抛开使用价值，这两种商品唯一的共同属性就是二者都是劳动产品。因此一个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体现在里面。因而，可以说一种使用价值或有用物体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人类抽象劳动体现、物化于其中。价值量的大小可以用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周、天、小时等作为尺度。我们不应混淆价值与价格这两个概念，一物可以有价格而没有价值，比如：一片未开垦的土地因没有人类劳动凝聚其中，所以，它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

因而，商品的价值是由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使用现代机器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所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时间越少，商品的价值就越少。商品的价值不是固定的，它随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熟练水平的劳动，但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因此，凝聚了等量劳动的不同商品，具有同等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表现为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差

三、价值理论

异。有用劳动产生使用价值，因此，不同的具体的有用劳动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商品生产社会存在着复杂的分工，不同的个体参与不同的工作，相互交换他们的产品，但商品交换不是分工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即使没有通过市场进行的商品交换，分工仍然存在，即使没有分工，有用劳动仍然存在^①。然而，马克思运用“社会劳动分工”这一术语来特指相互出售其产品的独立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商品社会，不同有用劳动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生产交换价值，劳动本身创造价值，马克思称之为抽象劳动^②。

劳动力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唯一可以出卖的商品就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单位来计量，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这样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凝聚在单个商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因此，价值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个别现象（“正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它是个别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是商品，资本家应给劳动力支付工资，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必要时间决定，这样，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最低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加上教育和培训费。换句话说，生活资料必须使劳动者个体能维持自己的正常状态。由于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自然需求也就不同。然而，这些“必要”需求的数量和范围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劳动力商品价值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因损耗、劳累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必须至少由等量的掌握同等技术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活资料必须包括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转化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劳动力价值随生活资料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必要时间量的变化而变化^③。

剩余价值的起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是生产交换价值，尤其是以交换价值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个社会过程。价值生产开始于获得劳动力商品和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通过出售所生产的商品来实现的^馐。生产劳动就是用货币资本买来的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的劳动，不仅生产一个工资所预付的价值，而且也生产一个高于此水平的价值——剩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家雇用劳动力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得利润。生产劳动不是由生产的产品所定义的，为个人消费而付出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因为它的交换没有税收，也没有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前者采取商品的形式，而后者采取产品的形式^馐。货币的角色也有所不同，在生产劳动中，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而在非生产劳动中货币是市场交换的媒介。因此，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非生产劳动是微不足道的。若劳动力作为非生产劳动而被买卖，它是一个产品；但当劳动者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时，它将采取商品的形式。

当资本家带着一定量的货币（馐）到市场购买生产资料（馐孕）和劳动力（蕴）时，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就开始了，此时货币作为资本而预付。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后把它作为价值的生产者间接使用，当资本家得到了原材料、机器和劳动者时，这些商品采取商品资本（悦）的形式。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把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而当把这些投入生产过程后，商品资本又转化为生产资本（孕），即：



而后，生产过程把投入转化为产出，这个产出可以用劳动的
猿

三、价值理论

内容来测量。该产出被资本家占有，采取商品资本（悦乙的形式。投入（蕴和 酝孕）转化为产出，这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当资本家出售完产品时，商品资本（悦乙又转化为货币资本（酝乙回到资本家手中，且有一个额外的增加值，这就是利润，即：

酝→悦→悦乙→酝乙

（一般来说，酝孕酝，悦乙悦悦）

由于预付了货币资本，且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因此最后的产品也属于资本家。因此，生产成本（酝）与总收入（酝乙之间的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表面上好像所有的投入（蕴和 酝孕）都对最终产品作出了贡献，但实际上利润的来源是一种涉及购买劳动力的阶级关系，剩余价值源于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剩余劳动力的无偿占有。资本家把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同时购买回来，因此劳动者在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工作时间内完全受资本家支配。劳动生产成了资本生产的同义词，表面上资本家购买的生产资本的所有成分都对利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因而好像资本家占有利润是合情合理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劳动者又生产出了资本家所预付的工资，使资本家可以重新雇用劳动者，因此，劳动力再生产出了自己的存在。下一个循环又开始于资本家掌握酝乙 马克思这样写道：“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①

因而，我们能推论，对资本家而言，劳动力具有比其交换价值大得多的使用价值，因为其交换价值就是购买劳动力的成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00 页。

而其使用价值则等于生产过程。其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差额越大，劳动者被资本家侵吞的剩余价值就越大。

剥削理论

不变资本是指在生产中被消耗的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被加入成品的价值中。不变资本中只有被消耗的那部分价值（折旧和原材料）被转移到商品价值中去。可变资本是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在生产中再生产出自身价值的等价物。

为了更详细地解释不变资本，我们假定一台机器持续运转 远天，这样平均每天消耗 $\frac{1}{远}$ 的使用价值，因而每天有 $\frac{1}{远}$ 的价值加进到每天的产品中。转移到产品价值中生产资料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在劳动过程中因自身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我们进一步假定这台机器价值 $远$ 磅，且在 $远$ 天内被消耗掉，这样，机器的价值平均每天有 $\frac{远}{远}$ 从机器本身转移到产品中。同时，当机器进入转移部分价值的过程时，机器仍继续作为一个整体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作为生产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工具存在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这就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总资本中的不变资本那一部分。

可变资本，是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价值量的改变，再生产出一个自身价值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大小根据情况的不同而不同。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是资本家从工人那里获得的，因为劳动力价值（它的市场价格）仅仅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工人用现代机器劳动，只需工作日内的几小时就可以挣得生活资料的价值（工资）。在剩余的劳动

三、价值理论

时间内工人创造的产品的价值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本家所占有。因此，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却被资本家所占有的价值。剩余价值率仿佛是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预付资本所决定，预付资本（ c ）由不变资本（ c ）和可变资本（ v ）组成，即：

$\frac{m}{v}$

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只有可变资本能创造剩余价值（ m ），比如：一个工人一天工作 8 小时，再生产出与其工资相等的价值只需 4 小时，我们称之为必要劳动时间。额外没有报酬的 4 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这样剩余价值率可以用以下等式来表示：

$\frac{m}{v} = \frac{m}{c+v} \times \frac{c+v}{v}$

这样，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价值除以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精确表现，而且剩余价值由于机器的使用而会有所增加。机器的使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工人生产自身生活资料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它也使雇用一些不太强壮的劳动力成为可能，从而增加剩余价值。由于生存工资必须能养活整整一个家庭，因此从一个家庭中雇用两个或者更多的成员就能以同样的工资标准来无偿占有更多的劳动时间。机器促使资本家无限制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是因为机器不会疲劳，让机器闲置是一种浪费，这就促使资本家尽可能地增加机器的使用率。不仅劳动力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而逐渐丧失劳动能力，机器本身也会磨损贬值（如生锈），这也是促使资本家加速使用的因素。由于技术进步会导致机器的过时，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形”贬值，这将会促使资本家充分使用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另外，有一个矛盾也会促使资本家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使用的机器与活劳动相比越多，那么可供剥削的活劳动就显得不足。为了补偿剩余价值来源的下降，资本家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工人由于机器

的加速运转或纪律的加强而被迫更加努力地工作。

小 结

自从 19 世纪以来，价值的源泉是在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问题，尽管它的解释一直被边际效用观念所支配，马克思却采用了深深植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剩余理论传统的价值理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品才采取纯粹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商品这种形式，从价值关系作为这种社会关系的特殊本质来看，价值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因素。其中，使用价值指商品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属性，而交换价值依赖于在商品市场中不同使用价值相互交换的一系列比例关系。产品的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在商品中的凝聚。价值可以用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量化，这使马克思能够引进劳动力概念，解释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来源，并认为对资本家而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超过了它的交换价值，劳动力创造了剩余价值，通过一个剥削过程，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

四、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导 言

在马克思的批判中，他试图揭露古典价值论中的四个基本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古典价值论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的关系，马克思在他的工资理论中纠正了这一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它不能解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在他的资本理论中纠正了这一错误。第三个错误是它混淆了“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马克思在他的转形问题中克服了这一错误。最后，马克思指出古典价值论不能解释地租现象，他对转形问题的解决为解释地租现象提供了一个必要前提。

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

劳动力本身具有交换价值，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交换价值。如果认为交换价值是交换价值尺度，那么将陷入恶性循环。这一争议等同于下面这一问题：假定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内在尺度，那么在此基础上如何决定工资。

这是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首次批判。要么劳动按它的价值出售，在此情况下，劳动价值论没有意义，或者劳动不按它的价值出售，那么所有最重要商品的买卖都违背了劳动价值论。因此，在逻辑上，似乎不可能同时既遵循劳动价值论又发展一个前后一致的工资理论。这样一来，马克思需要证明，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且价值并不取决于该商品的价值。为了克服这个逻辑矛盾，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力作了关键的区别。劳动是一种活动，并不是商品，它不能买卖，因此劳动没有价值，因为“价值”范畴仅仅适用于商品。在劳动力市场上被买

卖的是劳动力。由于澄清了劳动力是商品，马克思能够创造出与他的价值论相一致的工资（即劳动力的价值）理论。

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利用马尔萨斯人口论来揭示长期平衡的实际工资是怎样在生存水平上维持的。李嘉图的理论如下：如果实际工资由于对劳动的过量需求而增加，人口将增长，因此劳动力的供给将增加，直到实际工资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影响而回到生存水平。这表明长期供给曲线在生存水平上是完全弹性的。然而，马克思认为，对劳动力供给的反应时间滞后。因此，古典工资理论依赖一条被认为是在所有经济中都起作用的生物法则。然而，对于马克思，“工资”范畴是历史上特定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有意义。这样，他试图确立特定的、只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的工资理论。另外，他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提供这样的一种法则，尤其是古典工资理论把劳动力市场作为不适合价值理论的一个特例独立出来。李嘉图解释了所有商品的价值，却唯独没有从特定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种法则的角度来解释劳动力的价值，他对劳动力的价值作了一种十分不同的分析，这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由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地位所定义的，这是它与封建制度或简单的商品生产相区分的标志。因此，劳动力是所有商品中最重要商品，这就要求马克思发展一种满足两个标准的工资理论。马克思认为因为劳动力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是一种商品，它的价值必须和其他商品一样依赖于一些共同的因素。因此，马克思试图把劳动理论运用到分配领域本身，并且劳动力的长期平均价格与其价值相一致得以实现的机制一定紧密地生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质。一旦区别了劳动和劳动力，第一个标准容易得到满足。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的劳动的数量（在普通技术条件下）。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只与维持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及其家庭

四、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生活有关。这决定着劳动力的价值并因而决定工资的长期平衡。因此，与李嘉图一样，马克思有一个生存工资理论。因为劳动力不是资本家为了利润而生产的，所以其机制必须更详细地加以说明，即平均和长期的实际工资是如何维持在生存水平上的呢？

不符合历史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被马克思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因素所代替：产业的劳动后备军（失业者）。这也是人口过剩的一种形式，但这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用的概念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生产着特定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对过剩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失业的因素是技术变化和资本积累的本质所固有的，它使不变资本远远高于可变资本的增长率，以此来提高生产率。因此，资本有机构成（定义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的增长，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要远远快于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另外有两个因素与产业的劳动后备军有关。第一，这些技术变化运用在农业中导致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并导致那些仍停留在农业部门中的人口的大量失业。第二，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中有一部分被残酷地剥削、不定时地被雇佣的工人，这一部分形成停滞的产业后备军。因此，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从长远来看，意味着工人之间为工作的竞争而阻止实际工资超过生存水平。因此，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仅仅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他的理论与劳动价值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马克思所发现的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差别对于纠正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以及协调工资理论与价值论都是必需的。马克思并没有运用马尔萨斯人口论这一不符合历史的自然主义，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劳动力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的固有结果——产业劳动后备军的存在使工资维持在生存水平上。通过雇佣劳动理论来批判古典价值论是马克思对古典剩余价值论进行批判的基础。

资本理论

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那么，工作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换言之，工资一定等于劳动产品的价值，但事实与此相反。因此，这个异议就等于这样一个问题——以仅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如何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即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个问题在我们对资本的分析中得到了解决。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来源于生产过程而不是交换过程，从而收入来源于按价值出售商品，而不是高于商品价值来出售。然而，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为什么产品不全部归于劳动者所有？在提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进行了比较：简单商品生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简单商品生产社会中，商品按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所决定的比率来交换，并且仅有生产者消费这些商品^员。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本身成了商品。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垄断着生产资料的少数阶级控制没有财产的劳动者的权力的体现。他解释如下：

资本不是物，而货币是物。在资本中，就像在货币中一样，人与人特定的生产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社会中物的自然属性。没有靠工资生活的阶级的时候，在每个人眼中，其他人都是自由人，这就不可能有剩余价值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生产，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生产，因此，也就没有资本和资本家。他在别处这样写道：“……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① 与社会结构差别相联系的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差别。现在，非生产者以地租、利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85 页。

四、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和利润的形式占有社会产品。这好像是与劳动价值论相一致的，因为从表面上看，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由于利润被加到商品中去，所以商品的价值比他们劳动的价值大。马克思坚决地反对这一点，在这里他指出的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又一次成为他分析的关键。因此，劳动力价值由生产维持劳动者所需生活资料的劳动量决定。然而，这些与工人的劳动产品没有必然联系，劳动产品可能会大得多。这是因为，工作日中仅有一部分时间是劳动者为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而进行生产的。在剩余的工作日中，劳动者所从事的是被马克思称为“剩余劳动”的部分，即劳动者为资本家所要独占的利润而生产。

竞争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竞争理论中混淆了价值和价格。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着竞争理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供给和需求的波动，市场的日常价格与长期均衡价格相背离。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李嘉图一样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长期均衡（“自然”）价格与劳动价值不同。马克思认为，如果各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竞争使不同行业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那么这些偏离不可避免。李嘉图试图通过把这一差别归因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比例的不同。然而，他所使用的“价值”概念前后不一致，有时表示劳动价值，有时表示均衡价格。因此，当“自然”价格与劳动价值不同时，他就不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劳动价值论仍然有效。这就是转形问题的症结，但若不能提出资本理论，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整个问题的关键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假定，在竞争经济中，所有部门的利润率相等，但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不同。接着马克思指出，总的来说，劳动价值与长期均衡价格不可能一致。他试图表明，这些资

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有机构成的差别改变了劳动价值论的实现形式，并且，这些差别只有参考价值论才能得到理解，价值论在逻辑上要远远优于均衡价格的分析。

正如表 1 所显示的，马克思构造了一个由 3 个部门组成的简单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们是生产生产资料（钢）、生活资料（谷物）和“奢侈”商品（金）。这一经济所生产的产品足够保证下一周期有相同水平的产出。另外，没有地主、资本家消费掉他们全部的收入，也就是积累率为零。马克思称之为简单再生产（我们将在第六章进一步详细地论述这一点）。在部门 I 中生产 1 吨钢需要 1 个小时的劳动和 1 吨钢。在部门 II 中，生产 1 夸脱谷物需要 1 吨钢和 1 个小时的劳动。在部门 III 中，生产 1 盎司金需要 1 吨钢和 1 小时的劳动。因此，生产 1 吨钢需要 1 个小时的总劳动投入（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劳动投入）。这样，直接劳动 1 小时，间接劳动（即处理每吨铁矿所需时间与生产每吨钢铁输出所需的劳动时间之比）1 小时。因此，如果每吨钢的劳动价值（ λ ）为：

$$\lambda = 1 + \lambda$$

那么，钢的总产出的价值为 $(1 + \lambda)$ 伊 $(1 + \lambda)$

同样，1 夸脱谷物和 1 盎司金各含有 1 个单位的劳动价值，两个部门的产出的价值均为 1。因此，每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全部由钢组成）为：

部门 I	1
部门 II	1
部门 III	1

总和为 3

使用活劳动的时间（小时）：

部门 I	1
------	---

四、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部门Ⅱ 缘

部门Ⅲ 猿

总和为 猿 小时（根据剩余价值率分为有偿和无偿两部分）。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剩余价值率为 猿，我们因此可以认为活劳动的必要部分和剩余部分相等。那么，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数量如下：

部门Ⅰ (猿)

部门Ⅱ (缘)

部门Ⅲ (猿)

三个部门可变资本之和为 (猿 + 缘 + 猿) 等于谷物产出的劳动价值。这是因为工人把他们的收入都用来购买谷物（并且他们是唯一的购买者）。金产出的价值 (猿) 等于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之和 (猿 + 缘 + 猿)，这是因为资本家把他们所有的收入都用来购买金。如按照劳动价值论，那么，每个部门的利润率 (则是剩余价值与所使用的总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

猿 (在这里，猿 部门Ⅰ、Ⅱ或Ⅲ)

在上例中，假定没有固定资本，因此，每年正好周转一次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共同组成流通资本。马克思认为，像这样对分析不起作用的固定资本只是一种简化。

表 猿 价值向价格的转形

生产条件：

	生产方法	投入	劳动时间	产出
部门Ⅰ	猿吨钢	垣	猿	猿吨钢
部门Ⅱ	缘吨钢	垣	缘	缘夸脱谷物
部门Ⅲ	猿吨钢	垣	猿	猿盎司金
合计	猿吨钢		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价值构成：

	不变资本 (糟)	可变资本 (增)	剩余价值 (泽)	价值 (糟增曾泽)	剩余 价值率 (泽糟 (豫)	资本有 机构成 (糟增)	利润率 (泽糟增 (豫)
部门 I	猿	猿	猿	猿	猿	源	猿
部门 II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部门 III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合计	猿	猿	猿	猿			

马克思的价格体系：

	不变资 本 (糟)	可变资 本 (增)	成本 价格	源 平均 利润率	猿 利润	猿 生产 价格	猿 价格减 去价值	愿 利润减 去剩余 价值	怨 价格与 价值的 比率
部门 I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部门 II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部门 III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合计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猿	

资料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编：《马克思经济学：说明和评论选读》，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22 页。

每个部门的利润率为：

$$\begin{aligned} \text{部门 I} & \frac{\text{猿}}{\text{猿} + \text{猿}} = \frac{\text{猿}}{\text{猿}} \\ \text{部门 II} & \frac{\text{猿}}{\text{猿} + \text{猿}} = \frac{\text{猿}}{\text{猿}} \\ \text{部门 III} & \frac{\text{猿}}{\text{猿} + \text{猿}} = \frac{\text{猿}}{\text{猿}} \end{aligned}$$

因此，这些利润与资本价值构成（糟增）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

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并且，剩余价值之和等于利润之和（~~因为国家总劳动量是恒定的，所以~~）。
~~（国家总劳动量是恒定的，所以）~~

上述这些等式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即劳动价值论是确定生产价格和利润率所必需的。这样，“转形”是剩余价值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向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再分配，而需要再分配的剩余价值的量就是其所体现的劳动数量。因此，在逻辑上，价值先于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先于利润。只有当竞争和资本的流动都十分充分时，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平均化才成为可能。比如在发展的早期，价格与劳动价值相等，行业之间的利润率不等。因此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情况下，单个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量不等于资本家从他所雇佣的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像例子中部门Ⅲ那样的资本有机构成与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相等的情况只是一个特殊情况，总的来说，等量资本生产不等量的价值，但生产等量的利润。其结果是劳资双方都弄错了。资本家将利润归功于资本的力量，而忽略了利润的社会根源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根源是剩余劳动。而工人认为他们每个小时的劳动都是有偿劳动，没有意识到在劳动时间中还有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时间，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地租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四个错误是他们对地租产生根源的解释。亚当·斯密认为地租是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而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的存在与劳动价值论并非不相容。李嘉图认为，玉米的价值是由在最差条件下生产这些玉米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因此，需要较少劳动投入而能生产同样多玉米的边缘内的土地才能为地主带来更多的地租。因此，可以认为，土地越肥沃（与耕作边缘的土地相比），地租就越高。因此，李嘉图认为，地租纯是级差收入，边缘土地没有地租。

源

四、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同意李嘉图论证的逻辑，但认为它太受限制，因为只要考虑到价值向价格的转形问题，边缘土地有地租这一现象就并不与劳动价值论相冲突。问题是如果一个农场主获得与其他资本家一样多的利润，那么劳动时间就被剥夺了，但关键是，地租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农业中，剩余劳动分解为利润和地租，而在工业中只是利润？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因此，生产价格低于玉米的价值。然而，根据马克思理论，土地不是商品，因为它不能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能使土地所有者能够占有形成超额利润的那部分剩余劳动，但这并不是说土地所有者能使价格高于它的价值，恰恰相反，垄断有可能使商品价值高于平均价格，却使其能够以它的价值出售，而不是按比其价值高的价格出售。为了举例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假定农业和工业使用相同数量的资本，均为 100 元。然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占的比例不同：工业中 80 元（糟粕）增，农业中 20 元糟粕增。马克思还假定剩余价值率为 50%。因此，产品的价值为：

工业： 80 元糟粕增 20 元降地 100 元

农业： 20 元糟粕增 80 元降地 100 元

然后，在两个部门中，为了利润的平均化，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两者都以 100 元的价格出售，两个部门获得相同的平均利润率（10%）。因此，农产品将低于它的价值出售。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仅仅在土地不被私人占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主能够使农产品的价格等于它的价值，这样，玉米以 100 元的价格出售，地主以地租的形式占有 10 元单位的剩余价值中的 10 份。农业资本家保留 90 份，按同样的利润率把它们交给工业资本家。因此，马克思认为，地租理论并不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然法则，而是一个社会法则。地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虫，消灭地主，对整个社会的运行不会产生

影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任何不利的影晌。随着现代技术运用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到社会平均有机构成，那时，价值将不再高于生产价格，绝对地租将消失。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所描述的地租理论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有许多本质区别，所以，农业生产率并不一定随着积累的增加而下降。其原因是，农业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表明，尽管农业的生产率可能会比工业生产率上升得慢，但经过一段时间它一定会上升。尽管地租不形成农产品生产价格的一部分，但它终究是其最终售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其最终售价将与较低的生产价格相等。这说明李嘉图关于价格决定地租而地租不是价格的一个决定因素的观点是错误的。

利润率下降和萨伊定律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批判集中在这个理论的两个方面：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的分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萨伊定律的有效性问题。在利润率下降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以他对古典价值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分析说明李嘉图地租理论错误的原因之后，又指出李嘉图不能够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而混淆了利润率（ r ）和剩余价值率（ e ）的概念，因此李嘉图得出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论。因为劳动生产率下降就必须延长生产劳动者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劳动时间。然而，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运用技术将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工业中劳动储备军数量的增加，因为利润率是剩余价值率（ e ）和资本有机构成（ k ）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比剩余价值率增长得快，那么，利润率必然下降。这是因为：

如果：

则 $\frac{e}{k}$ 巨增

源

四、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那么： $\frac{c}{v}$ 越增 则越 匀员

剩余价值率为： $\frac{v}{c}$ 越增

资本有机构成为： $\frac{c}{v}$ 越增

因此： $\frac{c}{v}$ 越增 则越 匀员

因此，如果 $\frac{c}{v}$ 上升得快，则 $\frac{v}{c}$ 将下降。

该分析框架的关键之处在于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导致利润率下降，而李嘉图却持相反的观点。

在马克思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中，他攻击了这样一种观点：当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时，有一种内在机制能保持市场上有足够的总需求来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萨伊定律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是正确的。然而，在使用货币的市场经济中，供给不能再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了。因为，有可能只卖不买，并可能出现没有销售过程的情况，因此总供给可能大于总需求。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对萨伊定律的批判表明，他在该领域的批判是凯恩斯和提出双重决定假定的克洛的先行者。^①

小 结

马克思在对古典价值论的批判中纠正了他认为是缺乏逻辑性和连贯性的四个主要错误，由此产生了他的工资理论和资本理论，并解释了价值与价格的区别，马克思运用竞争理论使这一点表现在由价值和剩余价值到价格和利润的转形过程中。因此，马克思表示尽管价值依赖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依赖于这一商品的价值，他主要是通过区分劳动和劳动

^① 马克思：《马克思的经济学》，牛津，马基泰尔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力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也和其他商品一样进行买卖。这就允许马克思形成一种工资理论，该理论与价值论完全一致，且并非依赖于不符合历史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李嘉图依赖于该理论），而是依赖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机制。工业劳动储备大军是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从长远来看，它能够防止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工人的生存水平。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最可能引起争议和激烈争论的方面是所谓的转形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五、转形问题——一些复杂的迂回

导 言

围绕着这个解释一直有许多争论，马克思对价值转形为价格和剩余价值转形为利润的重要的和准确的阐述，主要出现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九章。自从这个观点被提出来以后，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在本章，在考察这些批评和辩护之前先来检验马克思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这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方面。的确，许多人都认为它已构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和不适宜的转向，但是就这个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传统解释”的完全驳斥而言，它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之感到最为困难的一个部分。这个理论经常被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薄弱环节。

这就是我们应该理解围绕着这个观点争论的原因。对于转形问题理论上的推定，19世纪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这种理论上的推定划分为两大阵营，第一个阵营是由庞巴维克（[恩格斯](#)）、萨缪尔森（[恩格斯](#)）、塞顿（[恩格斯](#)）、斯蒂德曼（[恩格斯](#)）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所谓“基本缺陷”的理论，第二阵营是与森岛通夫（[恩格斯](#)）、耶菲（[恩格斯](#)）、谢克（[恩格斯](#)）、杜梅尼尔（[恩格斯](#)）、弗雷（[恩格斯](#)）相联系的“马克思需要被正确理解”的观点。

马克思的步骤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中，马克思在开始部分重新强调资本的有机构成依赖于劳动力和所运用的生产资料以及依赖于生产资料的价格。他特别强调这必须用百分数的形式来考虑，他假

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设剥削率为 $\frac{1}{2}$ ，以这一点为基准来分析，假设不变资本损耗对利润率没有影响，不变资本能够作为整体完全进入一年的产品中，然后又假设产生于不同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与每一个部门的可变资本的多少是成正比的。马克思认为在周转期的变化将改变这个结果，但是在这个阶段的分析中，为了论述的方便，他忽略了这种影响。

因而在表 2-1 中，他检验了不同有机构成的 3 个生产部门，每一个部门的总资本都为 100，这样平均有机构成就为 $\frac{1}{3}$ ，平均剩余价值为 30，平均利润率为 30%。所以每一个生产部门每 100 的总产品的价格为 130，每一个部门生产的产品将以 130 的价格被出售。马克思解释说如果所有的成本价格都认为是 100，那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而我们必须考虑与不变资本的不同构成相联系的、固定的和流动的组成部分。另外，固定的组成部分可以以不同的比率损耗，在相同的生产过程中会有不同数量的价值传递到产品中，然而，由于成本价格低于产品价值（ $\frac{1}{3}$ ），这对利润率来说没有什么关系，由于（ $\frac{1}{3}$ ）约（ $\frac{1}{3}$ ），这同样也适用于使用过的资本 $\frac{1}{3}$

表 2-1 马克思的转形程序

资本	剩余价值率 ($\frac{1}{2}$)	剩余价值 (30)	价值 ($\frac{1}{3}$)	利润率	消耗的不 变资本 ($\frac{1}{3}$)	商品的 价值 ($\frac{1}{3}$)	商品的 成本价 格($\frac{1}{3}$)	利润率	价格与 价值的 偏离	商品的 价格(成 本价格 平均利 润)
不变资本	$\frac{1}{2}$	30	100	30%	30	70	70	30%	0	70
可变资本	$\frac{1}{2}$	30	100	30%	30	70	70	30%	0	70
不变资本	$\frac{1}{2}$	30	100	30%	30	70	70	30%	0	70
可变资本	$\frac{1}{2}$	30	100	30%	30	70	70	30%	0	70
不变资本	$\frac{1}{2}$	30	100	30%	30	70	70	30%	0	70

五、转形问题——一些复杂的迂回

续 表

资本	剩余价值率 ($\frac{m}{v}$)	剩余价值 (m)	价值 ($c+v$)	利润率 ($\frac{m}{c+v}$)	消耗的不变资本 (c)	商品的价值 ($c+v$)	商品的成本价格 (c)	利润率	价格与价值的 偏离	商品的价格(成本价格 +平均利润)
总共 $\frac{m}{c+v}$		m		$\frac{m}{c+v}$		$c+v$				$c+v$
平均 $\frac{m}{c+v}$		m		$\frac{m}{c+v}$		$c+v$				$c+v$

在表 5-1 中，剩余价值有规律地分布于 n 个生产部门，当一些部门以高价购买这些产品，而别的部门以低价出售这些产品而把平均利润 ($\frac{m}{c+v}$) 加到预付资本上时，价值与价格的差异就相互抵消了。马克思解释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因为，这说明只有当这些产品以这样的价格出售时，尽管它们有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而利润率都是 $\frac{m}{c+v}$ 。

生产价格是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值加上成本价格得到的，生产价格的前提条件就是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以至于利润率在每一领域变为它们的平均利润率。因而，“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按一般利润率计算，按百分比应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①。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相同数量的资本由于资本中可变资本所占的百分比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剩余价值，因此，利润率会平衡为不同利润率的平均值，即一般利润率。

马克思然后给出了一个生产价格的计算公式，假设总资本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2月第 1版，第 152-153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缘因, 员因 为固定资本, 其 员因 是折旧, 源因 是流动资本。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平均利润是 员因, 成本价格则是:

员因糟因(糟因曾 越源因

因而:

生产价格 越源因(成本价格) 壕因(员因利润)
越源因

所以, 当每一个资本家拿到生产商品所需的资本价值时, 他们没有拿剩余价值, 而是拿到了在他们的特殊的生产领域生产的利润。他用股份公司股东的例子来解释它, 即假设根据每一个股东持有的股份, 将股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 员因 单位, 因而成本价格由各个生产部门的支出所决定, 而利润则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

因而, 单个资本家商品的成本价格是具体的, 但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润是独立于特殊的生产部门的——它是平均每 员因 个预付资本的平均值(例如, 总资本的一个平均百分比)。为了用更易理解的说法来解释这个观点, 马克思假设 缘 个生产部门属于 员 个人。成本价格会因每一个商品而不同, 在每一个部门生产的利润可以根据总资本的利润计算出, 即在每 员因 个资本上面有一个准确的除数。因而, 成本价格会不同, 但从利润加上每 员因 个资本产生的销售价格的比例是相同的。因而, 商品的总价格同包含在商品中的总价值是相等的。所以, 在社会中, 总的来说, 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是相同的。

马克思然后论述以下情况所产生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生产资本是在市场上买到的, 因而它的价格中就可能包含已经实现了的利润, 因而, 一个生产领域的生产价格成为另一个生产领域的成本价格的一部分。“但是, 如果我们把全国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放在一方, 把全国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总和放在另一方, 那

缘源

Ψ 越越

因此，只要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加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这些利润就已经算在最终产品的总价格一方，至于最终产品的总价格，由于商品是一个生产资本，它的生产价格就不能进入另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如果有一个总额 π 表示生产资料生产者的利润，加入一个商品的成本，又有一个利润 $\pi_{\text{员}}$ 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中，那么

$$\text{总利润 (砸)} \text{越} \pi \text{垣} \pi_{\text{员}}$$

因而，商品的总成本价格就是它的成本价格减 砸(总利润)，所以

$$\Psi \text{垣} \text{砸} \text{越} \Psi \text{垣} \pi_{\text{员}}$$

因为每个资本的产品都可以这样看待，好像其中一部分只补偿资本，另一部分只代表剩余价值，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价值偏离会相互抵消。“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① 因而，对这个制度总体而言，不同部门周转期的差异会变小，因为平均利润率产生于不同部门的利润率，而不同周转期的差别在决定每个部门的利润率方面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马克思然后解释说他对一般利润率形成的构想假设每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为 员 ，从而强调利润率的百分比不同，而被 员 个资本单位生产的商品价值也不同。但是，由于在生产剩余价值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作用，每一个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实际上依赖于所使用的总的资本规模。为了说明这个情况，马克思假设四个有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资本或部门，然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员~~年 远月第 员版，第 员页。

五、转形问题——一些复杂的迂回

后他揭示所生产的总价值怎么会因总资本在每一个部门中投资数量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一般利润率不仅决定于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而且还决定于不同部门所占的相对比重。这个相对比重就是每个领域的资本与所投资的总资本相比所占的相对规模。利润率的高低依赖于有多少资本投资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或较低的那些部门。因而，一般利润率由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决定以及由总资本在不同部门的分布所决定。

现在，马克思解释说，一方面，成本价格作为这个价值的一部分而分离出来了，另一方面，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形形式而发展起来了。他是用以下方式进行说明的：假设一年的剥削率是 $\frac{1}{2}$ （ $\frac{1}{2}$ ），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为 $\frac{1}{2}$ ，年平均利润率为 $\frac{1}{2}$ ，照此，商品的生产价格为 $(\Psi \frac{1}{2})$ ，对于低于平均有机构成的生产部门，其资本有机构成是 $(\frac{1}{3})$ ，平均利润是 $(\Psi \frac{1}{2})$ ，其中， $\frac{1}{3}$ 大于生产价格。在资本的有机构成比社会平均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其资本有机构成为 $(\frac{2}{3})$ ，平均利润为 $(\frac{1}{2})$ ，商品的价值为 $(\Psi \frac{1}{2})$ ，其中， $\frac{2}{3}$ 小于生产价格。假设资本周转时间不变，只有在资本有机构成同社会平均有机构成 $(\frac{1}{2})$ 相等的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才同它们的价值相等。

所以，对一个消费者而言，商品的成本价格的确定现在涉及生产价格，并可能决定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因为生产价格可能会与价值相分离，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包含着其他商品的生产价格）可能高于或低于由生产资料的消耗所决定的那部分价值。“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1版，第155页。

然而，马克思坚持认为，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商品的成本价格总是少于它们的价值，因为即使商品的成本价格与生产产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一致，它对资本家来说无关紧要。这是因为成本价格独立于资本家的生产，而资本家所生产的结果是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这个剩余价值是多于或高于它的成本价格的额外价值，因此，作为一个一般规则，“成本价格小于商品价值的论点，现在实际上变成了成本价格小于生产价格的论点”^①。

换句话说，当商品的价值依赖于包含在它里面的有酬和无酬劳动时，商品的成本价格仅仅依赖于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的量，马克思用以下等式来说明这个问题：

$$p = c + v + \frac{v}{r}$$

这就是说，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成本价格乘以一般利润率，因而如果商品的成本价格是 c ，一般利润率是 r ，生产价格则为：

$$p = c + \frac{c}{r} + v + \frac{v}{r}$$

马克思然后通过解释在什么环境里一个特定的部门的生产价格可以在量上改变这个问题来扩展这个分析，使该分析考虑到该制度的变动性。首先，一般利润率可能由于其他生产部门的改变而改变；其次，该部门的价值可能由于部门的技术革新或者作为不变资本的商品的价值的改变而改变；第三，这些变化可能会同时发生。一般利润率的变动需要很长的时期，而一个特定部门的利润率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生产价格的改变能够通过商品价值的实际变化来解释，这个改变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总的劳动时间的变化引起的。然而，就社会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1版，第105页。

五、转形问题——一些复杂的迂回

资本而言，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数目，将同不变资本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和相等，因而如果剥削率是不变的，那么利润率只能在以下情况下改变：（葬）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化；（遭）可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化；（糟）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发生变化。在这些情况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变意味着一般利润率将会改变。因此，一般利润率的改变可能是由于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或者是由于剥削率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然后指出：尽管利润率可能会在剩余价值率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发生改变，由于资本家仅对前者感兴趣，资本家就不会知道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有差别，而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差别，二者的总量是相等的。隐藏在生产过程中的事实是，剩余价值即利润，不是来源于总资本，而是来源于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因此，实际上，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式即利润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①

事实上，即使在某一特定生产部门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与商品售价中所包含的利润相等，这也只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某一部门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不同的。然而单个资本家对整个生产过程是不感兴趣的，他只对在他自己的部门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感兴趣。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导致某一部门的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数量不一致，从而掩盖了利润的真正特征和来源。资本家并不关心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总数，他只关心作为生产资料而得到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因而在资本家关于利润形成原因的解釋中不包含价值的概念，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个分析的关键是，如果以单个的生产部门来看，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并不是由这些部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1版，第155页。

的价值形式所决定，而是在于这些部门。

“以前的经济学，或者硬是抽掉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以便能够保持作为基础的价值规定，或者在放弃这个价值规定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以便保持那种在现象上引人注目的差别。”^①

一般利润率的改变是缓慢的，因为单个生产部门的变化趋向于相互抵消，因而个体变化的影响只有当单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时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单个部门的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差异使资本家不明白利润的真实来源。因而，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增加总资本中不变资本的部分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鉴于上述分析，很清楚，成本价格中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在特定部门被提高，即脱离流通过程而进入生产过程的那一部分增大了。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一定数量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数量就会改变。因而成本价格中代表可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可能不变，而以相同的量进入总产品的成本价格。然而，每一个单个商品（其总和构成总产品）现在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劳动（包括有酬的和无酬的）和对这些劳动所付的或多或少的费用，即更大的或更小的工资部分。因而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总数是没有改变的，但倘若以每一个单个商品为基础来计算，情况就不同了。这是因为就包含在单个商品里面的可变资本而言，单个商品的成本价格被改变了，而可变资本又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假设 1 个工人对 1 个工人来说，1 个工人则生产了 1 件产品，用 1 来表示，因而 1 的成本 1 更便宜，现在假设劳动生产率有一个改变，在这里它变成了 2 倍，就成本价格只包含劳动而言，现在 1 更便宜，因而 1 更便宜，如果生产率减了 1/2 倍，那么相同的劳动力生产 1 件产品，因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2月第 1版，第 155页。

$$\Sigma (\text{糟回曾巨孕 越}) (\text{糟垣壤垣}\pi)$$
$$\Sigma \text{泽}\pi$$

如果马克思的利润理论可以这样写：

$$\text{则越} \frac{\Sigma \text{泽}}{\Sigma (\text{糟回曾})}$$

价格利润率则是：

$$\text{则越} \frac{\Sigma \pi}{(\text{惨孕垣孕})}$$

那么

$$\text{则越}\pi$$

然而，可以证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部分没有转形，而是保留在劳动价值中。因为一些部门生产生产资料，以及一些部门的产出变成了其他部门的投入，从而将按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出售。因而可证明，这些商品应该进入这个生产价格的范畴，但不是作为劳动价值，否则转形程序就是不完全的。马克思事实上完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看到他对这个理论的说明。总的来说，鲍尔特凯维茨用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马克思的两个不变性条件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而且价格利润率和价值利润率总的来说是不相等的^①。因而，在鲍尔特凯维茨后来的文章中^②显示生产价格是由价值得到的，但是马克思不变性条件仍不能被满足。鲍尔特凯维茨用了简单再生产的假设，而塞顿（瓦缘）对这个假设进行了扩展，它显示在 灶种商品被投入在 灶个产业中的多个部门的更加复杂的例子中，价格能够从劳动价值中获得。在同一年，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评论》中的一篇文章中通过使用线性经济学原理指出，转形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劳动价值不需要决定生产价格。萨缪尔森推断，按照马克思

^① 配那 霍华德和 维：《马克思经济学史：瓦—瓦（第二卷），伦敦，配那社，瓦年，第 圆页。配那 霍华德和 维：《马克思经济学史：瓦—瓦（第一卷），伦敦，配那社，瓦年，第 远页。

五、转形问题——一些复杂的迂回

的说法，价值理论只能说明价格从价值的偏离。这篇文章通过攻击劳动价值理论的形成猛烈地批评了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框架，认为，正如李嘉图所说的，劳动价值理论仅仅提供了一个当利润为零时的价格的精确理论。萨缪尔森在 1954 年和 1955 年又写文章寻求建立两个主要命题：一是价值与价格的偏离是微不足道的，第二是价格计算是一个“复杂的迂回”，因为鉴于生存工资率的存在，价值和价格都能直接获得。

这个评论用了数学方法重构了马克思理论，特别是在转形问题方面。森岛通夫研究了大量的马克思理论文章，包括经济危机和价值理论，特别是他试图在简单再生产和在它的动态环境中去分析转形问题。尽管在森岛通夫的书中没有提到鲍尔特凯维茨，但两人的分析中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根据森岛通夫的论述，利润率和价值能够显示出具有剥削率、周转率、资本有机构成的功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联系被揭露了出来并被称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①。这个定理说明了正数剥削率是正利润率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

在斯拉法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1933）以后，萨缪尔森试图用斯拉法的分析来反对马克思价值理论。斯拉法的分析通过用在生产和收入分配条件下的数据求得商品价值和利润率来回避“问题”去“解决”转形问题。这似乎证实了鲍尔特凯维茨、萨缪尔森和其他一些人在早期对马克思关于价值的逻辑优先地位的批评。1955 年，根据斯拉法的著作，萨缪尔森重申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一个复杂的迂回的立场，并证明了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值能够在生产和收入分配的条件下直接从生产资料中得到，同时指出斯拉法实际上在 1933 年早期的作品中就证实了他所表

达的观点^①。在 1905 年，斯蒂德曼指出，斯拉法已经通过他的分析揭示商品的劳动价值可能并不像马克思所指的那样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的转形就不能进行，因为劳动价值不可能被定义或它们可能为零，据此，马克思的分析就不能发现生产价格。另外，如斯拉法所认为的，如果劳动价值可能是负的，那么，从总体上说，这将破坏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的基础。

从 19 世纪初争论的根源于鲍尔特凯维茨开始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讨论，转形问题已经转移了，那就是从“解决”投入的问题转移到围绕价值与价格的量的联系的问题，以及围绕转形过程本身目的的定性分析问题。

第一个尝试在这场抨击中去“拯救”马克思的是谢克在 1905 年写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转形问题》^②。这本书声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转形程序是最终提供正确的生产价值的过程第一阶段。这个说法遭到了斯拉法学派、霍华德和金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谢克的分析是最不成功的澄清马克思的尝试^③。

众所周知“新的解答”是与杜梅尼尔（1900）、弗雷（1900）、瓦茨（1900）相联系的，尽管这解决办法已为利皮茨（1900）、戈里克和艾赫巴（1900）所认可。“新的解答”实际上涉及把劳动力价值重新定义为货币价值乘以货币工资，而不是体现在被劳动者消费的工资商品的劳动。然而，虽然马克思的一个不变性条件即剩

^① 亨利·萨缪尔森：《理解马克思的剥削观点：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所谓转形问题的概要》，载自《经济科学杂志》，第九卷，第 100-104 页。

^② 詹姆斯·沃茨主编：《资本主义的精细解构》，剑桥大学出版，1905 年，第 100-104 页。

^③ 詹姆斯·霍华德和詹姆斯·金：《马克思经济学史：1885—1900（第二卷）》，伦敦，1905 年，第 100 页。

五、转形问题——一些复杂的迂回

余价值等于利润在这个“解决方式”中被满足了，但是，由于利润率在价值系统比在价格系统低，另一个不变性条件却没有被满足。然而我认为在这个建构中人们不能一步一步地从价值走向价格，而“新的解决方式”仅仅提供了一个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移动的详细程序（参见亨特、戈里德，载自伊特威尔编辑的相关著作，[见链接](#)）。据此，严格地说，它没有对萨缪尔森关于使用劳动价值是一个“复杂的迂回”的批评提出适当的意见。

那卜勒斯认为对马克思方法的评论已趋向于假定一种均衡，该均衡涉及市场交换、相同的利润和静态的价格，也趋向于忽视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关键性的区别^源。其结果是，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利润率是由剥削引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发现李嘉图关于只有工资和资本商品部门影响利润率的观点是正确的。因而，由于忽视了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区别，从对马克思分析的不准确理解出发，通过给均衡以无保证的优先权，用一个均衡的方法论来代替马克思的方法论，就这样证明了利润率的剥削理论是错误的。那卜勒斯认为，鲍尔特凯维茨假定从长期来看经济是均衡的，是用黄金作为单位从历史时间中抽出的，这与马克思把价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直接在价值单位中命名的做法相反。据此，马克思理论并不是李嘉图的理论与剥削等式的结合，它只能是关于利润源泉的根本不同的建构，因而相同的利润率作为单个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就形成了。所以，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长时期内将价格看作是静止的观点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拒绝长期均衡理论。

小 结

赛德原菲洛（[见链接](#)）认为大多数著作关于转形问题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可替换的方法，因为他们要么关于价值与价格关系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相矛盾，要么谈论一

边缘

些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他们不可能去改动马克思自己提出的转形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中的意图不是用数学的方法从价值得出价格，或是从剩余价值得出利润，而是去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价值是怎样转形为工资以及产生于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是怎样转形为利润的。这样一个解释似乎会提供一个对马克思的目的的合乎逻辑的、清楚的理解，会表明关于这个特殊方面所引起的争论至少是错位了，甚至是别有用心。为了全面解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利润的起源，马克思的确提供了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法。马克思饶有兴趣地指出利润怎样地偏离剩余价值但却从剩余价值中产生以及价格只是流通中价值的外在形式。因而，那些认为在马克思的框架中存在“基本缺陷”的人，他们自身却陷入了“复杂的迂回”，与他们相伴的是许多希望证明马克思被曲解了的人们。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导 言

马克思分析的要点是资本主义的动态本质和它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能力。资本的再生产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被生产和出售。另外，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被购买来更新这个过程，马克思利用了两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型，一个是静态的一般均衡，另一个是一个增长的经济，以表明货币在增长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然而，理解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以及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占用农民土地的历史过程的变动性是怎样产生的，则是非常重要的。

发展阶段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为了生存，人类必须生产生存资料，为了把这个工作做好，他们必须在劳动分工中一起工作。另外，生产发展阶段本身必须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必须是前辈取得的成就的结果，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涉及劳动力的发展以及公司形式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所以社会通过以不同财产形式为标志的阶段而得到发展，在奴隶社会，公社的财产是基于剥削奴隶；而封建社会，它以剥削农奴来建构这个制度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和对没有财产的依靠领取工资的劳动者的剥削决定了生产关系。这些阶段，连续地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更高水平，关键是，每一阶段都产生了下一阶段所需的条件。然而，这个动力存在于每个阶段中，据此，每一阶段本身又通过不同阶段朝着下一阶段发展。每一个转形都与社会关系的新结构相联系，而社会再生产

以结构为基础。

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能够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历史过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六章中，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去理解资本和劳动力是如何掌握在商品生产者手中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与不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的阶级关系，这个分析从整体上说有必要去解释先于资本家积累的原始积累，换句话说，这是资本家最终拥有生产资料、因而提供必要的条件去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移的过程。所以资本主义制度要求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购买别人的劳动力，也要求自由工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因而，马克思运用辩证的研究方法显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怎样地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所以，农奴的解放，必然包括他们的生产资料被剥夺而进入少数人手中的。马克思认为，“……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

另一方面，资本家必须取代拥有财富源泉的封建贵族，由于马克思分析方法的本质和历史的首要性，他着重指出，虽然剥夺农民的财产是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基础，但剥夺财产的历史在时间和地点上是不同的，而马克思认为英国采取了它的“经典形式”。所以，马克思讲述了封建农奴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如何被驱散，从而产生了大量自由劳动者^②，到 16 世纪末大约 1/3 的土地被圈围。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也被马克思引用，他认为，在那时随着天主教会的地产被赠予或卖出，教堂征收什一税的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255 页。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产被充公，大封建领主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因而无地劳动者的规模得到了不断地增加。

圈地运动

据证实，15世纪发生在农业和工业中的技术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圈地运动^①。然而，就圈地运动产生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而言，圈地的范围和重要性一直在经济史学家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圈地运动可能是已发生的许多改革的前提条件，的确，当时人们认为公开的土地制度在经济上是无效的，而仅仅从社会的或文化的角度来看才应受到保护。虽然，毫无疑问，圈地运动并不总是导致技术革命，但就扩展可耕面积，改善土地利用而言，它仍然是当时唯一的最重要的发展。因为在陈旧的轮作方式中占有传统和必要地位的农民消失，使得可耕作的土地得到了增加。圈地运动在农业、最终在工业上所引起的其他许多革新也得到了证实。

马克思相信，圈地运动部分地导致了过剩人口，从而为工业提供劳动力。

“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不产者的供给。”^②

另外，马克思在第二十七章的最后一段，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

^① 参见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5页。

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①

这个直到 18 世纪 80 年代仍保持正统的农业改良的观点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平衡的公开的土地制度被圈地运动摧毁了，农民被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从而为通过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无土地的劳动者这个三层社会结构的农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②这个观点经由丧失过去田园诗般生活时光的民众感觉而得到加强。然而，这个论断遭到许多经济史学家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圈地运动的正面作用被低估了，粮食的大丰收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圈地运动而发生，而传统观点认真地考虑过这一点。然而在 18 世纪五六十年代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观念：钱伯斯（1734）认为圈地法引起了减产，但并没有消灭英国的农民。明戈（1763）、贝克特（1769）和特耐尔（1770）接受了这一论点。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 1786 年，艾伦证实了圈地运动在经济上的收益是有限的，而在农村积累了过剩的劳动，从而为手工贸易的扩展找到了一条出路，进而促进了伦敦的扩展。尼森（1790）也认为在大多数北安普敦郡的村庄里，圈地运动破坏了农民的经济。这个争论还远没有结束，它继续为经济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无休止争论的主题。然而，在这场争论中，有人批评马克思夸大了圈地运动对农业的资本化和商业化的过程的重要性。事实上，对马克思来说，圈地运动是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像《资本论》第一卷第八部分所证实的那样。因而，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它是这个动力的一个部分，是农业资本化、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中和就业中的一个因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100 页。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最近的争论”

原始工业化被看作是先于正统工业化的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弗兰克林·~~曼~~曼德尔斯（~~曼德尔斯~~）对此有大量的论述。在其文章中，曼德尔斯研究了弗兰德斯，他认为，前工业社会先于正常的现代工业化，并为现代工业化作了准备。农业劳动力涉足国内工业、为跨国市场生产，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从农业资源基础中获得了解放而成为劳动力，以前这些劳动力由于季节性失业而闲置，而现在整年都要工作。因而就有必要去扩展生产，使地区工业专业化以及使农业商业化。可以证实，原始工业化打破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调控机制，例如，以前用来调节人口增长使之成为可利用资源的遗传机制和其他体制性控制。这就制造了一个产生劳动力、资本、资本家、商业性农业、跨地区消费市场以及所有为工业化所需要的一个自我维护的原始工业化螺旋。

然而，在这个领域有几个思想流派。例如，列维（~~列维~~）研究了赖斯特郡的两个村庄，他认为原始工业化使人口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关的人口爆炸导致了劳动人口的无产阶级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乡村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形式。这就制造了一个在社会中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不得不为了工资而工作的庞大的人群。他认为这种情况制造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莫克（~~莫克~~）却反驳了他的大部分观点。他认为，原始工业化提供了廉价的过剩的劳动，这些劳动通过 ~~宰~~宰因里列易斯在双重增长模型中所描述的机制促进了欧洲工业化的发展。因而，莫克认为剩余劳动不是由农业提供，而是由原始工业提供的。克里德特、麦迪克、斯凯拉姆（~~斯凯拉姆~~）将曼德尔斯与列维的模型结合起来，将原始工业化的理论转化成了中世纪和 ~~18~~18世纪这段时间欧洲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一般模型。所以，它代表着从封建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化过程的第二阶段。第一阶

段是农业向商业部门转化时，农村阶级结构逐渐分化的阶段。一旦原始工业化产生并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来，它们就不能扩展到城市中，因为城市中的行会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因而它们通过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导致了工业生产组织的转化：首先，在工场系统（工场手工业）中，农村制造商在生产和销售方面保持独立；第二，在“生产系统”（工场手工业）中，商人资本不断进入生产中，从而导致了生产商对批发商的更大程度的依赖，直到他们不再为了他们的原材料或为了他们的制成品而独立地进入市场；第三，生产集中发展成为有机化学工厂系统的集中的制造业。

在 18 世纪，曼德尔斯重新界定了原始工业化，强调了它的几个主要的特征。他认为，原始工业化是一个地区现象，但它为了外部的市场而生产，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就业，创造了城市工业与农业商业的地区发展的共生关系，创造了原始工业化通过雇佣农村劳动者而引起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因素。其效果有四个方面：第一，它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不完整；第二，它创造了利润，这些利润能够被用于购买资本来使工厂工业化；第三，它为批发商提供了工厂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和经验；第四，它导致了农业的商业化，并反过来导致了城市化和工厂工业化。

所以，原始工业化论题实质上考察了封建阶段和资本主义阶段两者之间的过渡，显示了这个动态过程是如何改变生产关系的，虽然它不以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为基础，但它无疑支持了马克思的立场，因而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个佐证。原始工业化本身不能充分证明马克思的模型的正确性，特别是它不能完全解释商业资本的增长。的确，马克思讨论了 18 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的三个附加因素。马克思从殖民地化的作用、奴隶贸易和国债等角度来考察商业资本的增长。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国际贸易

从前工业化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必然要求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的机会，以通过海外市场进行商品交换，出卖国内供应过多的商品以便购买国内经济所需要的稀有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去扩大市场和提高国内生产水平。因而，对外贸易能够鼓励专业化，允许一个国家去发展经济组织的技术和技能，同时从规模经济中获益，并给更大的生产活动以激励。然而在 18 世纪大部分国家生产的大多数产品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国际贸易逐渐被限制在那些奢侈品和由于地理因素而本地化的产品上，如烟草、糖、水果和矿石。所以在前工业化的欧洲，获得经济增长的最明显并可行的方法是扩展贸易联系的范围，在国外开拓市场。欧洲扩展的结果是通过在整个 15 世纪、16 世纪、17 世纪这段时间里，无数次尝试着去拓展欧洲贸易的疆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消费水平低，他们对欧洲商人提供的商品不感兴趣。然而，从战略上来看，在 1492 年之前大西洋贸易被拓展时，英国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扩展了英国卖到欧洲的商品的种类。远东的香料和茶叶，加勒比的糖类、棉花、烟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商品，这些商品在欧洲不能得到，它们很快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因而，这就形成了集中在伦敦的、发展成为复杂的贸易交易网络的转口贸易。在这个网络中，加勒比岛这个被英国种植园主管理的以奴隶社会为基础的地方，就构成了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环节。

在这个多方面的贸易过程中，英国的武器、五金、酒类以及印度的可卡因被运到西非来交换奴隶、象牙和黄金，这些奴隶被卖到加勒比地区用来交换糖类、红木、烟草和皮棉，而黄金、象牙被运到东方去交换茶叶、丝绸、香料。热带地区的商品被卖到欧洲去交换木材、大麻、铁器和谷物。在上述交易中，英国商人

积累了资本。马克思在评论这个情况时指出：

“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①

因而，资本家阶级通过开放世界市场而得以形成^②。许多争论都围绕着向外侵略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或是它只是在那时加速了这个已经开始的进程这个问题。《资本论》暗示马克思看到了殖民扩张是这个整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看，它不依赖于某一个因素，每一个因素都是互相依赖的。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二章中指出：

“……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②

以上已经揭示，当社会在发展阶段中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型时，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现在我们要转过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动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用了两个模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简单再生产

这是一个在静止状态下的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然而不像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8页。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统的一般均衡模型，货币不只是一个“面纱”。事实上，货币在所有交易中都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与传统的一般均衡论相对比，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这个模型是一个两个部门、两个阶级的货币经济的模型，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验证分三个部分。首先，如果一个经济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下进行的，什么交易必须在两个阶级之间发生或在阶级的内部发生？第二，什么交易必须在两者部门之间或两个部门内部发生？第三，货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马克思分析的模型是宏观经济的循环流动，是社会资本的运动。因而马克思用这些条件提出了新的问题：“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① 换句话说，货币是从何而来去实现剩余价值的呢？

对于马克思来说，关键的是去揭示，既然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产生，那么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相一致的。他的回答是非常基本的：收入的循环流通和流通速度决定了剩余价值的实现。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作了一些必要的简单假设。

（葬 只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除了资本家的消费外，没有非生产性的活动。

（遭 资本的有机构成随着时间的变化不发生改变，但可以相互不同，因而在这个模型中没有技术改变。

（糟 即使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同的，商品以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转形问题被忽略了），每一个资本家只使用他们自己的资本，没有在两个部门间相互借款。所以部门之间的利润率没有相等的趋势。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7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邕) 生产过程被形容为“投入”“产出”的过程，因为投入是在生产期的开始时间进行的，产出是在生产期的结束时得到的，每个部门的技术都是“生产性的”。

(瀟) 由于假设在(遭)中没有技术改变，规模收益是不变的。

(零) 有两个部类：第Ⅰ部类生产资本商品，第Ⅱ部类生产消费品，而第Ⅱ部类包含两个亚部类，(蚤) 生活必需品（被资本家和工人消费），(蚤) 奢侈品（只被资本家消费）。马克思进一步假设第Ⅱ部类的产出不能被消费，第Ⅱ部类的产出不能作为生产资料。

(阜) 在生产期间中，所有固定资本因磨损而引起资本单位的周转。

(灑) 资本家的净积蓄和投资为 园 以至于他们的所有收入都花在消费品上，补偿投资只发生在这个部门内。

(蚤) 工资仅仅在生存水平上，因而工人没有储蓄。

(躁) 剥削率在两个部门之间是不变的和相等的。

(噪) 经济是封闭的，没有对外贸易。

$$\frac{v_1}{c_1} + \frac{v_2}{c_2} = \frac{v_1}{c_1} + \frac{v_2}{c_2} \quad (\text{第 I 部类}) \quad \frac{v_1}{c_1} + \frac{v_2}{c_2}$$

$$\frac{v_1}{c_1} + \frac{v_2}{c_2} = \frac{v_1}{c_1} + \frac{v_2}{c_2} \quad (\text{第 II 部类}) \quad \frac{v_1}{c_1} + \frac{v_2}{c_2}$$

等式 远 表明，在资本商品部门得到的产出 宰 比不变资本 悦 加上可变资本 灾 的投入价值多出剩余价值 杂， 远 等式中表明在第Ⅱ部类中有相同的意思。所以，每一部类的资本家都有用来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预付工资款的货币资本。因而，货币扮演了价值储备（作为货币资本）的角色和购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交换媒介的角色。然而，必须指出在静止状态中，资本的储备没有净增长。生产以相同的比率一年一年地继续，在两大部类中，我们规定每一部类的生产都不改变，所以，第Ⅰ部类的资本家生产资本商品以至于他们与工人必须和第Ⅱ部类进行贸易去为他们自己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并为资本家提供奢侈品。换句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话说，第 I 部类为第 II 部类提供资本商品 z_{12} ，购买（等于）价值 v_{12} 的消费品，第 I 部类的资本家消费 v_{12} 在他们自己的部类中保持资本不变（补偿资本），目的是在将来保持不变的生产率。他们消费他们的剩余价值 s_{12} ，从第 II 部类中购买消费品。第 I 部类的工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那一部类的资本家，然后消费 w_{12} 从第 II 部类中购买消费品。第 II 部类的资本家在这一部类内部消费剩余价值 s_{22} ，第 II 部类工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他们的”资本家，然后他们购买价值 v_{22} 消费品。为了保持他们的资本不变，第 II 部类的资本家必须从第 I 部类的资本家那里购买价值 v_{21} 的资本商品。因而，假设一个静止的状态和自愿和公平的交换，平衡 两部类的资本商品 z_{12} 与 两部类的消费品 v_{21} 相交换，这可以用等式 $z_{12} = v_{21}$ 来表示

$$\frac{v_{12}}{z_{12}} = \frac{s_{12}}{z_{12}} \quad \frac{v_{21}}{z_{21}} = \frac{s_{21}}{z_{21}} \quad z_{12} = v_{21}$$

均衡要求：

$$\frac{v_{12}}{z_{12}} = \frac{s_{12}}{z_{12}} = \frac{v_{21}}{z_{21}} = \frac{s_{21}}{z_{21}} \quad z_{12} = v_{21}$$

（资本商品需求） = （资本商品供应）

或通过相减：

$$\frac{v_{12}}{z_{12}} = \frac{s_{12}}{z_{12}} \quad \frac{v_{21}}{z_{21}} = \frac{s_{21}}{z_{21}} \quad z_{12} = v_{21}$$

相似的：

$$\frac{z_{12}}{v_{12}} = \frac{z_{21}}{v_{21}} = \frac{z_{12}}{v_{12}} = \frac{z_{21}}{v_{21}} \quad z_{12} = v_{21}$$

（消费品的需求） = （消费品的供应）

或通过相减：

$$\frac{z_{12}}{v_{12}} = \frac{z_{21}}{v_{21}} \quad z_{12} = v_{21}$$

因而，两个条件，减到了一个相同的均衡条件。

均衡条件简明地表示了被第 I 部类出售的资本商品的价值必须同第 II 部类的消费品的价值相等，部类内部和部类之间的贸易

允许通过用货币作为流通媒介在两大部类中实现剩余价值。因而，马克思认为：

“所以，在这个场合，说资本家自己把那些使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即得到实现的货币投入流通（在他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的时候），这是完全正确的。”^①

源部类为员部类提供员部类越部类

员部类为源部类提供员部类越部类 意愿

在 意愿中画线的部分是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在第 I 部类中，源部类由第 I 部类自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组成。员部类和员部类由第 II 部类生产的消费品构成。相反对于第 II 部类来说，缘部类和缘部类由第 II 部类自身生产的消费品构成，圆部类由第 I 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构成。因而，第 I 部类必须从第 II 部类得到足以提供给资本家消费的一定数量的消费品，第 II 部类必须从第 I 部类得到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以足以替换消费在它的生产中的不变资本。在均衡中，这些要求必须是相等的，在 意愿的例子中，它们的价值为 圆部类 所以，在一个自由、平等的交换中，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然后在流通过程中通过货币充当交换媒介的方式来实现它，因而，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被流通过程所掩盖。

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然后分析了货币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中的角色。在这里他饶有兴趣地揭示了在一个经济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如何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提供条件。重点不在于增长，而在于货币如何通过资本积累中扮演的角色来适应增长过程。那就是说，一个增长的经济需要追加的货币提供给流通，这个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2月版，第 192页。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加的货币来源于两个途径：(葬 黄金生产的增加；(遭 流通速度的增加。

在简单再生产的例子中，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预付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和不变资本时，在流通过程中通过部类内部和部类之间的流通过程来实现。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被消费，部分被节余。节余的部分开始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来积累，即为了积累而暂时储备。任何在储备中的突然的变化，都会破坏流通量而导致生产不足或生产过剩。马克思所用的模型是一个均衡增长的模型，这里我们保留了除假设(澡)外的简单再生产的所有假设，假设(澡)为资本家的净节余和投资为零，我们用以下条件代替它：(蚤 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消费一半的剩余价值，然后将剩余的部分投资到第Ⅰ部类；(蚤 第Ⅱ部类的资本家将保持均衡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到第Ⅱ部类，据此可被形容为被动的调节器；(蚤 每一个部类的投资都不能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另外，工资率是在生存水平上，以至于工人没有节余的假设，被扩展为假设在生存工资率上的劳动力供应有无穷弹性。

所以，第Ⅰ部类的资本家用他们的剩余价值 Δ_{I} 来支付工资和消费奢侈品，用 Δ_{I} 加上它们部类的不变资本 Δ_{I} 或 Δ_{I} 以及加上它们部类的可变资本 $(\Delta_{\text{I}}$ 或 $\Delta_{\text{I}})$ ，从而保持 Δ_{I} 不变：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quad \Delta_{\text{I}}$$

相似的在第Ⅱ部类：

$$\Delta_{\text{II}} = \Delta_{\text{II}} + \Delta_{\text{II}} + \Delta_{\text{II}} = \Delta_{\text{II}} + \Delta_{\text{II}} + \Delta_{\text{II}} \quad \Delta_{\text{II}}$$

以代数的方式表示：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 \Delta_{\text{I}}$$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悦垣穴垣悦垣穴垣杂越宰 迂原

均衡要求资本商品的产出与需求相等

悦垣悦垣悦垣悦越宰越悦垣穴垣悦垣穴垣杂 迂原
(需求) (供给)

或

悦垣悦越穴垣穴垣杂 迂原

相似的对于消费部门

穴垣穴垣杂垣穴垣穴垣杂越宰越悦垣穴垣悦垣穴垣杂 迂原
(需求) (供给)

或

穴垣穴垣杂越悦垣悦 迂原

部类之间的贸易可以表示为：

悦垣悦垣穴垣穴垣杂 迂原
悦垣悦垣穴垣穴垣杂 迂原

用数字来表示：

开始时期——园年

	悦	穴	杂	宰	运	
第 I 部类	源	员	员	远	源	
第 II 部类	员	苑	苑	猿	圆	迂原
				怨		

第 I 部类积累 员越 其中：

$$\Delta悦越原伊伊越原$$

$$\Delta穴越员伊伊越原 迂原$$

第 I 部类资本家消费 员越 越

第 II 部类的资本家积累了足够的不变资本以至于资本商品需求和供应相等，即：

愿

在第一年中，第Ⅰ部类以 $\frac{1}{2}$ 的比率增长，第Ⅱ部类以 $\frac{1}{2}$ 的比率增长，在第二年中，两个部类都以 $\frac{1}{2}$ 的均衡比率增长。鉴于这个独特的假设，这个模型很快地结合成为一条均衡增长的途径。然而，马克思用这个假设去说明，甚至在纯粹的均衡增长条件下，货币和流通是怎样导致剩余价值实现的。这个剩余价值然后用于资本积累因而又导致了经济的增长。如果这是一个增长模型，那么就会招致许多批评。这个暗含的投资行为是相当奇怪的，因为即使价格利润率不同，资本家也只在他们自己的部类中进行投资。这就与《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阐述相冲突，在那里竞争行为导致了利润率的平等。这个模型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资本家保持了一个不变的资本有机构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技术改变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为什么在这个模型中利润率随着时间的改变却保持不变，这与《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描述的利润率有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是不一致的。最后，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为什么这么心甘情愿地去通过扮演被动的“调节器”来保持均衡呢？

如果马克思正在分析的是一个增长模型，那么这些批评将是有效的。然而，严格地说，马克思并不关心增长，他甚至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假设一个最好的可能的案例（一个静态的均衡或增长的经济）来试图说明剩余价值在生产中被创造、在交换（流通）中被实现。马克思努力去表明资本家怎样从这个制度中得到比他们的投入更多的回报。既然总的来说，一个人的痛苦是另一个人的损失，零和游戏，那么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是流通过程的结果。剩余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的，但却必须通过流通过程，因而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剥削来自它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因此，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下发展，这个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描绘循环链条中的几个薄弱环节，它们增加了危机的可能性。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小 结

通过发展阶段理论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每一种经济制度既不必要仿效相同的发展模式，也没必要经历相同的时间，但它们都必须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一个发展阶段所需的结构和联系是由前一个阶段凸显的矛盾所提供的，因而发展的阶段是不能跨越的。例如，政治分析家和其他一些人经常引用苏维埃集团的瓦解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是不正确的。然而，应当指出，苏维埃集团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实际上证明了马克思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前苏联没有经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因而不能成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苏维埃集团的瓦解澄清了马克思的分析^①。发展阶段理论中关于发展过程的变动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十分明显，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模型（一个在静止状态，另一个在经济增长的状态中）来说明这一点。这就有必要去重新强调马克思并没有试图去分析增长过程，它只是一个用来说明价值在逻辑上优先于价格、剩余价值在生产中被创造并在逻辑上优先于在流通中所实现利润的工具。所以，这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显而易见的变动性是以前发展阶段的固有矛盾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产物。

七、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

导 言

马克思认为，竞争促进了资本积累，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个别资本家被迫进行投资、增加积累。此外，那些增长较快的公司，随着他们市场份额的扩大，将会受益于他们的规模效应，取得更高的利润和回报。然而，资本积累过程并不是以一种平稳有序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当利润的期望值达不到时，资本家就会停止投资和积累过程，这样就会突然陷入普遍危机，造成商品积压，大量失业。所以，资本积累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其中资本主义独特的机制在起作用，重新决定了积累和投资的循环。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下降，利润增加，导致新一轮的积累和投资的循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动性被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几种要素所证明，马克思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包括资本积累的必然性，竞争过程导致了技术更新的需求，导致在生产过程中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这就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增长。然而，这种运行也埋下了使它灭亡的种子。马克思能阐释为什么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功将导致它的最终灭亡，因为这一成功是建立在矛盾和冲突的基础之上的。当竞争驱使资本家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减少单位商品的劳动量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持续地减少。这个过程本身被描述成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资本家的作用

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数量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和剥削的强度。单个资本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所实现的利润数量取决于在交换

愿

七、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

(流通)领域的竞争过程。然后,资本家必须决定如何在消费和积累之间分配他们的利润。积累额进一步分成增加的不变资本和增加的可变资本两部分。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积累”是指所投资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马克思的模式里,资本家被认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似。他们通过增加剥削劳动力和不断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不断努力使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样解释: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值——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以谋求价值的无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却达到了这一目的。”^①

马克思认为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是一致的,但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情况不是这样,在单个资本家企业里利润不等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儿有必要指出关于积累的讨论因为不同的目的而发生在《资本论》几卷的不同抽象领域:在第一卷,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相同的有机构成,因此讨论发生在价格和价值领域。在第二卷里,马克思主要论述循环过程,而关于积累的讨论则居次要地位,因此讨论发生在交换领域;在第三卷里,我认为马克思应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0-151页。

该从价格的角度来讨论积累问题，但他始终认为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和利润是一致的，而对于整个资产阶级也是一样（这一点我还能够接受）。

但是存在这种情况，假设剥削率是稳定的，一个资本家能够通过增加可变资本来增加剩余价值，即通过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资本家增加固定资本？假设生产要素的比例固定，为了保持一个固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单个资本家必须使固定资本同可变资本同比例地增长⁸⁵。是什么限制了单个资本家的扩大过程？新古典主义的投资理论认为存在着凹形的生产函数曲线，减少了回报，限制了公司的规模。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花费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上的追加资本）受资本家所实现利润的限制，还受资本家关于多少金钱用于消费的选择、借贷倾向性以及可供借贷的数量的限制。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的发展扩大了大公司积聚更多的、不断增长的资本的能力。单就资本家在消费和积累两者的选择而言，随着财富的增长，他⁸⁶当然希望消费更多而积累更少。这样就在消费和积累之间形成了一个矛盾。马克思并没有完全解释这种矛盾是如何解决的，但他认为稳定的消费（储蓄）有一种边际倾向。此外，正如资本家极欲使利润最大化，他们希望增加对工人的控制，扩大权力。所以，资本家也有一个社会目的⁸⁷。因此，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中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有一种稳定的、边际的倾向，而资本家会把消费余下的剩余价值用于积累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不会有有效需求（实现）的问题了。萨伊法则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正如凯恩斯一样，马克思反对萨伊法则。因此，从短期来看，将会有一段时期资本家并不自动将消费余下的剩余价值用于投资，这将导致实现（有效需求）问题。然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家会把他们消费余下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投资，马克思认为，其潜在的原因是社会的。它存在着一个社会必

七、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

然性，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投资是资本家的功能，因此就有《资本论》第一卷经常被引用的话：“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①是资本主义制度迫使资本家积累，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积累。因此，现在我们可以说明资本家的动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增强对工人的控制，在经济竞争中取胜。

马克思认为，生产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要求生产过程中各种要素必须不断地得到补偿，即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断地被消耗，因此它们必须不断地得到补偿。假如这是必然的话，那么如果资本家消费掉生产的所有剩余价值，那么每一生产周期都预付同样的资本，所以生产规模将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这将导致简单再生产。事实上，资产阶级投入一定量的资本，然后回收他们的预付资本，并带来剩余价值，这样他们就能够消费剩余价值并能得到足够资本开始新一轮循环。而工人仅仅拥有可供出卖的劳动力，得到的劳动力报酬仅能满足他们的基本消费需求，他们必须在下一个生产周期继续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都已被再生产了。

这种分析与资产阶级的积累理论截然相反，资产阶级理论赞颂资产阶级的节欲美德，认为利润是对资本家节欲的报酬。

“也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是把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掉。”^②

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正确地认为，把部分剩余价值用于雇佣额外的生产性的工人应被视为积累，而雇佣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0页。

非生产性的工人应作为消费，如家仆等，而贮藏货币既不是积累也不是消费。但是，马克思又指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关于积累全部用于预付增加工人的工资的假设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假设忽视了随着生产增长而同等增长的生产资料。

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分成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两部分，所以，积累的水平取决于剩余价值的数量。因此，如果工资水平降低，或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么积累就会增长。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商品的价值就会下降，资本家就能够用同样数量的剩余价值购买更多的商品。此外，随着工人数量的增加，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将会相应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结果是资本家的购买力持续地上升，积累和奢侈品消费都将增长。

积累水平的决定因素

积累的水平取决于剩余价值的数量，因为剩余价值将在消费和积累之间分配。而反过来，剩余价值的数量是由剥削率决定。因此，如果工资水平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或劳动强度增大，资本家将积累更多。同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价值就会下降，以致资本家可用同等数量的剩余价值购买更多的商品。因此，资本家的购买力不断地增长，奢侈品消费和积累都会增长。马克思在下一章解释道：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们的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越

七、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

是开动得有力。”^①

“优秀”或成功资本家的目标在于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断地积累以增加他们的资本量^②。在一个竞争的制度下，革新的资本家能够获得短期超额利润，于是，他就会不断地扩大商品生产以进行交换。而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将会以积累来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至于当利润率降低到低于“正常的水平”时，他们就会扩大积累并进行技术革新。生产方式的改进、技术发明、增加规模等不是发生于价格高于平均水平时，而是低于它的时候，即利润率低于它的正常水平的时候。然而，从长远来看，利润率将取决于积累的水平。同样，当工资水平上升时，将引起资本积累，以取代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但从长远来看，工资将取决于积累：

“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同样，在工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而在繁荣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降低。”^②

因此，积累的循环性质是竞争制度所内在的，并且受革新和利润水平的驱动。

技术更新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五章里，马克思概括了一套概念，这些概念对于理解资本积累过程很是必要。他提出资本的价值构成，表示价值形态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还有技术构成，与价值构成的比率相同，但是从使用价值这个角度来测量，即生产资料的数量相对于雇佣的活劳动力之比。因为资本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技术构成不能被量化（就是说，生产资料不可分割，劳动力在数量上不同），马克思采用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定义为：由技术构成决定的价值构成。因此，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展示了在作为生产资料的个别商品的价值、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价值构成会如何改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当劳动生产率增长时，技术构成也会提高，因此资本有机构成也会提高。所以，当积累不断进行、个别资本扩大时，竞争就导致集中，大资本的成本更低，不断排挤着小资本。

积累和技术更新是相互促进的，因此从本质上讲，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可以得出，积累不仅带来新型的机器，而且引入新的生产方式以及促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有的技术被展现为物化的新种类，即新资本商品代表着最新的技术。因此，固定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是同义的。还可以得出，个别资本家将试图通过用固定资本代替劳动力以提高生产率，因此其商品生产比他的竞争者使用更少的劳动力，而其竞争对手的反应是必须跟随这种趋势。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将被合理地认为是不断提高的。这反映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技术革新的趋势被歪曲为节约劳动力的革新，而这直接意味着：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时，平衡的增长被打破。事实上，第一部类（资本商品部分）的商品生产在整个产出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这也意味着剥削率不是固定的，工人的工资保持在生存工资的水平，因此花费在劳动力上的预付资本在整个预付资本中所占的份额是下降的。正如再生产模型一样，马克思认为所有的剩余价值都采取工业利润的形式，忽略了两个部类之间的差别。尽管在资本主义中技术更新被认为主要是为了节约劳动力，但是马克思认为革新劳动力使用的可能仍然存在。然而，从整个效果来看，革新是往节约劳动力的方向发展的，以便促进劳动生产率长时期的提高。因此，如果技术更新主要是为了节约劳动力，劳动

七、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

力雇佣的增长就慢于固定资本的增长，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资本积累的功能。因为积累增加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劳动力需要的增长就慢于不变资本的增长。此外，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平均值，革新的资本家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产品是按社会价值出售的，而社会价值是大于革新资本家的个别价值。这样，竞争就迫使其他资本家采取同样的生产技术。这就会降低商品的社会价值，并消除革新资本家的超额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技术不断更新的动态体系^①。

技术更新使已有的机器过时，普遍减短机器的经济使用期限，如此就提高了不变资本的价值。然而，这个过程将提高失业率，这不是由于总需求的缺乏，而是由于所有现有资本所需的职员已配齐了。积累过程中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不断增强。大公司由于有更大量的利润，所以积累速度很快。规模效益使大资本家比小公司更有优势，这是因为大公司积累得更快，他们使用技术更先进的机器进行生产，从而，小公司逐渐被技术更先进的大公司排挤破产。所以，积累增长导致了资本集中的趋势，即垄断的增长。当大资本家积累得更快，实力变得更强时，他们逐渐吞并或兼并小资本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强调了这一点：

“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不管它的生产效率有多高，或者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多少，只要它会降低利润率，就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采用。但每一种这样的新生产方法，都会使商品便宜。”^①

正是竞争过程的作用使商品价值下降。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个别资本家努力引进新的、节约劳动力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以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甚至高于其价值进行出售，而竞争对手还在使用高成本的生产技术。为了不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1版，第100页。

被淘汰，其他资本家必须引进这些新技术，以降低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商品的价值。所以，作为个体，资本家都在努力增加他们的剩余价值以及利润，但作为一个阶级，竞争的过程实际上导向了其反面。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然而，这不是促使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唯一机制。使工资长期保持在维持基本生存水平的需要，就要求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失业、一定数量的劳动大军后备力量，这不仅是为了控制工人，并且是为了保持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对劳动工人的支配力，以便能够提高剥削率。然而，这种对失业需求客观上导致了一个实现危机：当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能够负担购买资本家售出的产品时，资本家就不能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实现剩余价值、获得利润。因此，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减少了商品价值并增加了劳动后备大军，随着劳动力市场的紧缩，对商品的需求也下降了，这不是由于人口变化的生物规律引起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失业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有几个相互联系的导致失业的因素，但是首要的原因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资本主义部分的劳动力供应不断增长，而前资本主义部分的劳动力供应逐渐减少。然而，由于资本主义部分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前资本主义部分，在资本主义的扩展中，从前资本主义部分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比资本主义部分所能够吸收的劳动力要多得多。由于资本不断集中，这个过程逐渐得到加强，这是因为资本集中使资本家的数量减少，而使无产阶级的规模扩大。技术变化的速度及其形式，受制于适当投入的相对缺乏。在任何时期若存在对劳动力的过剩需求，则会导致工资增长、利润率下降，而这又使资本家更广泛地采用节省劳动的技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

七、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

求。此外，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将相对下降。当资本的大部分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而很少用于劳动力的购买时，劳动力后备军使得资本可以建立对劳动力的完全控制。这是保持实际工资在极低水平的关键性经济力量。这一力量确保那些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能够提高剥削率，从而提高资产阶级占有净产出的相对份额。同时，资本集中使资产阶级在净产出中所占有的日益增长的相对份额全部给予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资本家，使阶级结构日益两极分化。

在劳动后备大军之内，马克思又划分了不同的部分：流动的、潜在的和静止的。流动形式的劳动后备大军是由先前受雇于资本的失业工人所构成，这些人已经处于工业领域，后来工业界将这些工人变成后备队伍，然后再将他们招募回来。马克思说这一部分后备大军在资本需要他们时最容易得到。潜在的剩余人口是由资本主义农业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农业在农村地区造成大量不能充分就业的农业工人，并由此确保更多的工人总是能够进入城市地区。那些不定期得到雇佣且在受雇时只得到极低工资的人被归入静止的劳动力后备队伍，形成马克思所说的可供处置的劳动力的不竭库存。

因此，马克思所指的工业后备队伍是失业或待业工人的蓄水池。它在规模和构成上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受资本积累的影响：在劳动力供给方面，资本积累是一个节省劳动力的过程，从而导致工人失业；在需求方面，失业工人减少了他们对一系列商品的需求，导致一系列商品价格下跌和产量下降，因而促使生产领域失业工人的增加。然而，应该指出，机器制造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将部分地抵消其他部门就业上的减少。因此，整个影响取决于机器制造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以及该部门的剥削率。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因此，总的来说，这一过程导致了劳动力后备军规模的增加。

小 结

通过辩证地考察资本积累的性质，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每个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都要积累和推动技术变革。其他资本家迫于竞争的压力而仿效，并因此抵消先行者的革新。因此，竞争机制推动这一过程，然而，这一辩证过程导致对竞争机制本身的否定，即资本积累破坏了竞争机制并带来了垄断。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正是这一制度的成功引起其内部的矛盾，从而引起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八、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产品实现危机

导 言

对马克思来说，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这表现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技术更新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积累的增长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这又进一步引起利润率的下降。反过来，这又促使资本家积累和革新以防止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积聚和集中。该规律由两个相互矛盾的对立力量组成，这些矛盾的解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实现危机是整个经济思想史都在讨论的问题（用清楚或含糊的术语），如消费不足问题或者作为与有效需求不足相联系的问题，因此，这不是马克思理论所特有的。然而，马克思认为他对实现问题的讨论明确地限定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中。因此，危机发生的原因包括由于积累所推动的商品生产的增长（并非是使用价值增长的结果）、涉及经济变化并瓦解生产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动性以及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造成的日益增加的劳动分工等。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马克思认为利润包括租金、利息和工业利润。因此，当马克思指出利润率下降时，工业利润却完全有可能在增长，即当租金和利息下降、平均利润率下降时，而工业利润却在增长。马克思也认为总剩余价值和总利润是相等的，但仅仅当不存在转形问题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这并不有损于他的论述。如果我们认为存在着转形问题，我们就必须区分价值形式的利润率 r （灾）、生产价格利润率 r_p 和市场价格利润率 r_m （酝）。因此：

怨缘

价值形式的利润率：则(灾) 越 $\frac{\text{杂(灾)}}{\text{悦(灾) 垣(灾)}}$ 愿(页)

生产价格形式的利润率：则(孕) 越 $\frac{\text{杂(孕)}}{\text{悦(孕) 垣(孕)}}$ 愿(圆)

市场价格形式的利润率：则(孕) 越 $\frac{\text{杂(孕)}}{\text{悦(孕) 垣(孕)}}$ 愿(袁)

资本家不管 则(灾) 或 则(孕)，他们只观察 则(孕) 并根据它来调整生产。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长期的关系，适用于 则(灾) 或 则(孕)。该规律假定剥削率是固定的，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①

因此，由于机器代替劳动力，有机构成将随时间而逐步提高。因此，如果剩余价值是稳定的，而资本有机构成逐渐提高，那么 则(灾) 必然下降。个别资本家进行积累、革新并以低于市场价格而高于该产品的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商品，因而他的利润率不断上涨，直至竞争迫使其他资本家也采取同样措施，最终降低了均衡价格，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利润率不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②

因此，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性，而且这种下降不受资本家意志偏好的影响——资本家企图使利润最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2月第 1版，第 146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2月第 1版，第 146页。

八、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产品实现危机

化，结果事与愿违，利润率最终却下降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积累总是伴随着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因此即使利润率有所下降，总的剩余价值和总利润是增加的。这是事实，因为虽然资本家投入了相对多的不变资本，但是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也在增多。当然，这并不必然导致就业率的提高，因为更多的剩余价值可以从减少的雇佣工人中榨取出来，这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或降低劳动力价值而提高剥削程度来达到的。

因此，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有必要利用资本构成的概念来解释。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更清晰地定义这个概念，而且资本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概念也必须区分清楚。在许多著作中这些并不总是做得很好，这种区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①。马克思在有关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讨论中，运用了资本技术构成、资本价值构成和资本有机构成这三个概念。资本技术构成（*技术构成*）是每一生产时期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与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数量间的比例。即是说，在一给定时间内能转化为最终产品的生产资料。这不能仅用一个指数来衡量，因为它是一种物体的比例，是“不同种类的使用价值（物质输入）与劳动力数量的比例”^①。资本价值构成（*价值构成*）是生产资料现在的价值和雇佣工人的工资之间的比例，即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最后，资本有机构成（*有机构成*）是与资本价值构成一样可以表示为 $\frac{c}{v}$ 但是因为当更多的生产技术被运用时，技术构成总是增加。生产率的提高以不同的比例降低着单个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当资本价值构成以这些不断变动的价值为基础时，资本有机构成却不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因此，资本有机构成

^① 恩格斯·菲洛：《关于马克思资本组成分析的一个注解》，《资本和阶级》，第 1 卷，第 1 期，第 100 页，第 100 页，第 100 页。

的变化与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成正比，而资本价值构成并不这样。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①

因此，马克思区分了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区分了两个辩证相关的过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总是伴随着资本技术构成和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总是导致商品价值的降低。因此，资本有机构成总是和不变资本总价值与总的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这样解释：

“生产资本不同要素之间的比例，是由两种方式决定的。第一，生产资本的有机构成。我们指的是技术构成。在劳动生产力既定的情况下……原料和劳动资料的量，也就是与一定的活劳动量（有酬的和无酬的），即一定的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量相应的、表现为物质要素的不变资本量，是一个确定的量。”^②

然而，从资本有机构成的角度来分析资本就产生了一个重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6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第1版，第181页。

八、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产品实现危机

问题，因为这一系列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按照所耗费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单位价值来算出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确定某一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是由于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还是由于一生产资料价值的改变。但是，对马克思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定义说明，如果资本技术构成是稳定的，即使资本组成部分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资本有机构成也不会发生变化。马克思然后解释如下：

“如果把资本的有机构成和由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产生的资本之间的差别假定为既定的，那么尽管技术构成保持不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价值比例也能发生变动……有机变化和由价值变动引起的变化，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对利润率产生相同的影响。但是，它们之间有如下的区别：如果价值变动不单是由市场价格的波动引起，就是说，如果它们不是短暂的，那么它们就始终必然是由提供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要素的领域发生的有机变化引起的。”^①

因此，对于一个既定的生产过程，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发生的变动可能是由于二者价值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

马克思认为价值形式的利润率为：

$$\frac{\text{剩 余 价 值}}{\text{总 价 值}} = \frac{\text{剩 余 价 值}}{\text{总 价 值}}$$

因此，如果 $\frac{\text{剩 余 价 值}}{\text{总 价 值}}$ 增加，而 $\frac{\text{剩 余 价 值}}{\text{总 价 值}}$ 没有相应的增加，利润率势必下降。月法因和 蕴哈里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资本积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只有将强调的重点放在规律的趋势上时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不能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 11月第 1版，第 111页。

被误解为认为利润率会下降^①。

因此，这个规律描述了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会存在抵消这种趋势的力量。利润率在时间上不一定是固定的，增强劳动强度能够提高利润率，从而防止利润率的降低。当劳动后备大军很大时，可以使工人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再次，降低不变资本要素的价格会导致生产能力的提高，以至会降低不变资本的价值。第四，资本积累将导致人口过剩，且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新工业等都可延缓利润率的下降。最后，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合作，比如说从国外进口廉价的食物，可以降低劳动力价值，并可以降低不变资本（原材料）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因此，由于存在这些抵消的力量，这个“规律”只能成为一种趋势。

虽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技术变化必然节约劳动力，但是显而易见，运用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形成了劳动力的过剩，从而能够威胁、控制劳动力，并通过劳动力后备大军来威慑在职工人。而且，我认为利润率应在价格系统内进行定义，但是由于转形问题，我们不能弄清楚在价格领域内的资本有机构成。新李嘉图学派认为，如果实际工资不变，那么技术革新将会导致价格系统中的利润率上升。因此，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技术革新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在价格系统中），那么在新的均衡价格体系中，利润率（在价格系统中）要么不变，要么增加。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假定一种不变的实际工资，如果实际工资随着技术革新而上升时，利润率将下降。此外，在李嘉图的模型中，没有考虑到资本积累的竞争本质与技术革新等因素，如果这些被考虑进去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本质”将会导致利润率的

^① 月野法因和 穆哈里斯：《重读资本论》，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 120 页。

八、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产品实现危机

下降。

格林采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战后经济增长模式，比新古典经济学派更明确地揭示了在资本积累与利润率之间以及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此外，它认为在经过 19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停滞之后能够在 19 世纪 80 年代成功地恢复较高的利润水平，主要是由于失业人数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劳动力讨价还价的能力^①。

实现危机

实现问题并非马克思的理论所独有，事实上，它首先是被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提出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也与这个问题有关。问题的实质是对产品是否有足够的需求。李嘉图认为如果没有卖的企图，就没有人愿意生产；若不是为了购买其他东西，就不会有人去卖。“某种产品总是被其他产品或服务所买；货币只是一种交换的媒介。”^② 马克思对这个观点持批判态度，事实上他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尤其货币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交换媒介，而且它也是一种支付的方式，在支付方式发生变化时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形，即商品必须以低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此外，马克思认为货币交换发生危机时，背离活动的均衡水平的情况将会增加。他认为由于价格决定再生产过程，当价格普遍下降时，生产将停止并陷入混乱状态，这使货币作为支付媒介的功能瘫痪；同时，信用制度将崩溃，从而导致货币贬值、停滞以及再生产的瓦解。然而，马克思把带来危机可能性的因素和导致危机发生的因素区分开来。商品的买卖

^① 格林：《总体有利真的重要吗》，载自《剑桥经济杂志》，第二十一卷，第 123-127 页，1970 年。

^② 李嘉图主编：《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 年版，第 105-106 页。

仅仅由于货币的使用而变得相互分离，这就是产生危机的基础，但这些危机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里重复发生，马克思认为这种结果是由三种因素造成的。第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财富的积累。因此，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实现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了。第二，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变动的，它使经济变化加速，从而导致原有再生产模式的瓦解，因此经济危机能够导致整个经济制度的彻底崩溃。第三，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增强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产品实现危机所导致的制度瓦解会影响更多的领域。

在解释周期波动时，马克思特别强调利润和资本家利润期望值的变化中的作用。他描绘了危机发生的情况，将其分为两类：来自系统之外的偶然的震动因素和由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本身所产生的内部震动因素。马克思更加强调用后者来解释周期波动问题。而内部因素也可被分成两个决定因素。首先，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剩余价值的生产遇到一些困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第二，由于购买能力的缺乏使得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从而又进一步降低了利润率。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直接剥削和剥削的实现需要不同的条件。直接剥削仅仅受到社会生产力的限制，然而剥削的实现要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消费能力的限制（相互对立的分配关系使大多数人的消费减少到一个最低值）。并且，它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①。这种动机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本身，由于竞争迫使资本家改进生产方法以避免破产，然而，当生产力增加就会与消费关系框架发生冲突。

消费不足理论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某种因素所导致的对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1版，第404页。

八、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产品实现危机

品有效需求的不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卢森堡^①、瓦巴兰和瓦恩斯坦威齐^②对此作了最好的描述。这种理论与凯恩斯在《通论》（1933年版）所表达观点的相似性很明显。马克思从危机发生的形式不是其潜在原因的角度讨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事实上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三卷中，马克思好像否定了西斯蒙第、查默斯和马尔萨斯的消费不足理论，把危机看作按一定的周期发生，而不是长期的停滞。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尽管创造剩余价值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的目的，生产仅仅是利润产生过程中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市场上出卖商品，而这又受到社会消费能力的限制，社会消费力被剥削、竞争和积累降到一个最低点。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特殊的消费和分配条件下，周期性消费不足（生产过剩）降低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能力。如果没有周期性的混乱，这种生产过剩和资本家不能实现利润的情况将不会持续。因此，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消费不足，进而导致危机的发生，使社会不能消费所生产的产品。正如克拉克所指出，一些评论者在基于高积累的危机理论中强调劳动力供给的作用，但实际上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积累模式的基本决定因素不是工资的升降^③。因为工资的变化只不过是迫使资本家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机制。所以，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发生不能用劳动力的供给来解释，虽然工资上升对危机的形成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利润率下降时资本积累将加速，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利润率将进一步下降。此外，利润率的下降，使财富进一步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中。额外积累受到了利润率下降的限制，这将带来投机、危机、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危及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机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伦敦，1953年。

② 瓦巴兰和瓦恩斯坦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社会和经济秩序》，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7年。

③ 克拉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伦敦，1953年。

制。伴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广大生产者却被剥夺和贫穷化，这意味着一个无休止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创造和再创造生产能力和与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条件，但利润率却有着下降的趋势。此外，资本愈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将愈带来新的危机：大资本能够以较低的利润率来很快地积累，而即使小资本的利润率很高而其积累也很慢。利润较高的投资销路被大企业剥夺，迫使小资本进行投机，结果导致所谓的“资本过剩”，这清楚地说明它是一个资本扩大的过程，因为小资本太小了，经不起利润率的下降，结果是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它所涉及的机制是积累促使技术构成上升，这样，每一个工人将使用更多的原材料和更多的生产资料。结果是随着衡量标准的上升，资本构成元素的价值将会降低。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说资本有机构成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持续上升，但资本有机构成不会和资本技术构成同等程度地增长，并且，资本所有权的进一步集中将加速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表明了资本主义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导致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从而使市场延伸到世界范围。然而，资本积累的过程并不能稳定地进行，它不断地被周期性的危机和过度积累所打断，从而导致过时资本的破产和劳动储备大军的扩大。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周期循环以及该制度内部的根本矛盾的角度来强调信用制度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循环的基础是固定资本的更新。事实上，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章的一个脚注里，恩格斯指出：

“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向来十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稍微的营业好转和比较持久的不振这样一种在不同的工业国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比较缓慢的延缓的交替。但这里也许只是周期持续时间的延长。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 1825 年至 1845 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 1845 年至 1873 年，周期显然

八、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产品实现危机

是十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①

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生产资料”的不断革新导致机器的“无形贬值”。在一个周期的后期，固定资本将上升，这为下一次周期性危机打下了基础，且有一个酝酿间隔时间，此时资本被预付来购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但商品走向市场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将出现供不应求，并且对预付资本的需要将对货币市场形成压力，因为生产资本元素不断地从市场上撤回，而同等的金钱被投入市场，有效需求上升，不用它本身提供任何供给元素，这样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产原料的价格以及工资都普遍上涨，甚至在劳动力市场较容易雇佣的那部分工人的工资也在上涨。这将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不可避免的危机期，劳动力大军将又一次被解雇，工资一再下降到他们的最低点。

把资本再生产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本的投资不是持续的，这是因为不同时期不同部门对新的生产资料的需求不同。由于资本家积累资金需要一段时间，并且投资于固定资本上的货币将使货币从流通中退出，导致这些货币不能继续履行流通手段的功能，从而使价值的实现遇到障碍。

小 结

马克思认为从繁荣阶段到萧条阶段，利润率存在着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周期性危机和萧条不可避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资本积累的结果，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趋势，因为有可能存在着抵消这种趋势的因素，比如提高剥削率，或者当劳动后备大军很大时，实际工资就会被迫降低。因为利润由于剥削、竞争和积累过程而不能从剩余价值中实现，这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325 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了许多问题。因此，产品实现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即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制本身的一个结果。

九、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

导 言

米哈尔·卡莱茨基（~~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皮罗·斯拉法~~）不仅是 20 世纪最成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评论家，而且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阐述各自的评论。他们两人的观点都证明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存在着不足以及在逻辑推理上自相矛盾，并试图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中。然而，他们的分析与所得到的结论也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全不同的解释。

米哈尔·卡莱茨基（~~米哈尔·卡莱茨基~~）（~~波兰—英国~~）

卡莱茨基作为华沙格坦斯克工艺学校的一名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在早期接受了正规学校的教育后自学了经济学。他的学业曾一度因家庭贫困而中断，1928 年，他出版了《经济周期理论文集》（~~波兰语~~）（用波兰语）。该书阐述的主要观点与凯恩斯的理论相同。事实上，当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的时候，卡莱茨基正在瑞典，在那里他读到了这本他自己打算着手写作的书。然而，他从未公开提及他的更早出版的作品。在读了凯恩斯的理论之后，他来到了英国，开始在凯恩斯分析中的几个薄弱环节向年轻的凯恩斯派学者发起挑战，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卡莱茨基于 1932 年进入联合国经济事务部并担任了副部长一职，但由于当时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他于 1952 年被迫辞职，返回波兰，全身心投入到了帮助社会主义的波兰改进计划方法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技术的工作中^①。

在他早期关于资本主义的著作中，他表现出了对 19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许多问题的马克思式的洞察力，而他的著作关于资本主义的论点主要涉及在持续的超额生产能力、自发产生的商业循环、萧条的趋势和劳动力失业方面表现出的矛盾，并把这些矛盾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转的内在本质。卡莱茨基和凯恩斯主要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着各自的理解。卡莱茨基看到了充分就业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政治制约，而要保持充分就业则需要持久的财政赤字。在《充分就业的政治因素》（1934 年）一文中，卡莱茨基提出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政府知道如何做的话政府将会保持充分就业的观点是荒谬的。大公司将反对这样的政策，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政府介入到就业问题中。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就业水平的高低依赖于市场的“投资信心”，如果“投资信心”降低，私人投资就将减少，那么就会导致产量下降、失业增加。这使得资本家能够强有力地、间接地控制政府政策。因此，财政赤字被认为是危险的。他们认为“健康财政”能够使就业依赖于“投资信心”。严格地说，保持“投资信心”才是政府的工作，因为它总是代表着资本家的利益。卡莱茨基还提出公共部门与私有企业进行竞争而挤占了私有企业的空间，因此大公司对政府支出和提供消费补贴十分不满。就补贴消费而言，它由于道德问题而受到反对，“资本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要求你必须用汗水来赚取你的面包，除非你碰巧拥有私人财富。”^②最终，大公司对保持充分就业而导致的社会政治变革产生反感，

^① 索耶（1934 年）配耶：《米哈尔·卡莱茨基经济学》，伦敦，1934 年，第 78-79 页。

^② 卡莱茨基（1934 年）配耶：《资本主义转形的最后阶段》，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34 年，第 78 页。

九、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

因为在充分就业的支配下，“解雇”将失去其作为约束手段的作用。“老板”的社会地位将被削弱，工人阶级的自信和阶级意识逐步上升，从而将导致罢工和劳资纠纷的产生。卡莱茨基提出充分就业不会影响利润，因为价格的增长更有可能大于因增加工资而下降的那部分利润。然而，“在资本家看来，‘工厂纪律’和‘政治稳定’比利润更重要”^①。卡莱茨基认为资本家的“阶级利益”让我们明白，在资本家看来，持续的充分就业是不正常的，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中一个必需的部分。因此，卡莱茨基采用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国家的自主仅仅是与资产阶级个别派系的力量相比较而言的。国家行为是为了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它是这个制度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卡莱茨基关于政治的经济周期的讨论中，他断言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靠借债来提供资金的公共投资，将被用于避免大规模失业。然而，当政府企图继续这样的政策来维持高就业率以获得所谓的经济繁荣时，他们就会遭到资本家的反对。资本家们需要失业这个约束工具，他们的压力可以诱导政府回到削减财政赤字的“正统”政策上来，这种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的萧条，势必又需要公共投资的重新注入。因此，除了在经济繁荣的巅峰时期之外，政治的经济周期并不能保证充分就业。

在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方面，卡莱茨基表现出了马克思式的洞察力。在《资本家可能克服危机吗？》这篇文章中，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危机和经济波动的中期衰退阶段作了区分，若没有这种区分将会导致对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性的过度乐观主义^②。卡莱茨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中商业循环的衰退阶

^① 卡莱茨基（~~汉译本~~ 译）：《资本主义转形的最后垄断》，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37年~~，第 ~~17~~ 页。

^② 科里斯勒（~~汉译本~~ 译）和麦克法兰（~~汉译本~~ 译）：《卡莱茨基关于资本主义》，载自《剑桥经济学杂志》第十七卷，~~1967年~~，第 ~~10~~ 页。

段能够被克服，但是结构性危机却不能被克服。其决定性的因素并非是经济的，而是社会的，即工人阶级所采取的立场。《三种体系》（*Three Systems*）（*Three Systems*）主要讨论了在什么样的特定条件下货币工资的改变将引起实际工资的改变并由此导致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的改变这样一个普通理论问题。他运用再生产模型，将注意力集中于部门内部的流通，探讨了在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等式这个含糊的框架中投资品生产部门（*Investment Goods Department*）的剩余产品与消费品生产部门（*Consumer Goods Department*）的剩余产品之间的关系。在其他的理论体系中，卡莱茨基还讨论了利率、产量水平、投资和货币循环速度之间的关系。他一直对投资品生产部门的工资和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剩余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浓厚兴趣，并作出了结论：均衡在一段时期的末期是必要的，这时消费品生产部门发现一个足以处置它的剩余产品的、产生于资本商品部门的市场，从而为有目的地囤积消费者商品提供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卡莱茨基对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是如何建立的并不关注，而是像马克思一样，卡莱茨基对于关系的平衡很感兴趣。事实上，卡莱茨基并不依赖于任何的均衡观点，他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是“投资不仅被引起，而且还引起别的投资”。投资支出是有效需求的源泉之一，它能够带来经济繁荣，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投资同时是对固定资本存量的附加，而与原先的资本存量相互竞争：

“投资的悲剧就在于因有用而引起危机，这并不是理论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相矛盾。”^①

与希克斯（*John Hicks*）循环模型的循环振幅由一个上限（劳动

^① 奥斯特斯基（*John Ostry*）译：《米哈尔·卡莱茨基著作选，第一卷，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和充分就业》，牛津，*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年，第100页。

九、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

力和产量瓶颈)和一个下限(自主投资)组成不同,因为超额能力的遗存,卡莱茨基并没有使企业达到繁荣时(充分就业)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转折点由利润率和投资的关系决定。

“在繁荣时期,当投资达到它的最大限度时,将会出现以下情形:与投资变化直接相关的利润与国民收入停止增长了,但是由于净投资呈正方向运动态势,资本设备将继续膨胀。生产能力的提高并没有与有效需求的增加相匹配,结果,投资下降了,接着又引起了利润和国民收入的下降。”^①

因此,在卡莱茨基的动态经济学中,一个关键的要素是投资额的确定。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而言,这个不规则的关系是先有储蓄才有投资,而对卡莱茨基来说,与凯恩斯的观点一样,认为这个不规则的方向应该颠倒过来。但卡莱茨基与凯恩斯在某些主要方面也存在差异:卡莱茨基更多地区分了投资决定与所导致的投资行为,提出“酝酿时差”,即由接受命令、建造设备及“企业家的反应”所引起的时差。他还将财务限制纳入投资分析之中,由此,来自于此时利润的企业总投资就成为影响投资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卡莱茨基确认的其他的影响因素是每单位时间的利润变化和固定资本存量的变化。尽管这似乎与加速器模型相类似,但由于后者没有把卡莱茨基概括出来的其他投资因素考虑在内,因而加速器模型过于简单,总体上不充分,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在现存的生产能力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产量也可能增加,比如,当大量储备生产能力存在时。

在卡莱茨基看来,实际总利润由资本家的消费决定和投资决定所决定,因此,最经常与卡莱茨基相联系的一句话就是“工人花掉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掉的。”^②当总利润、资

^① 奥斯坦斯基(译)著,陈郁译:《米哈尔·卡莱茨基著作选,第二卷,资本主义:经济动态学》,牛津,悦读社,1985年,第166-167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家的消费和投资真正得到确定的时候，生产投资品部门和生产资本家消费品部门的产量和就业水平得到了确定。届时，决定收入分配的微观经济因素（垄断程度、加价百分比）将发挥出影响力，这不是通过直接影响总利润，而是通过实际工资来进行的（实际工资通过影响工资商品部门来对国民生产水平施加影响）。

在《经济周期》（~~1903年出版~~）一书中，卡莱茨基假设不存在财政赤字，而存在一个当前账户平衡，工人们不储蓄。经济活动水平由投资所决定，投资由经济活动水平及其变化率所决定，并存在一个时间间隔（~~1903年~~）。因此，在一个既定的时间点上，投资由在较早时间点上的投资水平和投资变化率所决定。

$$\frac{I}{\Delta I} \rightarrow \frac{II}{早} \rightarrow \frac{II}{\Delta I} \rightarrow \frac{III}{早} \rightarrow \frac{III}{\Delta I} \rightarrow \dots \quad \text{图 1}$$

（~~1903年~~经济活动的速度）

这为卡莱茨基关于动态经济过程的分析提供了基础，使他能够阐明这个过程与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其分析如下：资本设备利用程度的周期性波动与总产量的波动有着相似的顺序。因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相当大比例的资本设备处于闲置状态（不被使用），甚至在整个商业循环中，资本设备的利用程度实际上平均起来要低于经济繁荣时期的最大值。有效劳动利用的波动与资本设备利用的波动是相同的，因而，不仅在经济萧条时期存在大量的失业，而且在整个周期中，就业平均值也大大低于经济繁荣时期所能达到的就业最高值。由此可以看出，资本设备的储备和劳动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至少在循环的大部分时期是如此。在卡莱茨基《经济周期理论纲要》（~~1903年出版~~）一书中，他认为投资决定中，资本总积累和产生商业循环的资本存量的容量（~~1903年~~）之间的变化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这种机制所导致的总积累的波动必须在

图 1

九、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

总产量的波动中得到反映。一方面，实际总利润作为总积累的正比函数，其中总积累的增长导致利润的增长。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用总产量和单位产量的利润表示出来。因而，与投资商品的生产相等的总积累的变化（资本存量的变化 越投资的变化）与总产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形式体现出来：当投资商品产量增长时，总产量也直接跟着增长，另外，由于在消费商品部门新近聘用的工人对消费商品的需求，也会导致投资商品产量的增长。消费商品部门的就业增长又导致了消费商品需求的进一步加大。总产量和每单位产量利润的水平将最终增长到实际利润的增长与投资商品产量的增长相等的程度。然而，卡莱茨基也认为我们必须将资本家的消费变化计算在内。这种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总利润，因而会随着总积累一起增长。资本家消费量的增长将与投资商品产量的增长一样产生同样的影响，例如，资本家的消费商品的产量增加，会导致就业的增加，同时又激起工人的消费需求，使得产品大幅度增加。总产品和每单位产品的利润的增加将最终达到能够保证实际利润的增加与投资商品产量和资本家消费增加相等的程度，其结果就是资本家消费的增长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自己的利润。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通常的看法是消费越多，储蓄越少。这个观点对于单个资本家是正确的，但它不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如果一些资本家把钱花在投资或消费商品上，他们的“钱”就以利润的形式进入到别的资本家手中，所以，一些资本家的投资或消费是为别的资本家创造利润，事实上，资本家们作为一个阶级，所获得的与他们投资或消费的是完全相等的。如果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他们停止消费或投资，那么他们根本无法赚钱。因此，资本家们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的利润取决于他们的投资以及个人的消费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但究竟如何主宰取决于客观因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从而使得利润的波动不可避免。”^①

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

斯拉法出生于杜林（[Turin](#)），[1912](#)年至[1915](#)年在杜林大学学习。他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友谊始于[1926](#)年，但在[1930](#)年代他因为在意大利出版的《经济学杂志》（[Rivista di Economia](#)）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欧洲复兴和银行危机的文章《曼彻斯特卫报 副刊》（[Manchester Guardian](#)），而触怒了墨索里尼，被迫离开了意大利^源。斯拉法由于攻击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竞争条件下的报酬律》（[The Law of Wages under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Economic Journal](#)，[1919](#)）一文中的价值理论，从而建立起了他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理论家的声望。[1934](#)年，他接受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邀请担任教职，在这里一直待到了去世，他在剑桥期间影响了莫里斯·多比（[Maurice Dobb](#)）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思想发展，他的学生包括罗纳德·米克（[Ronald Meek](#)）、皮尔朗吉罗·葛莱戈纳尼（[Pier Luigi Gleasoni](#)）、路易吉·帕西纳提（[Luigi Pasinetti](#)）。斯拉法开启了关于他的《用商品生产商品》（[Producing Commodities with Commodities](#)）的大论战，但在随后的辩论中他并没有加入。

《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于[1933](#)年，它直接引发了“资本论战”，这给予曾经最喜欢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理论以致命的打击。比如，[詹姆斯·克拉克·马歇尔](#)（[James Clark Marshall](#)）（[19](#)世纪后期）认为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可以用每个因素之间的相对稀缺和它对产量的有益的贡献来解释。

^① 卡莱茨基（[Leonid Karle茨基](#)）：《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学论文选》，剑桥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 [166](#)页。

九、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

斯拉法证明这个观点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生产的各要素没有获得它们的边际产品，特别是资本的生产率没有起到解释利润的作用。（~~月深毛原手替廉~~）庞巴维克（奥地利学派）曾将生产中的生产资料还原为产品、土地和劳动等一系列过时的“原始性”生产要素。斯拉法指出在生产过程使用固定资本的地方情况不可能这样。另外，甚至对于流动资本的技术运用，庞巴维克的积累和分配理论也存在致命的缺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保罗·萨缪尔森（~~孛客弄己器~~）很快就承认这个针对克拉克和奥地利学派的攻击是成功的。然而，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理论的最重要的形式——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仍然毫发未损。特别是由于斯拉法的分析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处在一个均衡的框架中，也就使他们得以作出这样的断言。

斯拉法开始从根本上来解决李嘉图所面临的问题：使用一恒定的衡量标准，该标准却因利润率或工资率的变化而变化。始于李嘉图的长期均衡理论，斯拉法假定劳动是同质的，是整个体系的单一的不可再生的投入，它的数量是既定的。在所有的产业中，存在一个固定的投入系数，因此，生产满足按规模成比例的固定收益。^续各产业运用单一的技术生产单一的商品，也就是生产资本和同质劳动的结合。最初，他采用了能够同时引发投入—产出平衡的单一体系，将其运用于每一个商品，然后表明在生存工资的静态均衡体系中，相对价格和利润率是怎样被同时决定的。然而，勉强^湖口工资的任意变化会导致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因此，他引入了“标准商品”这一概念，在不受工资水平失真效果或利润影响下，它能够表示相对价格，“标准商品”仅由按照与可再生非劳动生产投入相同的比率进行组合的产品所组成，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代表着“标准体系”，它在任何经济体系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从而净产出与“标准体系”的投入的比率及加在工资上的净产出比例将决定整个经济的利润率。在“基本

品”和“非基本品”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分，前者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所有其他的商品的生产中（包括自身），后者仅进入到最终的消费中。“标准商品”仅由以“标准率”（它们进入自身生产时的同一比例）进入自身生产的基本商品组成。因而，“标准商品”代表了“相互联系的，不可分解的经济核心，它由基本品组成，外部被可分开的非实质的钟形外壳所包围”^①。因此，无论是依赖于利润率还是外生性的工资率，我们都能找到相对价格和其他的变量（利润率或工资率）。这是因为它们仅仅依赖与生产“标准商品”有关的技术条件，从严格意义上讲，“标准商品”代表了恒定的价值标准。

斯拉法试图说明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转形问题怎么成为一个“复杂的迂回”，以及转形问题怎样地包含了联合生产技术、单个产品活动、固定和流动资本、所生产商品投入的运用，非生产投入（如土地）的运用以及可选择的生产过程的存在等。在每个具体情况中，斯拉法都说明了均衡价格是怎样直接从生产条件和收入分配的信息中获得的：

$$\begin{aligned} & \text{过程 1} \rightarrow \text{过程 2} \rightarrow \dots \rightarrow \text{过程 n} \\ & \text{过程 1} \rightarrow \text{过程 2} \rightarrow \dots \rightarrow \text{过程 n} \\ & \text{过程 1} \rightarrow \text{过程 2} \rightarrow \dots \rightarrow \text{过程 n} \end{aligned}$$

这里：

过程 1 代表过程中的商品投入；

过程 2 代表相应的产量；

过程 n 代表所使用的直接劳动的数量。

由于从每一个过程中都可能得到一个以上的产出，因此，这个体系包含着联合生产。它也允许固定资本项目的存在，一些

^① 布劳格（1954年译）：《经济理论回顾》，第 2 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 100 页。

九、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

治经济学存在着模糊的联系，价值理论仅对特定的情况有效，而马克思自己对剥削理论的解释也表明它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然而，斯拉法的处理也不是全面的，事实上，可以把它看作是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一种形式的“解救”。另外，一些斯拉法学派的学者认为既然斯拉法的模型与马克思的一样，都没有离开经济学的“剩余传统”，又由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经济学在某些特定形式中存在着缺陷，斯拉法的这部著作事实上加强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总体上讲，量化的劳动价值论基本没有受到损伤。尽管是斯拉法这本书的标题为《用商品生产商品》，但生产却是一个内在的人的过程。在交换条件下能够发现劳动的社会分工。由于生产者以商品交换为中介与其他生产者发生联系，商品拜物教的形成又使他们彼此相互隔离，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被扭曲了，这就是为什么劳动在政治经济学中居于特殊地位的原因。

然而，斯拉法强调了两个重要的问题。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认为转形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其条件是利润额与剩余价值相等，同时在生产价格领域中的单个利润率由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决定。斯拉法认为这个观点总体上是不正确的，它只是在特定的假设中才发生。一旦联合生产、固定资本和可选择过程被考虑进去，那么它就几乎总是错误的。第二，马克思甚至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认为，价格和利润只能从具有逻辑优先权的劳动价值中获得。斯拉法认为这也是错误的。因而，“复杂的迂回”是不必要的。

然而，可以认为劳动价值论对于剥削理论来说是不必要的。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解释，由于资产阶级对经济中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进行垄断，才使得利润得以产生。阶级垄断即资本家有能力拒绝给别人使用他们所拥有生产资料的机会。由于若没有这个机会大多数人就不能生存，所以资本家对生产什么就具有实际的发言权。总的来说，利润能够用剩余劳动的数量来表示。但由

于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衡量标准，因而它对于剥削理论并不重要。此后的讨论集中于拯救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尝试，斯拉法学派认为正是由于揭示了马克思理论原有的表达方式的缺陷并显示这些缺陷与支持马克思理论的更常规的方法是无关的，才使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得以加强。

鉴于马克思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均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正确性，我们可能并不赞同斯拉法学派的一般结论，因为他们实质上采用的是均衡方法。在斯拉法的构架中总均衡价格和总均衡利润的存在是假设的。如果我们希望展现变量（给定的）、利润率和工资是如何形成的，并由此显示在这个经济体系中变量的含义，它将是合逻辑的。

第二部分 历史及其现实意义

十、垄断资本主义

导 言

当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导致了在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寡头统治的出现时，垄断资本主义就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中产生了。尽管其他的理论家也阐述过这一理论，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表述，它是始于 19 世纪末期，成熟于 20 世纪后期。马克思认为，在这样一种制度里，生产商品的产业由大量的公司组成，所有这些公司都对由市场力量导致的价格和利润信号起反应，这样的制度将是内在的不稳定的和缺乏持久性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竞争迫使公司削减成本和扩大生产规模，这就使得资本的永久性积累以及引进新的工艺和组织方法成为必然。马克思是这样解释的：

“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 12 月第一版，第 252 页。

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压力的存在，将驱使它摆脱自由竞争。因而，“竞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①

然而，尽管这样，对于实际上是什么将一种状态与另一种状态区别开来以及对于这种时期划分的基础仍存在着大量的解释。这个领域的先驱者鲁道夫·希法亭（~~马克思的追随者~~）在1910年出版了《金融资本》（~~列宁主义材料~~），这代表着一种想通过资本积聚的过程将资本积聚和公司财政结合成马克思的理论结构的尝试。他发现，在垄断条件下的价格是非决定性的，因而也是不稳定的。从本质上说，他的观点是无论在什么时候，资本积聚都允许资本家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他们的顾客和供应商不得不采取联合方式来保证他们获得额外利润的适当份额。希法亭认为，这意味着垄断“从不同来源往各个领域延伸”，因此，卡特尔化没有绝对的限制。事实上，卡特尔化将成为一种持续发展的趋势，直到最后发展为一个总的卡特尔。这种总的卡特尔将在它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1版，第125-126页。

十、垄断资本主义

的对抗形式中成为一种被控制的组织^①。然而，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史尽管展现出一种强劲的积聚化趋势，但也出现了阻碍总卡特尔形成的相反的趋势。由于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取代了过时的技术和产品，因此在新公司的形成和现存公司的破产中都可以发现这些阻碍总卡特尔形成的趋势。这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的产物，而随着这种制度的成熟，甚至这些新产品都有通过兼并与转让方式积聚在越来越少的公司手中的趋势。^②

列宁于189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的很多方面，与希法亭论述的逻辑理论都极为相近，即认为竞争转化成为以规模经济和优良技术为基础的垄断，而工业资本却成了金融资本的牺牲品。因此，列宁概括出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几种趋势：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导致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的产生；银行通过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相融合；资本输出作用的不断增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几个更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瓜分^③。对列宁来说，资本主义世界中最重要趋势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他还强调一种拥有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的崛起，但是他们在生产中不起任何作用。^④列宁认为，随着竞争逐渐消失，革新压力逐渐消失，导致一个衰退和停止的趋势，因而，世界被两种趋势所分裂，一种是资本输出的趋势，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展；另一种趋势是由权力日益集中在转化为寄生食利者阶层的金融资本集团的手中。

巴兰（1898）和斯威齐（1942）在1950年出版的著作试图说明，这种机制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据政治的、意识

^① 斯威齐（1942）在《垄断资本主义》，载伊特威尔（1950）等编：《马克思的经济学》，第100页。

^② 布鲁尔（1950）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批判的考察》，第100页。

形态的和文化的上层建筑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将后来的发展如福利国家作为解决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的措施。通过增加国家开支来解决需求短缺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但是这种措施并没有使工人阶级获益，只是用来消除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施加给资产阶级的压力而已^①。这本著作试图综合卡莱茨基（~~运普普基~~ 瓦茨）与施泰因德尔（~~列普普基~~ 瓦茨）的理论。卡莱茨基（~~运普普基~~）曾经在不完全竞争中的理论框架内发展了宏观经济学有效需求不足的命题，施泰因德尔（~~列普普基~~）用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长期停滞的情况验证了这一命题。因此，巴兰和斯威齐能够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对潜在的经济剩余来说存在着一种上升的趋势，同时也就存在着怎样吸收那个经济剩余的问题。当生产力增长促使生产成本相对于价格降低时，这种潜在的剩余会上升，但是当这种过量的生产能力不能通过价格竞争来消除时，投资就会停滞，所以这种潜在的剩余就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由于投资的刺激被减弱，垄断条件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这时，利润份额得到保持，而消费的增长却受到了限制。而其他的经济学家，例如考林（~~列普普基~~ 瓦茨）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垄断是一种不依赖于选举政治、跨国公司和福利国家而存在的一种状态。他开始通过发展卡莱茨基垄断程度的思想，然后将这一理论与工业组织发展理论与经济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考林也认为更大的国际化对于涨价的作用依赖于国内与国外市场之间竞争的巨大的不对称的存在。因此，严格地说，只有国内市场存在着保护，他们才能期望从国外削价中得到更多的利润，因而，更大的生产国际化能够产生一种减少工资的压力，从而使总需求下降。

^① 巴兰（~~列普普基~~ 瓦茨）和斯威齐（~~列普普基~~ 瓦茨）：《垄断资本：论美国社会和经济秩序》，~~列普普基~~ 瓦茨。

十、垄断资本主义

然而，这些观点由于他们的分析过于狭隘而受到批评^①。法恩和莫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模型是建立在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的，因此将经验效果转移到这些因素上是很困难的。他们也批判了考林对这些条件未做任何经验估计，因为在他的理论中缺乏生产，这就导致了剥削，因为工人为消费品支付垄断价格而被定位在市场中。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当工人被迫工作比生产工资商品所需要的时间更长时，剥削就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因此，垄断资本主义的主题包含在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吸收中，而剩余价值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结果。

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积聚

很明显，定义为公司规模绝对增长的积聚，在 19 世纪发生了实质性的增长，并且在地区间、国内以及国际间发展，其增长可以测量出来。这种现象由导致公司内部增长的积累所引起。索耶（1971）显示了马克思是怎样明确地划分资本集中与资本积聚的：集中的过程，是通过后两个或更多的公司合并形成一个新公司，或通过一个公司吞并另一个公司形成一个新公司^②。这两者综合在一起，导致了特殊行业的日益垄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程度降低，而产生这种现象的机制就是竞争过程本身。有几个竞争过程的要素导致了垄断资本主义，它是技术变化的结果。由于新技术的引进而产生的规模经济迫使公司通过投资来降低成本，当公司力争引进更多更新的资本设备和生产技术来进一步减少成本时，这就形成了累积效应。随着所有的公司都试图以这种方式来促进发展，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些公司提高了效率和

^① 参见法恩（1971）和莫芬（1971）：《垄断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月旦出版社，第 100 页。

^② 索耶（1971）：《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第 100 页。

利润，而其他的公司则亏损或一蹶不振。当这些公司在竞争的压力下破产以及积聚的水平提高时，就会产生一个垄断结构。公司的扩张也是寻找新的投资地区和新的市场，从而扩大资本家的生产领域的结果。由于可利用的新市场在短期内是有限的，这种扩张必然会使公司间发生冲突。然而，从长远看来，随着公司的持续扩张，竞争会导致更大的积聚和集中，这意味着在国内经济中不仅产生了积聚和集中，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还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地理上的扩张。

在 1898 年，英国 5 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大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5%，尽管其他主要的经济体中制造业的积聚程度在这时比英国或美国都较小，然而，在日本存在着以财阀富豪财团的形式，在德国存在着以卡特尔形式的大公司^①。在 1906 年，英国的 5 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占据了 20% 的市场份额，一直到 1928 年，都保持了相同的水平。然而，到 1929 年，这一份额上升到 25%^②。到二战结束时，大的北美公司出现了多种分工的局面，尽管这样的结构在英国是比较罕见的，但英国的制造业的积聚程度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③。最后，按照工业就业所衡量的积聚程度，制造业的三家最大的公司，在 1928 年，就业人口平均大约占据总就业人口的 15% 左右，1938 年为 18% 左右，1948 年为 20% 左右，在 1958 年增加到 25%^④。这一领域的大多数评论家都认

^① 奥尔福德（Oxford）：《1898 年以来世界经济中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 年，第 100 页。

^② 密尔沃德（Milward）：载自弗洛德（Flood）和麦克克劳斯凯（McCloskey）：《自 1870 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第三卷）》，1961—1962 年，第 1 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 年，第 100 页。

^③ 奥尔福德（Oxford）：《1898 年以来世界经济中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 年，第 100—101 页。

^④ 密尔沃德（Milward）：载自弗洛德（Flood）和麦克克劳斯凯（McCloskey）：《自 1870 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第三卷）》，1961—1962 年，第 1 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 年，第 100 页。

十、垄断资本主义

为工业积聚程度的增长是由于兼并与吞并行为造成的，而不仅仅是借助于工厂规模的扩张。^猿

历史上的合并与吞并

美国的第一次兼并浪潮始于 员怨苑年，终止于 员怨源年，这次兼并浪潮主要是由在钢铁工业（美国钢铁）、烟草工业（美国烟草）、化学工业（杜邦）和农用机械制造（约翰迪尔等）中导致了垄断或者是接近垄断的横向兼并组成。在这次兼并浪潮中，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开辟的国内市场导致了竞争的加剧，从而使得公司的扩张跨过地区界限而进入市场。这次浪潮主要是由对那些吞并者的态度越来越虎视眈眈的投资银行家提供资金支持，只是到了 员怨源年经济衰退时才停止下来。第二次浪潮开始于 员怨元年，投资银行家们在资金供给方面又起了主导作用，这一次主要是横向兼并，同时辅以大约 猿园%的纵向兼并。第二次浪潮的终止于 员怨年 员月的股市的暴跌而导致经济萧条的大爆发，当时兼并和并购的数量都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直到 圆世纪 远年代中期企业集团的时代才开始到来。

表 员圆 员 员怨缘年世界主要多国公司

公司	国别	销售额 (十亿)	总就业人数	外国就业 所占比率
阿摩尼尔汽轮机部	日本	员圆	怨	圆(圆) *
员缘年通用汽车公司	美国	员	苑	猿
西屋电气及汽轮机部	日本	员	员	猿(猿) *
索尼公司(索尼)	日本	员	员	火(猿) *
西屋电气公司	日本	员	怨	圆
云梯性汽车工业汽轮机部	美国	员	猿	猿
西屋电气公司汽轮机部	日本	员	怨	源(猿)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续 表

公司	国别	销售额 (十亿)	总就业人数	外国就业 所占比率
精工株式会社	美国	10.0	1000	10%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10.0	10000	10%
壳牌石油有限公司	英国 荷兰	10.0	1000	10%
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10.0	10000	10%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日本	10.0	10000	10% (10%) *
通用汽车公司	美国	10.0	1000	10%
大众汽车集团	德国	10.0	10000	10%
福特汽车公司	美国	10.0	10000	10%
通用电气公司	美国	10.0	10000	10%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10.0	10000	10%
大众汽车集团	德国	10.0	10000	10%
大众汽车集团	德国	10.0	10000	10%
壳牌石油有限公司	英国	10.0	1000	10%
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	日本	10.0	10000	10%
通用汽车公司	美国	10.0	10000	10%
通用汽车公司	美国	10.0	10000	10%
壳牌石油有限公司	英国 荷兰	10.0	1000	10%

* 日本公司的就业数字具有误导性。括号里的数字与对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有关。

资料来源：科祖—莱特和 罗索：《供选择的事物过多而无从下手了吗？跨国公司和国际生产地理学》，载自《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十四卷，第 1 期，第 101-102 页，1982 年。

100

十、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次浪潮始于 1929 年直到 1932 年的股市暴跌才终止，其中在 1929 年引入了垄断与兼并法案，这一法案要求如果被兼并的企业拥有 1% 的市场份额，或至少拥有一千万英镑的资产或者是有关当事者一方拥有 100 万英镑的资产，就需要贸易委员会将这一案例提交给垄断与兼并理事会。在 1929 年到 1932 年这段时期，有 100 例兼并被贸易委员会认定，但其中只有 10 例交给垄断理事会，有 20 例被禁止^①。第四次浪潮始于 1935 年，尽管兼并的数量只增加了 100 例，但交易额却上升了 20 倍。这次浪潮展现出了一些独特的特征，包括买断公司的全部股份、侵略性的吞并策略和垃圾债券融资。因而，这是第一次以卷入大规模的敌对吞并战为特征的浪潮^②。

在 19 世纪 80 年代的英国，目标公司的性质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些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凭借他们自身的规模而免受吞并威胁的较大公司，他们在受到较小的公司利用融资竞标形式进行竞争性投标的威胁时开始变得脆弱了。在 1935 年一年里，有 20 家英国公司改变了所有权（比 1929 年高出 20 倍），在 1935 年与 1937 年之间，有 100 家英国公司被吞并^③，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在 19 世纪 80 年代，兼并的大规模增加，导致了普遍的自由化与撤销管制的趋势。事实上，当时与美国公司有关的交易总额已超过了 100 万亿美元，这足以说明那时兼并繁荣的程度。在 1929 年到 1932 年，英国的交易总额是 100 亿欧洲货币单位，在 1935 年，日本有 100 例兼并和转让在

^① 密尔沃德（1935）：载自弗洛德（1935）和麦克劳斯基（1935）：《自 1914 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第三卷）》，1935—1936 年，第 1 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35 年，第 100 页。

^② 高根（1935）主编：《关于兼并与并购的著述》，牛津，1935 年，第 100 页。

^③ 格雷（1935）和姆德莫特（1935）：《大兼并的破坏：吞并战略、斗争和控制》，伦敦，1935 年，第 100 页。

公平贸易委员会有过纪录（在 1983 年增加 120 多家）^①。20 世纪 80 年代兼并的突出特征就是价值巨大，它们的跨国界的特征和兼并的显著的横向特性，在每一部门都表现得很明显^②。

格雷和麦克·德莫特认为构成大宗竞标的主要动机是全球化 and 成为产业巨头的强烈欲望以及这些在全球产业中竞争的公司对从规模经济中能够获取巨额利润的更加清醒的认识^③。严格地说，兼并已经取得成功的公司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利润的获得是非常直接明显的，由于这个竞争过程的本质，当一个大的兼并发生时，其他的资本家会仿效去保持他们的竞争地位，这不是因为毫无选择，而是由于竞争的必要性。作为相同必要性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在这方面变得国际化了，从而产生了这样的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持续的趋势，它产生于不断扩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合并与吞并行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又一次达到高峰，这一时期敌对和友好的竞标在每天的金融通讯上都有报道。这一行为包括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涉及工业、金融业和商业。因此，在 20 世纪吞并行为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兼并就越来越成为一种跨国的行为。根据与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运营有关的国外就业率，这一现象可以用表 1 来说明。

全球化

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以商品、服务和劳动力市场从地

①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市场权利的积聚和它对国际市场的影响》，纽约，联合国，1983 年，第 10 页。

② 同上。

③ 格雷（1983 年）和 姆德莫特（1983 年）：《大兼并的破坏：吞并战略、斗争和控制》，伦敦，马格道威尔出版社，1983 年，第 5 页。

十、垄断资本主义

区到国内并到国际水平的持续扩张为特征的历史。这一过程的实现，不仅商品和服务通过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货币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商品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交易。在这个领域的许多学者，尤其是那些试图驳斥全球化存在的人，在他们验证全球化的过程中或是忽略或是对这个要素视而不见^①。吉登斯（别国译）认为在国际通货交易中每天都有多于一万亿美元的交易额，“自从 1965 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机构性管理的货币增加了 5 倍”^②。基于在过去 10 年中货币商品交易额的大量增加，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确实存在，并且它总体上是一种全新的现象，是 19 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的特有现象，它不是过去的发展趋势的延续^③。然而，吉登斯过分强调全球化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单一作用，因而，就趋向于忽视贸易和资本主义企业的跨国性的作用。根据发生在某一个时间里特定点的扩张程度，市场的扩张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的结果，这不是一个很难证明的观点。事实上，按照它的倡导者的看法，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所谓的优势，它能够不断地扩大交换领域，使所有参与者获益，并通过专业化和比较优势而增加效率。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全球化的趋势始于 19 世纪英国和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在这一时期，他们为了给资本寻求最高的回报率，进行着贸易与海外投资的扩张。在 19 世纪，因为公司为了寻求规模经济和新的市场，于是这一趋势就发展到成为跨国扩张主义，尽管这一趋势分布在不同阶段，但贸易集团已发展成为当

^① 参见赫斯特（勾国译）和马和汤普森（别国译）：《正在讨论中的全球化》，剑桥，1995 年；克莱因克内希特（运国译）和文格尔（宰国译）：《经济全球化的神话》，载自《剑桥经济学杂志》，第二十二卷，1995 年，第 100-105 页。

^② 吉登斯（别国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剑桥，1998 年，第 100 页。

^③ 同上。

时的一个阶层。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跨国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时期。这个过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向工业时代过渡的开始阶段。为国内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很快扩展到出口生产，随着国际市场的发展，资本家的公司必须决定是继续扩大国内经营，还是将生产延伸到有任何市场的地方。竞争的过程保证了对资本主义企业持续地施加压力来增加规模、扩大生产，以维持其在竞争中的主导地位。

从1875年到1914年这段时期，曾经被誉为世界一体化的“黄金时代”，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一段经典插曲^①，在这个实行开放调控的时期，资本能够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到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利润也能够不受限制地转移。这一时期英国在自由贸易和为金融和商业市场提供专业技术方面扮演着领导角色。在这个环境里，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对外投资比贸易与产出的总和还要多。殖民统治机构也加紧从世界一体化中攫取利润，以增加资本输出，从而增加向其他国家的出口。技术的传播不仅仅与人口和商品的流动密切相关，而且与思想的传播有关。在19世纪第二个后半期，通过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革新，使得流动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通过国际金融业的扩张，为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提供了方便，如表1.1所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国家已在世界贸易中居于统治地位。因此，由此产生的经济资源的流动就成为新的工业技术传播的重要渠道，而使用这种方法的动力就是市场的扩张，而它本身就是对外贸易的产物。

^① 科祖—莱特（1985）：载自米奇（1985）和戈里弗·原史密斯（1985）主编：《全球经济管理》，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

十、垄断资本主义

表 1890—1913年世界贸易分布（豫）

地区	1890—1900			1901—1913		
	出口	进口	总贸易	出口	进口	总贸易
欧洲	12.0	12.0	24.0	12.0	12.0	24.0
北美洲	10.0	10.0	20.0	10.0	10.0	20.0
拉丁美洲	1.0	1.0	2.0	1.0	1.0	2.0
亚洲	1.0	1.0	2.0	1.0	1.0	2.0
非洲	0.5	0.5	1.0	0.5	0.5	1.0
大洋洲	0.5	0.5	1.0	0.5	0.5	1.0
世界	25.0	25.0	50.0	25.0	25.0	50.0

资料来源：肯伍德和拉菲德：《国际经济增长，1890—1913》，第 176 页，伦敦，1953 年。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随着借贷经济中专业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外国投资开始得到了发展，这包括在对外交换中运作的商业银行和投资机构，这两者使得对外投资具有较小的风险性和更加容易操作。用于对外借贷扩张的基金来自于那些愿意且有能力往海外投资的中产阶级的储蓄积累。此外，伦敦这时开始出现了更加多元化的经营，它开始通过使用更先进的金融手段如汇票和信用货币，来实现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扩张。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英国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就达到了 100 亿英镑，而到了 1913 年，对外投资总额已经增加了 10 倍。1913 年以后，一个更大的国际借贷时代产生了，到 1913 年对外投资总额上升到 1000 亿英镑，在 1914 年又快速上升到 1200 亿英镑^①。

^① 肯伍德（1953 年）和拉菲德（1953 年）：《国际经济增长，1890—1913》，第 176 页，伦敦，1953 年，第 176 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表 1913—1914年英国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

英国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 1913—1914年				
	1913年(豫)	1914年(豫)	1913年(豫)	1914年(豫)
欧洲	远	缘	圆	猿
美国	怨	圆	猿	猿
拉丁美洲	圆	猿	猿	猿
英帝国	—	—	—	—
印度	—	—	圆	怨
多米尼亚	圆	缘	猿	猿
其他地区	—	—	猿	怨
总数	猿	猿	猿	猿
投资总额(百万英镑)	猿	圆	猿	猿
投资总额(百万美元)	猿	猿	猿	猿

资料来源：约翰·肯伍德和约翰·拉菲德：《国际经济增长，1913—1914年》，第176页，伦敦，1978年，第176页。

一战之后到二战之前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扩张呈现出非连续状态，尽管对外贸易在量上得到了持续的增长，但增长率却明显下降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衰退阶段所作出的反应，这时美国采取的立场是通过1930年的《霍利-斯穆特法案》来大幅度地增加关税，这就使得一个国家的贸易出现剩余而导致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贸易额的直接下降。于是，世界进入了一个保护主义时期，其强度是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所没有经历过的。由于主要产品价格暴跌，债务国无力还债，其产生的间接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当时在英国也普遍存

十、垄断资本主义

在着货币贬值和关税保护的现象^①。

对于很多评论家来说，现代的试金石是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可以说这一协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创了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就业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通过专业化与出口导向发展机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力地促进了贸易与产量的增长。从 1945 年到 1973 年，全世界的产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7%。在同一时期，世界贸易以年平均 8% 的比率增长，这个比率也是前所未有的。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开始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但也同时伴随着一个向着更大的国际专业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也是与跨国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相符合的，邓宁（1980）把这一时期描述为从“黄金时期”到“全球化时期”的过渡阶段^②。

关于 20 世纪晚期的发展出现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跨国公司有利也就是对国家的经济有利，这是因为他们在对全球规模上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变得边缘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家的公司试图通过竞争的动力来把他们的竞争扩展到国际水平，以寻求对市场的主导权。吉登斯（1985）认为那种说民族国家以及政府因为全球化而变化过时的观点不正确，但民族国家和政府的“形式正在发生改变”^③。除了在马克思主义意境里我们可以说国家为了代表已经全球化的资本的利益而改变其角色进行国际合作之外，吉登斯所表达的意

^① 泰莱科特（1980）：《世界经济中的长期波动：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的危机》，伦敦，1980年，第 100-101 页。

^② 邓宁（1980）：《全球化、经济重建和发展》，日内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80年。

^③ 吉登斯（1985）：《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剑桥，1985年，第 100 页。

思根本不明确。^苑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不要把国家当作一个单一的实体来分析，不要认为对全球化的反应是全球的和同质的。国家应该依靠经济发展和经济历史的状况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严格地说，在过去，过分夸大国家的力量导致我们夸大了跨国公司增长的影响。因为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构中运作的所有国家必须确保有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积累的调控秩序，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可能需要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进行更大的合作，实际上，只有当国家都能够在这些水平上进行更大的合作时，跨国资本主义才能够繁荣兴旺。曼（~~西森杜~~）认为全球合作网络正在通过三个因素来得到加强。第一，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社会关系正在创造一个更大的全球规模的跨国联系。第二，民族国家的不同状况导致了全球网络的分割。第三，这种分割通过全球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而趋于缓和^①。这样的例子能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所采取的政策中发现。当国际生产关系在战后时期发生改变时，这些机构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实际上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和日本从重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向提供自由市场、竞争环境的方向转变，在此环境下资本积累能够繁荣起来。

小 结

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动性的结果，因此，从地方市场到国内以及到国际市场的过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必然性中的一种内在运动。因而，在商业与工业方面，市场的全球化在这种分析下是最好理解的。资本家追求资本积累的动机不仅导致了技术革新，而且还产生了扩展剥削的

^① 曼（~~西森杜~~）~~西~~：《全球化终结了和民族国家复兴了吗？》，载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 7 期，第 100 页。

十、垄断资本主义

需要，从而避免了在狭小的国内市场发生危机。然而，随着竞争力在更大的规模上导致了兼并与吞并，它也确保了越来越少的资本家能够生存下来。“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①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配泽麟、运霖、林书等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00页。

十一、失 业

导 言

在马克思的术语中，失业代表着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后备军，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产生的，同时也是其必需的帮手。马克思是这样解释的：“在一切部门中，资本可变部分的增长，从而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总是同过剩人口的激烈波动，同过剩人口的暂时产生结合在一起……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①

因此，技术进步本身是资本主义变动性的一个产物，它不仅确保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实力和技术而较少地依赖于工人，而且还可以增加劳动储备军，从而在报酬方面给那些就业工人施加压力，这样工人的力量就减少了，而他们对失业的恐惧却增加了。然而，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对失业的原因和结果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为了完全理解马克思观察这个现象的特有方式，我们来探讨一些其他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要探讨的是凯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第1版，第135-136页。

十一、失 业

恩斯经济学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区别；第二个要探讨的是包含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晕厥~~）概念的滞后理论。它们代表着最经常讨论的失业理论，而这里的意图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劳动后备军并根据经验证据来强调这些理论的不足，然后将目光集中于那些有启发性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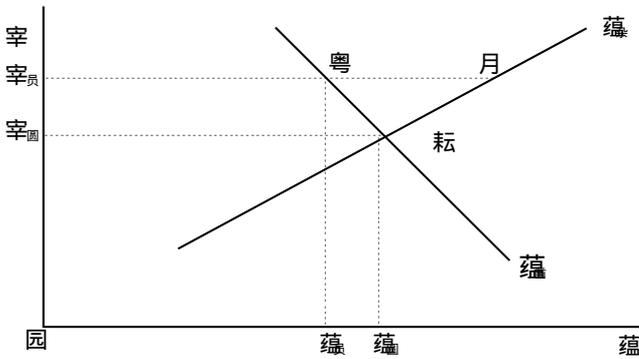


图 晕厥 劳动市场调节

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当实际工资率（宰员）超过市场结清实际工资率（见图 晕厥）时，总的失业就发生了。在实际工资率为宰员时，雇主只愿意并能够雇用蕴个工人，但是，如果在实际工资率为宰圆时，他就能雇佣蕴个工人。因此，这里失业的原因是实际工资太高。庇古（晕厥）认为，在一个竞争的经济中，那些失业者将和就业的工人进行竞争来得到就业机会，失业者唯一的选择就是以比那些就业工人更低的货币工资率来提供他们的劳动。因此，货币工资的降低将导致实际工资的降低，而这又将

导致雇主雇佣更多的工人^①。因此，在古典经济学的意义上，失业应归因于劳动力市场不能在 耘点进行结清。这个不均衡的原因（产生一个高于均衡的实际工资）被认为是工会采取了垄断的行为，它们不同意下调货币工资，因而也不同意下调实际工资。庇古认为，工人们在更多情况下只关心货币工资而不关心实际工资，这就使得他们倾向于反对降低货币工资，即使是在价格下降了而实际工资增加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而，这里的政策建议就是：劳动市场应允许自由运作而不对其进行干预，实际工资必须被允许降到均衡水平。所以，如果失业存在，那就是因为在职的那些人所获得的工资太高而使市场不能够结清。

这种失业的解释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很流行，因为大多数政治家和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工资弹性（也就是工资下降）将有利于出口。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的高成本是造成高价格、也是造成市场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除非工资减少，否则失业率将高居不下。据说，在 1924 年 7 月，鲍德温（Baldwin）首相的报告曾指出：“这个国家所有工人已降低了工资来帮助发展工业。”^②

表 10-1 1920—1925 年的失业率

年份	失业率（豫）
1920	10.5
1921	11.5
1922	11.5
1923	11.5
1924	11.5
1925	11.5

^① 特威斯克（Tweeds）著，李俊卿译：《非自愿失业：一个从凯恩斯观点出发的宏观经济学》，见《经济学译丛》，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0页。

^② 康斯坦丁（Constantin）著，李俊卿译：《战争中的失业问题》，见《经济学译丛》，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0页。

十一、失 业

续 表

年份	失业率 (豫)
1960	10.0
1961	10.0
1962	10.0
1963	10.0
1964	10.0
1965	10.0
1966	10.0
1967	10.0
1968	10.0
1969	10.0
1970	10.0
1971	10.0
1972	10.0
1973	10.0
1974	10.0
1975	10.0
1976	10.0
1977	10.0
1978	10.0
1979	10.0
1980	10.0
1981	10.0
1982	10.0
1983	10.0
1984	10.0
1985	10.0
1986	10.0
1987	10.0
1988	10.0
1989	10.0
1990	10.0
1991	10.0
1992	10.0
1993	10.0
1994	10.0
1995	10.0
1996	10.0
1997	10.0
1998	10.0
1999	10.0
2000	10.0
2001	10.0
2002	10.0
2003	10.0
2004	10.0
2005	10.0
2006	10.0
2007	10.0
2008	10.0
2009	10.0
2010	10.0
2011	10.0
2012	10.0
2013	10.0
2014	10.0
2015	10.0
2016	10.0
2017	10.0
2018	10.0
2019	10.0
2020	10.0
2021	10.0
2022	10.0
2023	10.0
2024	10.0
2025	10.0
2026	10.0
2027	10.0
2028	10.0
2029	10.0
2030	10.0

(葬 1960—1970年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率。
 (遭 1960—1970年作为总就业人数比例的总失业率。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1980)表 1和表 2 第 1—2页。

表 10.1 七个工业国家在 1960—1970年间的平均失业率

国家	1960年 之前(豫)	1961— 1965年(豫)	1966— 1970年(豫)	1960— 1970年(豫)	1965— 1970年(豫)
英国	10.0	10.0	10.0	10.0	10.0
美国	10.0	10.0	10.0	10.0	10.0
瑞士	10.0	10.0	10.0	10.0	10.0
法国	10.0	10.0	10.0	10.0	10.0
德国	10.0	10.0	10.0	10.0	10.0
意大利	10.0	10.0	10.0	10.0	10.0
日本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1980)表 1和表 2 第 1—2页。
 《英国经济增长 1960—197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 100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如表 19.1 和 19.2 所示，19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有记载的失业率在 10% 的水平上波动，高于欧洲其他国家^①。当时价格正在下降，因而在表面上似乎证明了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论点的正确性。然而，凯恩斯指出庇古的论证存在两个主要的缺陷：第一，庇古假设货币工资的降低会提高对商品的需求。然而，虽然在于一个公司工资的降低导致了其出售更多的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整个经济也是如此。事实上，凯恩斯认为如果不刺激额外的投资需求以弥补工资降低的话，那么就会产生降低消费者需求的影响。把收入从工人手中再分配到资本家手里也会降低有效需求，因为资本家趋向于比工人在消费上花得更少。这些效果综合起来会导致失业的上升，这与古典经济学家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因此，降低货币工资将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这是因为有效需求的减少会造成货币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下降。第二，他认为即使个别工人或工人团体希望降低他们的实际工资，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这是因为甚至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也认为价格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工资，因此，如果所有的工人都同意降低他们的工资，那么所有价格都会下跌，而实际工资却不会降低。

琼·罗宾逊是这样总结的：“凯恩斯革命开始于反驳当时的正统理论，即降低工资是减少失业最好的途径。凯恩斯认为，工资的降低会或多或少地导致价格水平的降低，这又会导致债务负担加重，投资收缩，失业上升。”^②

^① 弗洛德（云德学 1900）和麦克克劳斯凯（1901）合编：《自 1870 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1870—1914）》，第二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14 年，第 100 页。

^② 罗宾逊（1933）：《对现代经济学的进一步贡献》，牛津，月旦出版社，1933 年，第 100 页。

凯恩斯失业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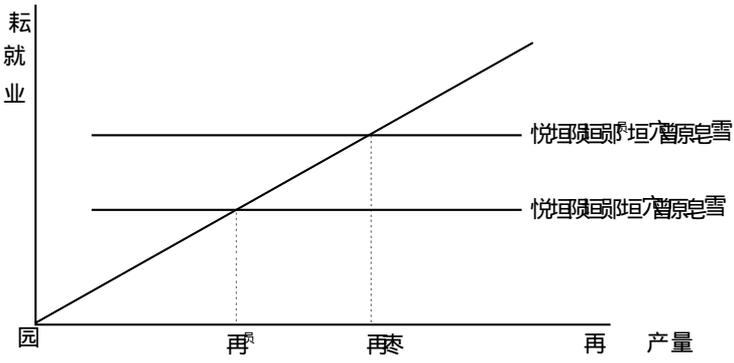


图 员 凯恩斯学派的失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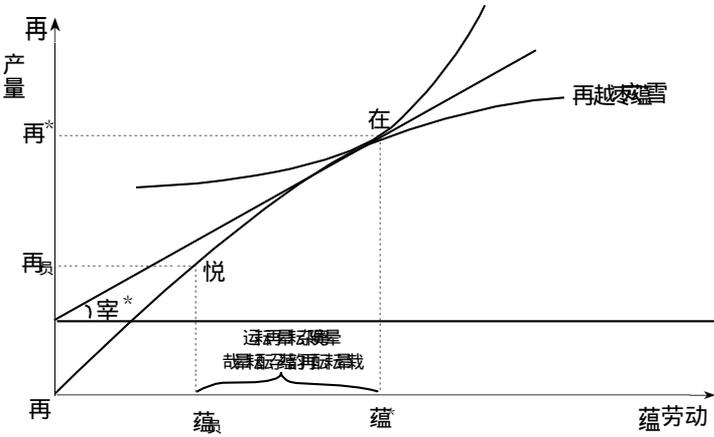


图 员 凯恩斯学派的失业——圆

凯恩斯对失业原因的解释不是求助于不正确的实际工资水平，而是把目光转向了总需求的不足。如图 15-10 所示，严格来说，责任者一定是政府，因为政府有能力通过宏观经济措施来提高总需求。因此，这里的观点是国家能够通过调控总需求水平来确保一个较高的和稳定的就业水平。因而当实际工资处在市场结清水平的时候，就可能观察到凯恩斯所说的失业因素，这能够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来说明。

在图 15-10 中，在代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所确定的点，严格来说，就是瓦尔拉斯平衡所处的地方。然而，即使实际工资是处在市场确定的水平上，也只能在 E 点上达到一个暂时的平衡，因为销售对产出具有限制作用。也就是说，公司愿意生产再数量的产品，所以愿意雇佣蕴数量的劳动力，但是由于只卖了再数量的产品，因而只能雇佣蕴数量的劳动力。这就造成了失业人数为蕴原蕴，这不是因为实际工资太高，而是因为在这个工资水平上，总需求太低。所以，凯恩斯认为，是需求而不是供给，才是造成在货币经济中失业的根本原因^①。据此凯恩斯推翻三个基本的古典经济学公理：货币中立公理、替代公理和预测公理。这就使他能够提出，是失业而不是充分就业，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正常结果。

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大萧条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产生大量的和连续的失业人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没有明显的快速调整货币工资以结清劳动力市场的趋势。1933 年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被看作是经济研究方法的革命，宏观经济分析集中在总支出、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和出口这些范畴上〔在这里超越凯恩斯主义（曾原皂）〕。各种消费的总和决定着经济的总消费，

^① 戴维德森（曾原皂）：《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曾原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5 页。

十一、失 业

总消费又决定了国民收入的总体水平。所以，在萧条时期，由于存在失业，而供给没有限制，所以唯一的限制性因素是需求。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构成总支出的最大的部分是个人的消费，而这一部分又被认为是由国民收入水平决定的，因而，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的。投资取决于单个资本家的预期，出口水平则取决于外国人的收入，因而后两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政府支出给决策者一个控制功能，使其能够通过使用财政稳定政策、税收和政府消费等手段来改变总消费水平。因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拥护国家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其中包括建立赤字来提高需求总量。在战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失业已经被克服了，因为失业率低于 10% 被看作是正常的。表 11-1 显示了对失业率估算的国际比较，表明英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着相对低的并且稳定的失业率。

表 11-1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失业率（豫）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美国	15.0	22.8	24.9	22.5	17.9
日本	15.0	16.0	16.0	16.0	16.0
比利时	10.0	10.0	10.0	10.0	10.0
德国	15.0	15.0	15.0	15.0	15.0
意大利	15.0	15.0	15.0	15.0	15.0
荷兰	10.0	10.0	10.0	10.0	10.0
挪威	10.0	10.0	10.0	10.0	10.0
瑞士	10.0	10.0	10.0	10.0	10.0
英国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月报第 10 卷第 10 号第 10 页（1934 年），第三卷，表 11-1 第 10 页。

英国 1933 年的理发师激增（月报第 10 卷）就是一个国家试图有意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以提高国民收入和降低失业的典型事例。在这之前，即在 1930 年至 1933 年这段时期，劳务大臣

10.0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詹金斯（~~詹姆斯~~）试图规划一个预算剩余以缓解经济过热。在经济学上，这一做法可以看作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通过这一方法国家能够操纵宏观经济因素，问题是操纵多少、何时操纵以及操纵多长时间。¹⁵因而经济学家努力进入构思出这些问题的模型上来，从而改进稳定政策的技巧。在 20 世纪 30 至 50 年代，尽管看起来这些模型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当我们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凯恩斯的经济模型越来越不能解释通货膨胀等经济现象。

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观点的联系是：充分就业被看作是存在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竞争框架中的一个均衡的位置。因此，通过分析工会、不完全竞争、不对称信息、有效工资和弹性劳动市场来解释经济中的不完全就业问题就成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任务。

1958 年，~~詹姆斯~~菲利普斯（~~詹姆斯~~）教授在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发现了一个决定性的、稳定的反比例关系（见表 15.1）。这一关系在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仍然继续适用。因而，较低水平的失业总是和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的，反之亦然。那么现在看来，好像政府能够选择用需求政策来降低失业水平，只要他们准备去接受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的升高。事实上，他们也只能在高失业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高通货膨胀两者中进行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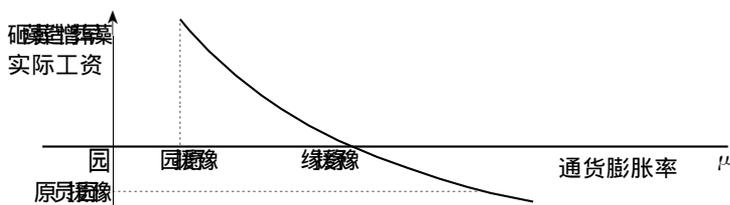


图 15.1 菲利普斯曲线

十一、失 业

然而，弗里德曼（Friedman）批评了菲利普斯曲线，因为他认为是实际工资而不是货币工资反映着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这个修正的结果是：不是存在一个菲利普斯曲线，而是对每一个可预测的通货膨胀率都有一个不同的曲线。如果当前的通货膨胀率比预期的高，那么预期将会有有一个向上的修正。弗里德曼认为，只有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被达到时的失业水平才能保证通货膨胀率的稳定。这个失业水平叫做自然失业率。而如果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减速，反之则加速。只有当失业率处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时，通货膨胀才是稳定的。

滞后理论

滞后理论的基础是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又是以三个宏观经济学观点为基础的。首先，是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认为失业的降低会加速工资性通货膨胀。第二，自发的因素如工会的存在会把系统“推向”更高水平的通货膨胀。第三，一旦通货膨胀出现并上扬，那么随着预期的调整，它将进一步升高。因此，如果失业率很低，那么通货膨胀会有一个提高的趋势，这是因为雇主会通过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者填补空缺的岗位。在供给方面，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会将在有关工资问题的谈判中处于强势。相反，如果失业率高，而通货膨胀率呈下降趋势，那么工会将处于弱势，雇主也不会试图吸引劳动者到空缺的岗位上，所以可以认为有一个临界的失业水平，在这一水平上，通货膨胀既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而将稳定在 NAIRU 点上，图 11.1。

① 莱亚德（Levy）：《如何克服失业》，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 100 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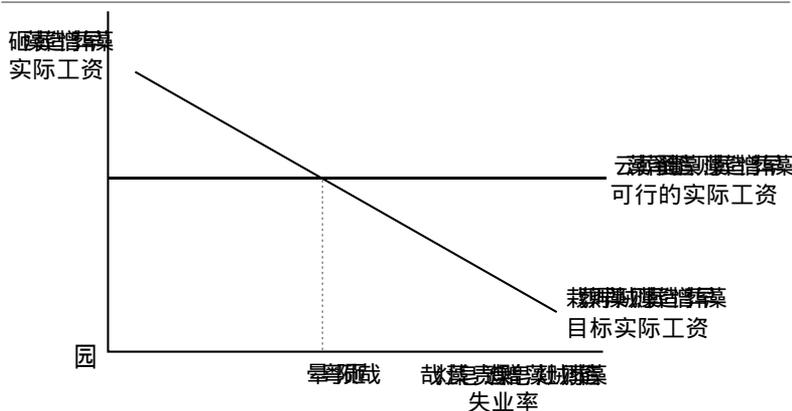


图 晕厥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

晕厥点由可行的实际工资线相交得到，它来源于这个事实：如果工人们的货币工资得到提高，公司将提高价格，因而更高的货币工资并不代表实际工资的提高，而货币工资则来源于失业水平和工会谈判能力之间的相反的关系。两者的交叉点就是可行的实际工资和目标实际工资相一致的地方，其结果就是没有通货膨胀加速的趋势。^④

滞后现象被经济学家用来表示持续性经济事件的影响。例如，晕厥点对失业历史的依赖构成了滞后，这是因为它依赖于过去的事件。晕厥点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依赖性的，因此高于晕厥点的一个持续上升的失业会导致晕厥点本身的上升。因而一个本质上静态的系统就转化为一个动态的模型。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能接受存在一个同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通货膨胀率相对应的失业水平的观点，但不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不同意通货

十一、失 业

膨胀率可能是与充分就业相联系的^①。斯克莱潘蒂（~~杂~~）认为在失业问题上有两种类型的滞后可以观察到。他用“~~泽~~”表示失业稳定时通货膨胀是稳定的，而用“~~皂~~”表示失业率连续变化时，通货膨胀是稳定的。~~他认为~~皂原~~增~~可以用“持续性”模型来解释，这一模型是在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中来探讨一个特别的失业的水平存在。然而，由于稳定的~~晕~~能独立于过去的历史而存在，持续性并不等同于滞后^②。在其文章中，斯克莱潘蒂认为，“工资矛盾曲线”存在于依赖失业变化率的通货膨胀率中，以至于一个独特的~~晕~~由于在通货膨胀稳定时的失业水平决定性地或偶然性地依赖于过去历史而不可能存在。实质上，在失业——通货膨胀协调的模型中所使用的滞后概念，主要集中在长期失业者和工会谈判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并暗示旁观者和当局者的影响可以通过旁观者希望加入雇佣劳动者大军，使得那些在劳动市场中的人对当局者的就业岗位施加压力而产生。当旁观者的人数很多时，工会代表当局者成功地进行谈判的能力就减小，反之亦然。由此可以认为，长期失业人数作为总失业人数的一部分将影响谈判关系，因为，长期失业人口的比例越高，资本家对工会的影响力就越小。换句话说，长期失业人口越多，资本家就越不能影响工会代表会员进行谈判的能力。~~源~~

从对决策者的有用性这个角度来看，~~晕~~的建构已经变得过时了。加尔布雷思（~~则~~）认为尽管它作为一个纯粹的数学建构仍然保持有效，但是，它对于决策者来说，采取追求更低的失业率的方式要比依靠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分歧的经济模型

^① 特威斯克（~~裁~~）：《非自愿失业：一个从凯恩斯观点出发的宏观经济学》，~~与~~，~~第~~页。

^② 斯克莱潘蒂（~~杂~~）：《在就业和失业中的纯当局者滞后理论》，载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十八卷，第~~源~~期，~~第~~年~~第~~月，第~~源~~页。

的预测要有意得多^①。因此，他建议应该通过设计解决当前的问题的政策，而不是将政策建议认为可以通过使用某种经济工具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变量的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尽管对于这一方式大体上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它在某些方面的缺陷把我们带回到了对失业问题的理解上。这并不是说失业或其他经济问题可以脱离整个经济体系而得到检验。实际上，就像我们在第一部分所看到的那样，必须在整个经济系统里面解决发生的问题，这样才能找到其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失业问题上，我们可以认为包含着内在的滞后理论的 旁观者模型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为它试图发现与这些联系相关的本质特征。^缘

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特征。事实上，如果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话，它就必须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内在地要求通过失业来维持一个长期的生存工资。因为根据当局者——旁观者模型，即失业的滞后观点，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受到失业水平的影响，所以，从根本上说，是劳资双方之间的力量关系决定了双方的相对份额。

这种关系在表 员和 员中可以看到，此处，失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按小时支付的工资却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由于失业率上升极快，因而工人要求提高报酬的力量在减弱。

战后的一致意见

产生于二战期间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作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种修正而出现的，并采用了与凯恩斯相关的观点，认为与资本主义有可能进行妥协。它包含三个相关的方面。第一，由于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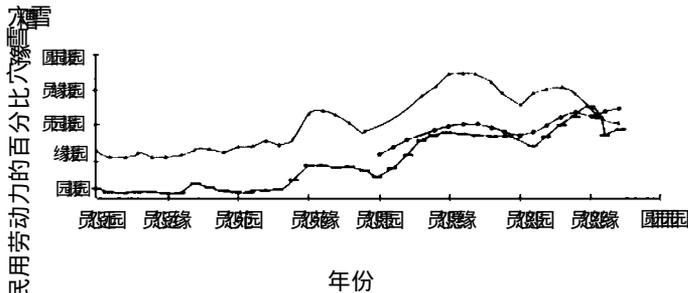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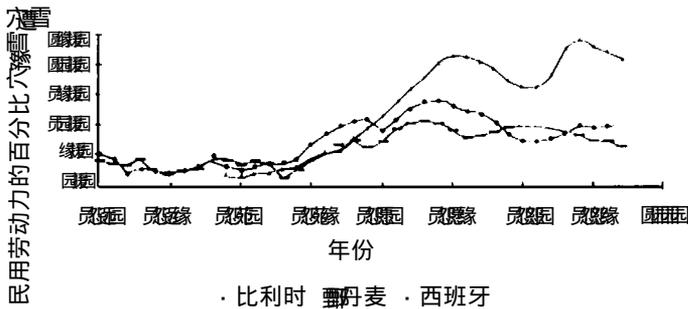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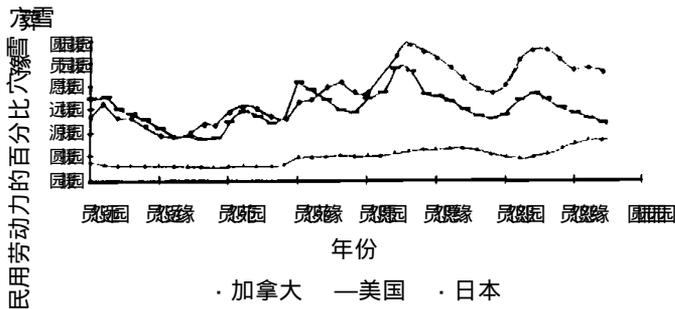
^① 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抛弃 旁观者的时间》，载于《经济观点杂志》，第十一卷，第 员期，宰宰到 员员年，第 员员- 员员页。

十一、失 业

与衰退的存在，市场资本主义是内在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不是外部震动所引发的，而是资本主义无法调控的本质所产生的结果；第二，他们认为“民主”应该保留，这造成了对高水平就业和福利的压力，同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历显示了导致法西斯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有可能爆发；第三，认为国家权利可以以一种“中立化”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并在社会上形成共识。所以，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是与广泛的选举权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密切联系的。这样两种不同的观点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们描述为凯恩斯主义的弱的版本和强的版本。在弱的版本中，国家扮演着一个有限的角色，它只能通过影响投资决策和控制财政措施来刺激需求；在强的版本中，国家扮演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角 色，因为国家开支取代了私人投资决策。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初，这两种版本都被采用过，但主要采用的是弱的版本。弱的版本被称做新古典综合体（残酷的凯恩斯主义），它形成了菲利普斯曲线。许多人认为其有限的作用是不充足的，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琼·罗宾逊认为对于长期充分就业来说，这是不充分的，国家应该取代私人投资的角色。然而，后一观点的缺陷是，它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重建，而这些改革将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卡莱茨基特别指出弱的版本可能对于长期的就业是不充足的，因为从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支付平衡问题的角度来考虑，这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这种性质的重建还会遇到政治上的障碍，特别是西欧国家会发现他们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们需要努力操纵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收支平衡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将会出现。因此，对于卡莱茨基来说，在缺乏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一个政治商业圈将形成。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将在许诺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用高失业来约束工人阶级。然而，因为他们没有着手制定这些制度，而约束工人阶级的需要也意味着要降低预期。因而，引入强的版本所要遭受的阻力是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所以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恩斯主义的失败不只是思维上和理论上的，它涉及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冲突，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用生产关系来解释这种冲突。



十一、失 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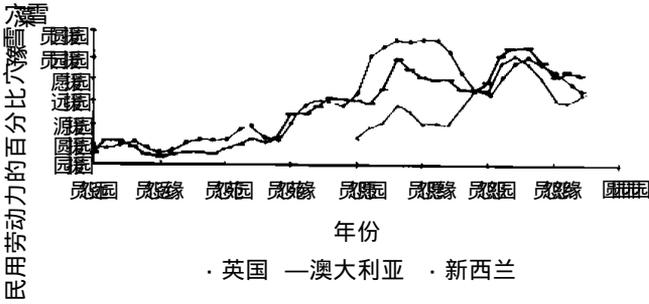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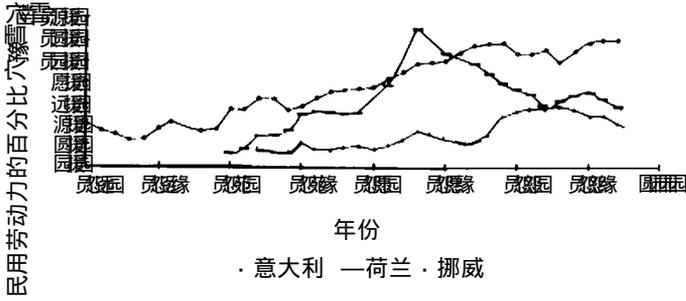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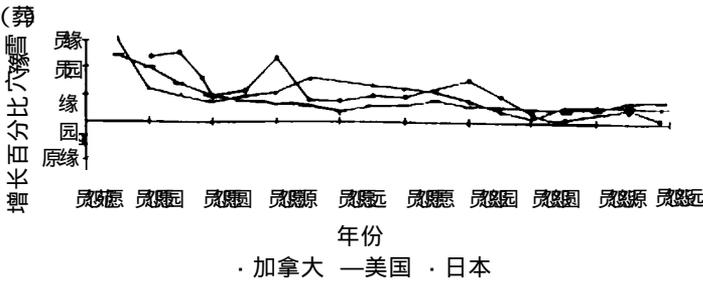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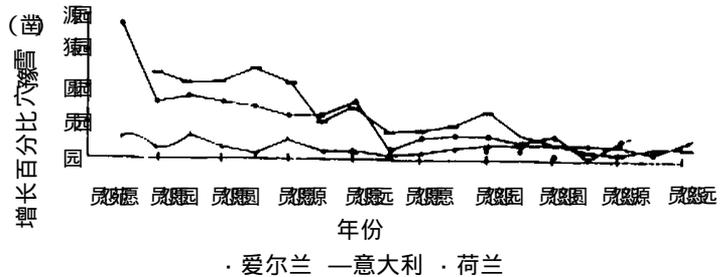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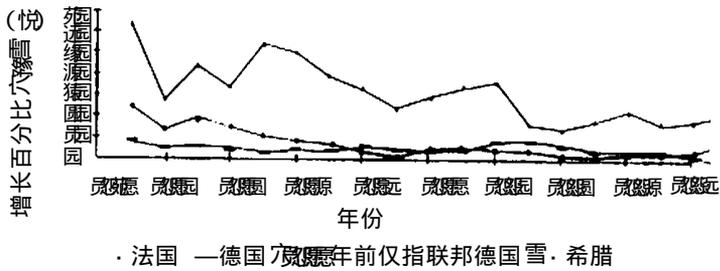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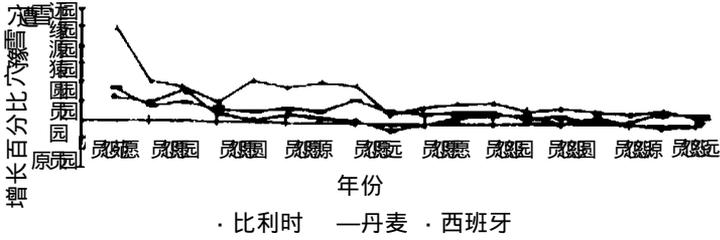


图 11-1 (续前)

城市劳动力失业率百分比资料来源：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80—1985）1985年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十一、失 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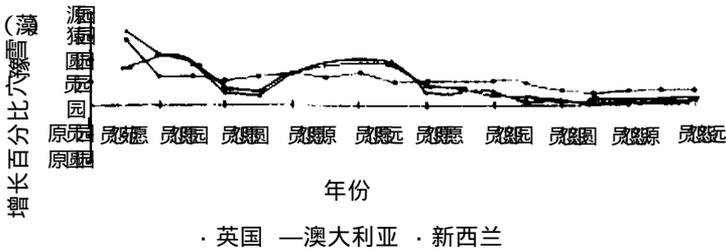


图 11-1 制造业每小时工资 (制造业)

资料来源：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76—1980年）1980年版。

事实上，凯恩斯的思想是在二战以及战后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引入的。在 1945 年的政府年度预算中，凯恩斯的思想作为赢得战争的计划经济的整体思想的一部分而被引入。劳资双方的合作被看作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这就形成了一个共识：一个可行政策的制定必须同英国职工大会（裁谈）和更加广泛的劳工运动进行协商。协商的结果是工人们被严格控制（包括禁止罢工行为）以换来实际的物质回报。尽管好像是战争和这些措施在起作用，但结果是改善了工人阶级的条件。因此，随着劳资双方对抗的结束，欧内斯特·贝文（贝文制月集论）开始在战后建立制度框架以进行经济重组。在二战期间建立了联合咨询委员会以作为工会领导人、雇主和劳工部的论坛，它采取三三制的形式，是结合主义的先驱。经济重建调查机构开始时是为了从战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其成员有 贝文制月集论（贝文制月集论），琼·罗宾逊（琼·罗宾逊）和罗依·哈罗德（罗依·哈罗德）。这是一个试图去发现凯恩斯的思想如何在一个长期的基础上得以实行的尝试，也就是如何长期地运用凯恩斯主义。另外还出版了关于社会福利的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来试图讨好在战后希望得到福利的工人阶级。由于战争的环境，这些措施几乎没有遇到反对，并为战

后的一致意见建立了制度基础。在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期，由于工党政府通过了福利国家立法、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以及以三方的形式进行合作和协商，使得与劳工的和解持续下去。

然而这一情况在 1951 年随着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而结束。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开始通过结束这种强的版本而迅速向弱的版本转换来促进经济的自由化。但是，这时已经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是以充分就业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为形式的工人预期的本质发生了变化；第二是福利国家和国家在社会政策方面承担的责任所引起的变化。这对于就业政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要求变成了权利，并且这些要求已不再是经济状况能否满足它们的问题了。国家的作用变成了繁荣和就业的担保。这就造成了一个混乱的状态，因为只有连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够满足这些需要，但同时由于国家已把这些思想束之高阁，它已经开始从强的版本中退却了。这就是卡莱茨基精心思考的方案，国家由此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从强的版本中退出，要么重新通过高水平的失业来对工人阶级进行周期性的约束，来降低工人阶级的预期。因而凯恩斯政策以构建集体协商的制度框架和通过引入福利国家而产生一致意见为基础。虽然这个过程在继续，但恢复自由贸易的努力得到了支持，英国货币再一次地成为了世界的主要货币之一。由于收支平衡问题的产生，这就导致了内外政策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又造成了在国内政策上的妥协。

因而，凯恩斯需求管理技巧的放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建和使劳资关系恢复到它以前的那种权利关系相一致的。经济的重建是全面的，私营企业不再要求国家的援助，所以，战后的劳资和解也不再必要了。因而，高就业率的政策被放弃了，而低通货膨胀、高失业的政策得到了支持。高水平的失业也使得资本家能够通过约束工人阶级来压制工资水平的增长，确保权力回到他们手中，并在价格水平的提高方面就达到了所希望的效果，同

十一、失 业

时菲利普斯曲线及 晕轮战关系也得到了重新的肯定。

小 结

在凯恩斯传统中，大量的失业分析都集中在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权力关系上。然而，这是在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状态下所产生的模式。因而，它只是一个片面的分析。所以，由于劳动后备军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就业是不可能成功的。米哈尔·卡莱茨基在他的分析中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卡莱茨基关于失业作用的讨论去掉了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天真观点，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马克思的传统中。因而保持长期的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破坏维持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资本积累。

十二、公共部门

导 言

在 19 世纪，公共部门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至于可以从国家和私人资本关系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主义从那时到现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涉及国家的职能，也没有进一步发展他的国家理论，只是提到通过工厂法案进行政府干预和国家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作用。然而，在 19 世纪，特别是自 1840 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适应资产阶级需求 and 经济环境的需要，公共部门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扩大了。不仅如此，19 世纪也出现了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范围一致进行精简的努力，尤其是在 1840 年代中期以后。二战后国家干预水平的大幅度的提高已经在过去 19 年以撤销管制的形式得到了同样很大程度的修正。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变动性，其重点已放在资产阶级的要求中，从而使得公共部门的规模和功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的反映。

公共部门规模的增长

瓦格纳（~~宰~~）定律认为在所有正在实行工业化的国家中，都存在着公共部门绝对地和相对地膨胀的趋势，并预测，由于行政和法律机构的持续扩展、对分配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调控私人垄断的需要，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在经验的层面上，很多研究都显示这一定律是当今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部门发展的正确反映。根据这一定律，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时，公共部门的相对重要性也将随之提高。事实上，在 19 世纪，国家行为在经济领域中的日益活跃是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最重大变化

十二、公共部门

之一。相比之下，19世纪是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为特征的，这在英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经济史学家对于1850年以前政府经济政策所产生影响的程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为资本主义的繁荣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同时，通过免征保护性关税促使外国商品进入来鼓励竞争和效率，而且还存在着“自然”垄断的领域，国家还通过确定服务的等级和标准使私有企业得到了规范。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的政府认为政府干预将会给劳动市场造成混乱，因而与1850年后的政府相比，它们在干预经济方面不够积极。在1850年以前，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加强了立法，但在经济方面，它们则认为可以通过健康的财政、自由贸易和社会和谐来保持市场的自由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的国家职能实际上从维护内外安全延伸到了包括收入转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扩展健康和教育等所有能够涉及的领域。表 12-1 反映了在英国国家职能的扩展程度。

表 12-1 政府总开支（总额） （单位：百万英镑）

1850	100
1860	150
1870	200
1880	250
1890	300
1900	400
1910	500
1920	600
1930	700
1940	800
1950	9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55），《经济趋势·年度增补·表格 12-1》，第 12 页。

关于公共部门的“正统观点”

比较而言，“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有一个分界，政治权力可以看作是对经济权力的一种可能的反作用力。然而，这样的分析没有从总体上抓住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国家干涉的本质，因此，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在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方面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家从本质上来讲更可能会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这是因为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国家不可能具有预测经济需求的前瞻性的洞察力。因此，政府的政策只是对当前形势的反映，尽管由于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政府的政策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在“正统”经济学中，公共部门的作用在所讨论的方式上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这是因为自 19 世纪以来，在政府干预的合法性领域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古典经济学传统理论中，亚当·斯密（~~英国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国家经济行为进行调控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是因为国家调控必然带有特权色彩，并且会造成对市场的自然进程的阻碍，但亚当·斯密认为这也有例外，那就是对一些特殊领域的保护、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建立一个司法系统来保证市场中合同的履行。一个世纪后，在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理论中，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英国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市场总体上是有序的，但是某些情况的存在会使得一些不良的结果出现在一个完全不进行调控的市场上。这些情况包括在一些地方，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原因，市场将会产生效率低下和浪费资源的后果，例如对公共服务的“自然”垄断。因此，他主张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也就是对公共教育进行立法以及通过税收和补贴对政府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因此，在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之前，传统经济学已经认识到了更大的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因为经济结构已经改变了，而且

十二、公共部门

私有企业的需求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

大量的对公共部门作用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都涉及了在混合经济中公共部门最佳产出水平的概念。在这里，他们的分析应用了完全竞争状态下的每一件产品无限弹性需求曲线的假设和均衡——边际原理来说明个别消费者中的相对消费需求。这样，商品和服务的相对消费就建立在个别消费者认为它所具有的边际价值的基础之上。这些边际价值是与它们的相对价格成正比例的。在私有企业的最优状态下，消费中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市场上购买力的边际替代率，而购买力的边际替代率又等于生产的边际替代率。通过应用帕累托（Pareto）标准（即如果至少一个人遭殃那就不可能使另一个人幸免），我们可以得出私有企业的最佳产量。然而，就它们的本性而言，纯粹公共部门商品被所有个人以同样的数量消耗掉了，事实上，差异只存在于由不同的个人所决定的产品数量的边际价值中。因此，私有企业商品有同等的价格，但其消费水平却迥然不同；而纯粹公共部门商品有不同的边际价值，却有同样的消费水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平衡分析中，公共部门商品和私有企业商品的结合可以使两类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因而可以实现帕累托有效分配。在这种形式中，可以认为，在这两种企业类型的经济中，实现公共部门的最佳产出水平是可能的。然而，尽管在这一模型中所使用的潜在假设是非现实性的，但是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总是倾向于掩饰对公共部门商品消费边际价值的偏爱。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任何客观的意义上，“正统”经济学理论都难以解释在混合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和私有企业产品的最佳分配^①。总的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是用静态方法解决动态问题，是用一种非政治的模式来说明一个

^① 阿特金森（Atkinson）和利维赛（Livesey）和密尔沃德（Milward）主编：《应用经济学》，伦敦，1978年，第171-172页。

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关于国家职能的观点总的来说就是认为公共部门的行为受资产阶级需要的支配，因此，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资本家的利益的。该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国家来为市场运作和经济活动的组织制定一个法律框架。例如，鉴于工人组织拥有与雇主相对应的权利，因而，工人组织的合法地位将对他们成功地进行谈判产生重要影响。同样，在垄断和兼并领域的立法可以在短期内对生产结构产生影响。然而，这里的问题是，所通过的立法总是尽力去迎合资产阶级以及去建立最适合资本积累的上层建筑，因而，经济的发展，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动态的背景下，就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个别资本家希望少些政府干预，但是作为一个阶级，资本家们却都需要更高水平的国家支出和立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某些需求就只能通过第三方的干预来得到满足。例如，随着市场扩大，商品必须从更遥远的地方运来，然而投资于公路对私人企业而言无利可图，因此，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者和便利提供者，在资本主义日新月异的经济环境中发挥着作用。

尽管“企业”经济的优点为新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所赞赏，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结构、组织和制度方面的权利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性。因此，为了确保这种不对称性能够促进代表公司和商业势力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运转，为了确保资本积累机会的连续性以及为了保护 and 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长久存在，民主政体顺势而生。所以，经济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制度结构或上层建筑（包括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这就是目前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框架存在差异的根源。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基本的社会制度中，不断变化的历史经验

十二、公共部门

导致了在相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存在着各种制度形式。泰索普（~~泰索普~~）认为在这种意义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多重的，都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制度法规，而且都围绕着经济行为这个核心而变化”^①。斯克莱潘蒂（~~斯克莱潘蒂~~）认为不同的产权政体和统治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具有调节剩余价值用途的能力，从而为资本积累服务”^②。

因此，国家职能的扩展由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所决定，被确保资本积累正常进行、并在阶级冲突面前维持一个和谐社会的经济环境所决定。所以，国家必须通过意识形态使工人阶级相信资本积累有利于全社会的所有人来掩饰它只代表资本家的利益来行使权力。^③鉴于起主导作用的经济环境和生产关系，使得统治阶级能够凭借其经济实力决定政府的决策。因此，它的政治和法律目标是通过制定有关工人阶级地位的适当的政策来确保资产阶级拥有剩余价值，并为资本积累提供便利。统治阶级还能够决定国家的理念，包括那些可能组阁的政党的理念。^④这并不是说国家政策的所有方面只是一味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是政府行为的受益者。因此，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也得到了增加，但是这种增加由于他们在享受国家所倡导的福利方面遭受了损失而被抵消。^⑤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卡莱茨基（~~卡莱茨基~~）认为，因为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中高水平的失业不可避免，因此，要达到充分就业就必须使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干预。首先，它需要采取涉及持续预算赤字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保证适当的需求水平；

^① 泰索普（~~泰索普~~）：《资本主义和它的未来：关于调节、政府和统治的评述》，载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 7 期，1967 年，第 27 页。

^② 斯克莱潘蒂（~~斯克莱潘蒂~~）：《资本主义的形式及其实质》，载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六卷，第 1 期，1969 年，第 1 页。

第二，由于工人阶级扩大了他们相对于资本家的权利，这就需要发展适当的制度结构以反映不断变化的生产关系。然而，这样的制度改革会涉及失业这个重要的经济控制手段的丧失。因此，~~图~~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就业时期由于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和收支平衡的危机而中断。因而，按照卡莱茨基的观点，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不是中立的，它总是屈服于大企业的压力，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反映那些压力。葛兰西（~~葛~~的观点与此相类似：“……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总体利益是对等的，国家生活被看作是主要集团的利益与和那些被统治集团的利益之间不稳定的均衡（在法律层面上）的不断形成和替代的过程，在这种均衡中统治集团的利益处于支配地位，但平衡只能达到一定点，即不能超越狭隘的企业经济利益的界限。”^① 在其他地方，葛兰西运用“历史集团”这一观点去表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其中价值和规范在调节生产关系的方面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此，历史集团是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历史创造的和社会再生产的一致^②。

社会民主党和公共部门

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修正的一个尝试，因为它从根本上相信与资本主义之间可以有一个社会可接受的妥协。这一观点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认为市场资本主义是内在的不稳定的，这一点被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所证实。这不是由外部因素所引起的，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非调控性的后果。二是认识到民主是一个永恒

^① 葛兰西（~~葛~~：《狱中札记》，伦敦，~~葛~~，第
页。

^② 葛兰西（~~葛~~：《狱中札记》，伦敦，~~葛~~，第
页。

十二、公共部门

的特征，来自选民的要求高水平就业和福利的压力不容忽视。第三，认为国家权力可以以中立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和一致意见的形成。因此，国家的职能被认为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及社会和谐机制。这种机制试图在调控框架内通过扩大国家职能的方式来克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表现得十分明显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从而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另外，在凯恩斯需求管理技术的总体架构内，国家通过对战略性产业国有化以及对公共部门商品实行免税的方式直接地采取了一些行动。这个与“黄金时期”相联系的国家调控资本主义，在二战刚刚结束和欧洲与远东国家急需经济重建的特殊环境中被引入。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新肯定，并意味着各阶级合作主义和国家调控模式的失败，这也就使得重新使用失业这个约束性工具和撤销对经济的管制成为必然。战后时期的相对和谐从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二战所造成的西方国家严重的社会混乱，英国同其他国家一样，对战争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调解，并使劳资双方得到了和解，使得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然而，正如卡莱茨基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的弱的版本之上的不安定的和平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资本不可避免地对备受伤害的劳动者有一种支配的需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变得越发明显的西方经济结构中的裂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战后重建是建立在脆弱的妥协基础之上的。这一妥协的基础在西德、瑞士和日本等国家比较坚实些，但尽管如此，这些结构的设计师仍然保留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并且劳资之间的根本矛盾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恢复社会民主党观点的尝试已经开始几年了，以赫顿（~~约翰·赫顿~~）的观点为例，他认为：“.....在经历了国家社会主义和没有羁绊的自由市场以后，20 世纪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创造一个新

的金融体制，从而使私人决定能够产生一个不太堕落的资本主义。”^①他认为所需要的是使市民社会民主化，金融体制共和化，并认识到市场经济必须通过建立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国内外进行调控和管理^②。

然而，这样的分析并没有抓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特征及其在决定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作用。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关键问题是怎样组织生产创造剩余产品和怎样分配剩余产品。在封建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与法律关系是不相符合的，这是因为地主拥有土地，农奴耕种土地，地主直接拥有农奴的劳动力，但农奴实际上拥有生产资料。产品包括农奴自己消费的部分和剩余的部分。因而，剩余产品在政治上被榨取，在物质上被掠夺，阶级斗争就围绕着这些产品的相对份额而展开。这种关系为封建制度提供了受政治压迫的劳动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既不拥有劳动产品，也不拥有生产资料，只拥有劳动力。由于剩余产品是通过经济的手段榨取的，因而它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对等主体自由交换的结果。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保证自由的劳动力和资本共存，个人自由在法律上是必须的。因此，形式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得实质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分离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制度特征，由于这种分离掩饰了生产资料拥有者的实际统治，从而使得剥削基于私利。随着代议民主制的产生，工人阶级似乎不再遭受政治上的统治了。在这一点上，列宁认为当剥削以自由交换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专制就穿上了民主的伪装，民主共和国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外壳，因而，一旦它拥有了这种外壳，就没有制度或变革

① 赫顿（匈）：《我们所在的国家》，伦敦，1844年，第 100 页。

② 赫顿（匈）：《我们所在的国家》，伦敦，1844年，第 100 页。

十二、公共部门

能够动摇它^①。根据这样的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实际权力不属于议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通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仅能腐蚀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导致工人阶级遭受更多的剥削，因为议会是由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组成的。第二，资本主义的结构决定了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建立工会来保护自己，工会本身却是中产工人阶级的政治产物，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工人遭受进一步的奴役。第三，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因为市场终将失败；议会民主制只是一种伪装和政治脱离经济的体现，因此政党就需要解释真正的权力到底身在何处。社会民主的观点注定要破产，它将导致工人阶级进一步遭受奴役，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群体的基础之上，在“自由”个体的框架内议会歪曲了真正的权力所在。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它就会对政治形式和政策设置种种限制，因为国家不只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它只能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式发挥作用。关于国家要按这种方式发挥作用的原因，这里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即工具观和结构观。

工具观

这一观点来源于马克思的有关著作，马克思认为，因为资产阶级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其对国家政权的制约，所以国家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资产阶级控制着所有的国家机构，并形成一张紧密交织的网络。因此，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面总是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来制定的。议会作为一个代议机构是无足轻重的，它只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存在。与这一观点相关的问题主要是它趋向于假设统治阶级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实体，使得它能够根据

^① 列宁（~~编辑~~，~~大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24~~年。

自身的利益来执行政策。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竞争力的本质在起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并不团结。例如在英国，不仅个别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竞争，而且，历史上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离也造成了他们的拥有者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不和。另外，政府的议会体制产生的许多政策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它必须让资本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维护^源。然而，我们可以确信，政治制度必须反映经济制度，这是不言自明的。

结构观

这种观点试图去说明在任何潜在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维护资本家们的利益的。因而，国家的作用是创造和再创造资产阶级的功能。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国家允许自由竞争，但由于大企业能够操纵经济的萧条和繁荣，所以当垄断的出现而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国家就会主动地改变它的政策。在战争期间，工人阶级的合作成为了必要，他们的谈判能力得到了增强。于是，国家的作用就被这种情况所决定，国家的职能为经济结构而不是当权者所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日益增强的生产的社会性的特点和私人掠夺的加剧，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矛盾。因此，在制定使工人阶级分裂而资产阶级团结的政策中，国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国家被看作是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的话，它所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需求日益复杂，特别是在技术和教育的提供方面，这些费用不可能由个别资本家来承担，由于劳动力为劳动者自己所拥有，如果某个资本家为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提供经费，那么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劳动者就一定在这个资本家的企业就业。当技术的获取不是专门针对一个个体雇主时，这种情况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因而，不资助教育和培训，而是把这笔钱节省

十二、公共部门

下来用来提高工资以吸引劳动者，对雇主而言，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全球化与国家

吉登斯（~~阿登特~~）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单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保持行政、经济和文化的独立权，但是当国家的权力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他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合作时，政府的民族国家特征就大大地减少了^①。在这方面吉登斯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在目前这种对国家的分析中，这一趋势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资本主义本身日益全球化，这不像在 19 世纪是通过个人侵占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方式，而是通过跨国帝国主义的方式（如跨国公司在外国直接投资和剥削欠发达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方面进行竞争来征服其他国家），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结果，经济结构正在全国与全球范围内发生着变化，因此，国家必须为适应这种转变而进行变革。在工业和金融领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性特征要求民族国家采取合作与协调的政策来维持全球市场中资本的跨国本性，从而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加强其国际竞争力。然而，鉴于这种新秩序下劳动力的作用，吉登斯关于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乐观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尽管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动到能够提供最高回报率的地方，但劳动力却不能。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移民流入来保证世界范围内的工资水平不会平均化并上扬，使剥削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从而减少在生存工资增长率方面的压力，使他们能够通过开辟新市场而抵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并最终提高剥削率。另外，

^① 吉登斯（~~阿登特~~）著，李康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剑桥，1998 年 1 月，第 100 页。

可以认为当新的合作国如伊拉克和巴尔干国家通过一系列冲突来发挥它们的影响力时，冲突使工人阶级处于分化的状态。他们也试图形成经济的和政治的集团来反映新的经济环境，因而，当资本的需求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动性而发生变化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家职能就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也正是这个变动性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厄运，因为市场的全球化使得一个地区的金融崩溃会对另一个地区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企业的问题也变得多样化了，由于资本拥有极大的流动性，投资者总是试图使其回报最大化，其结果是加快了走向垄断的步伐，并使社会回报继续下降。低工资和不断增加的劳动后备军导致了全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实现危机，即使协作国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小 结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正在陷入不断积聚的困境，要求资本更有力地控制劳动者，从而要求更高的失业率的存在，这样，统治阶级逐渐地没有了可供选择的出路。例如，为了减少有损“健康货币”名声的预算赤字，国家要么增加税收，要么减少公共开支（或者二者并用）。增加税收，特别是直接税收，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是一个事与愿违的政策，因为对那些进行资本积累的人征收高税收将会降低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他们减少投资。然而，对劳动者而言，显然不存在积极性的问题，于是，间接税收的增加就成了为各方所赞同的选择。间接税收降低了消费水平，从而也减少了投资，进而导致了更高的失业率，更低的企业利润，因此，并不能减少赤字。减少公共开支，作为第二种选择，也会增加失业，导致同样的结果。第三种选择，则具有更加罪恶的特征，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法西斯的崛起。统治阶级对经济崩溃威胁的反应是将矛头指向工人阶级，通过诉诸反动手段来攻击工会等工人阶级的集体组织。对于

十二、公共部门

这种情况，卡莱茨基作了明确的表述，他写到：“……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尽管它不赞成当权法西斯集团的思想，但也不尽力去压制它们以及限制它自身的过度狂热……我们时代的法西斯主义是一只用链子拴着的狗，它会在任何时候为了达到明确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甚至当它被束缚的时候，它也在恫吓着潜在的对手。”^①

^① 卡莱茨基（译者译名 配译）：《资本主义转形的最后阶段》，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34年，第 15 页。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导 言

福利国家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设置的一个骗局，其目的是在欧洲内战期间，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与政府合作来缓解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二战期间，对劳工所作的承诺作为与劳工和解的一部分，是为了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这个骗局就是国家提供给工人阶级一些基本的必需品，而这些正是资产阶级不能提供或不愿承担的。其中包括提供给那些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雇用的人一些最低限额的款项，而正是这些人口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必不可少的一支劳动后备军。当然，这些款项还会提供给那些由于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而不再被资产阶级剥削的人们。另外，资本主义需要一支适合需要的、健康的，同时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由此通过维持这样一支效率高而且具有可塑性的劳动力大军来促进社会资本的生产。因此并不是单个资本家提供给雇佣工人这些福利，而是因为工人阶级在收入和消费上都交了税，因此国家给工人提供了失业救济金、收入资助、国家补贴、医疗服务和国民教育。然而，虽然是工人阶级支付了这些服务的费用，但资产阶级却从中获利最多。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认为，资产阶级实际上对福利国家的集体供给都没有支付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缴纳的税款已通过更高价格的商品和服务转移到工人阶级身上了。¹因而，资本家没有付税，也没有为他们这个阶级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医疗和教育的过错负责。

福利主义的历史

在英国，福利主义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济贫法案》的引
员圆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进。这部法律从 1834 年以来为减轻贫困提供了一个法定的框架。它要求对工人的困苦要进行严格的检查才能发给救济金，而接受者至多得到现金、服装、住房和医疗照顾。到了 19 世纪晚期，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 1881 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对该法进行了一次彻底修订。这次修正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确立了新的原则，这些原则规定由教区组成团体，财产拥有者选举一个监护人委员会来执行这项救助贫困的法案。每个团体都要建立一个济贫院，这种济贫院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赤贫者才能申请救济，而户外救济只给予那些并非由自己造成贫困的人。截止到 1884 年，在英国 29 个济困法团体中至少有 20 个已建立了济贫院。中央政府通过济贫法委员会（1886 年）对《济贫法案》进行监督，到 1891 年，地方政府委员会也建立了起来，以监督地方政府日益扩大的职能。在 1894 年，实施了一项要求那些贫穷老人的近亲为赡养这些老人负责以免于被起诉的条款，另外，这也是为了充分发挥慈善团体的作用，并劝说他们向那些通过帮助可以独立的人群提供救济。在 1895 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有 100 万女性户外贫民^①。19 世纪 90 年代的大量失业使这项政策难以维系，因为济贫院不足以容纳下所有失业人口。于是，对男性的户外救济得到了拓展，但必须对他们寻找工作的意向进行测试。

在其他地区，许多镇上都有一些医务室，这些最初的义务机构与济贫法医院一起提供免费的健康保健和医疗救助。1895 年的法案为了除去贫困的恶名而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其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医疗技术和对更多疾病的成功治愈率^②。在 1900

^① 萨恩（Richard Sainsbury）：《福利国家的基础》，1964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00 页。

^② 萨恩（Richard Sainsbury）：《福利国家的基础》，1964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00 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世纪之交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基本上已经对所有年龄在 16 岁以上的孩子实行了免费教育。1881 年和 1884 年的住房法案为地方当局建房借款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在 1884 年至 1889 年间，就有 1500 万英镑被借出，其中的绝大部分款项为伦敦郡议会所承担^①。在 19 世纪末，中央政府在提供养老金和为工人阶级提供住房补贴方面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与布尔（布尔）战争（1891—1894）相关的支出阻碍了这些地区的立法。然而，公众对那些志愿军的健康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经济状况的关心，迫切需要国家采取措施来解决国家效率的问题。要求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政治家们的一种信念，那就是经济增长要依赖于有一支健康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除此之外，朗特里（朗特里）在 1894 年的社会调查以及布思（布思）在 1895 年的社会调查也指出了贫困的程度以及慈善救济制度缺乏效率的问题。所有这些情况的发展使得通过中央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干预变得更易为人们在政治上所接受。

1894 年至 1906 年自由党政府对《济贫法案》的改革，无论是从改革所引出的干涉主义哲学的角度，还是从干涉主义来临迅速的角度来说，根本上打破了以前的经济、政治公理^②。

主要法案及其影响的概要

1881 年	失业法案	建立分发自愿捐款的济困委员会
1894 年	工人补偿法案	是对 1881 年法案的拓展，据此老板有责任对工厂里发生的意外事件负责并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并对受到伤害的工人进行补偿

^① 萨恩（萨恩）：《福利国家的基础》，1906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第 150 页。

^② 巴尔（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 1 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06 年，第 100 页。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续 表

1955年	贸易争端法案	工会为了促进产业的发展而采取非暴力行为可以免于起诉
1955年	教育（食物供应）法案	允许地方政府提供给贫困孩子校餐（但不是强迫这样做）
1955年	教育（行政性条款）法案	对入学儿童进行医疗检查
1955年	试用法案	建立试用服务制
1955年	婚姻事业法案	对离异和分居的妇女提供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加强以前通过法院实施支付的立法
1955年	养老金法案	养老金从国家基金中支出，不对贫困状况进行检查；对 70 岁以上而年收入在 10 英镑以下的老人提供每周 5 先令（1 英镑 5 便士）的年金
1955年	儿童法案	对于那些忽视管教子女的父母实行惩罚，建立单独的青少年法院，并为儿童建立青少年拘留所，禁止儿童赌博、进妓院和在街道上抽烟
1955年	小片耕地和小片公地法案	通过增加工作机会而降低农村的贫困程度
1955年	贸易部门法案	对那些拥有 100 万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产业实行固定最低薪金制
1955年	住房和城镇计划法案	废除当地政府卖房给私有企业的义务，并给予他们建立新房和关闭那些不合格的住宅的权力，同时还鼓励城市发展计划
1955年	国家保险法案	在前 10 周提供给男性病人每周 10 先令（1 英镑 10 便士补贴），女性病人每周 8 先令 10 便士的补贴，提供给残疾人每周 6 先令（1 英镑 6 便士）的补贴，孕妇每周 10 先令（1 英镑 10 英镑）的补贴，使他们能够得到医生的全面治疗和抗结核病预防接种的免费治疗。捐款是 10 便士，其中个人支付 5 便士，雇主支付 3 便士，国家支付 2 便士
1955年	教育（食品供应）法案	所有地方政府必须义务向贫困学生提供校餐

就以前的改革而言，虽然这些改革可能十分全面和激进，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实际上这些改革反映了资本对提高劳动效率的需求。失业和疾病保险是建立在一个递减的税收体系之上的，且只适用于数量有限的工人。医疗保健补助只适用于那些养家糊口的人，如同巴尔所指出的那样，相似的改革已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新西兰引入^①。萨恩认为：“虽然这些新的条款有各种缺陷，但是它们代表了 1911 年至 1913 年间英国政府社会作用的十分显著的转变。”^②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在战争结束时，英国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即如何遣散五百多万军人并把他们重新纳入平民生活，而且当时有超过 200 万名的工人从事于政府的战备工作，其中 100 万直接被公共部门雇用，怎样处理这些工人呢？在 1918 年早期，政府已开始制定遣散计划，并着手恢复“正常的”经济环境。其策略就是尽快地结束战时生产，从而迅速地放松对工业的管制，即使这样做会造成短期失业的增加，然而为了阻止大量的闲置人员充斥国内劳工市场，军队遣散计划进行得非常缓慢。当时人们都一致认为，把经济从国家调控中解放出来是必须的，甚至工会也只表达了有限的反对，因为它们大多数都急切地想取消国家对劳资关系的干涉。对遣散计划的严重抵制仅仅存在于历史上强烈要求政府干涉的领域，如铁路和煤矿工业曾被要求国有化。政府对欧洲的事件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是害怕由于日益增长的工业动荡和偶发的社会骚乱而使英国处于社会革命的边缘。作为对上述情况的反应，政

^① 巴尔（1911 年）：《福利国家经济学》，第 1 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11 年，第 100 页。

^② 萨恩（1913 年）：《福利国家的基础》，1913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1913 年，第 100 页。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府于 1945 年 12 月实施了“失业捐赠计划”。此计划涉及和平过渡时期的所有失业工人，此项补贴数量第一次根据申请人所抚养的人数而决定，并且范围非常广泛。在担心爆发社会革命的背景之下，人们普遍期望政府引入“社会重建”政策。这一期望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委员会在整个战争后期曾积极地设计社会改革方案。在 1945 年 12 月的大选中，“建设一个适于英雄居住的地方”的誓言为所有政党所接受。然而，对于这个意义深远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而言，也存在着巨大的阻力，反对者中财政部的人为数不少。战争财政的重要性使得财政部在政治上得到了加强，战后，财政部坚信国家巨大战争债务的整顿不应受到新的支出承诺和义务的破坏。在停战之后，财政部平衡预算和恢复黄金标准的正统理论，很快就在政府政策中得到反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正统的理论排除了任何通过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复兴的可能性，实际上，财政部的政策是为了确保政府部门严格地去限制它们的开支水平。起初，人们感到财政部观点的影响主要是减缓了所谓的雄心壮志的战时社会和经济改革方案的实施，这包括普及中等教育的战时计划的取消以及建立综合的公共健康计划的缩减。1946 年艾狄生（~~艾狄生~~）住房法案更接近于实现重建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它承诺由财政部来补偿地方当局在一便士（~~100~~）利率以上的所有建设开支。然而，此法案最终证明是失败的，其原因包括没有去尽力限制不断升高的建设成本，没有促使私人建设者参与公共住房计划，且它只是提供给地方政府一张空白支票。有人认为，在 1945 年至 1951 年期间，政府所制定的一些崇高的战后重建计划被所谓的“在战后似乎表现得很出色的硬汉式”的政府所背叛（斯坦莱·鲍德温所描述的下院议员在 1951 年重返议会的情景）。它可能是接近于一个真实的估计，但它也倾向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那时，许多左派人士也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福利计划深表怀疑。事实上，在工会会员和地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工党政治家中提倡让医院自发提供福利的人与在职业保健工作者中的一样多，另外，从地方工党发起的改革济贫法管理的运动可以看出战后左派所强调的重点是地方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的事务。在传统的观念中也有一种低估政府干涉程度的趋势，特别是在抵消快速放松管制和遣散军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例如，在 1913 年，当工人威胁要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力时，对失业捐款救济的限制放松了，而租借限制法案在 1913 年和 1914 年大大拓展了租借控制的范围，紧急战时立法加速了从地主到佃户的收入再分配。可能所有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决定不再限定英镑同美元的汇率，并在 1919 年 1 月实行了黄金标准。尽管在一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出现了加速的通货膨胀，实行黄金标准表明政府决心要维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肯定地认为通货膨胀是可以容忍的，它可以被看作为了平息社会动荡和确保上百万失业的工人顺利地过渡到日益增长的劳动大军中去而值得付出的代价。

在 1913 年至 1914 年期间，英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改革，这或许可以通过比较政府在 1913 年和 1914 年大规模失业时期的反应而作出最好的说明。在战争开始时，政府似乎对于依赖私人慈善机构（例如威尔士王子救济基金）来减轻贫困感到满意，但是在战争结束时几乎没有人怀疑政府必须为所有的失业工人、前军人和其所抚养的人提供一个最低报酬的保障。这后来就形成了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支付方案，而不是慈善基金救济方案或 1914 年洛伊德·乔治（~~赫伯特·阿斯奎斯~~）提出的有限定额保险方案。一旦对“工作或发给赡养费”的原则作出承诺，那么如果取消它将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在英国爱德华时代的标志——绝对贫困大大地减少了（一些人甚至认为它已被消除了），尽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在英国的城市中仍然存在着贫困。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大量失业有效地摧毁了失业保险计划的基
础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基础，当失业保险基金连续出现赤字时，政府就废除了保险原则。1931年失业保险法案包含了一项条款，它规定只有那些“真正寻求全日工作但却不能获得这种工作”的人才能获得扩展的救济金，但它把已婚妇女排斥在了救济之外^①。在1931年这种尝试之后，减少保险方案费用的努力不断地进行着，尽管在1933年工党政府废除了此法案，但在1934年保守党人又恢复了它。1935年的国民政府强制实行预算削减，作为财政部正统理论的一部分，它导致了失业的上升并伴随着迅速扩大的救济金支付。随着资格标准控制的加强和这种尝试的继续，政府的反应是削减救济金的开支。由于丘吉尔和国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了大规模的削减计划，其中，健康保健制度由于政府对健康保险方案的财政削减而感到经费有些捉襟见肘。

我们认为，一战的直接后果使经济环境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它要求国家通过“政府的指针”来发展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以恢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状态并避免即将爆发的社会、经济动乱。一旦这种威胁消失了，“正统理论”的恢复则意味着许多改革受到阻碍，甚至最终停止下来。在这儿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工人阶级因为高水平失业而受到控制，而他们关于福利水平的预期被降低了。

二战后的经验

二战引起了世界经济的巨大混乱，并导致了战后经济的重大发展。战后建立了调节机制，包括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在二战结束时，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结合创造了一个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纳凯恩斯政策的有利的环境，这些都使人们强

^① 萨恩（1935年）：《福利国家的基础》，1935年，载《英国社会政策》第1卷第1期，第10页。

烈地感受到凯恩斯的影响。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人们感到政府有能力来控制经济，他们看到政府的手牢牢地掌握着经济的舵柄，因此，当必须维持高水平的产出和就业时，政府能改变经济方向。在 1916 年的财政预算中，凯恩斯的思想作为赢得战争的计划经济整体构想的一部分而被引入，因而它被视为为了战争的胜利而使劳资双方和解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战争初期，许多经济的或政治的评论家和政府顾问们都认为，对于战时经济而言，任何一个可行政策的制定都必须同英国职工大会（裁协）和更广泛的劳工团体进行协商，从而避免劳资双方在国内经济中发生冲突。由于工人们被严格地管制（包括禁止罢工行为）以换取实际的物质回报，“协商的和解”获得了发展。对于资本来说，一种超额利润税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价格而不是收入政策控制了通货膨胀。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但这些措施仍然产生了改善工人阶级条件的效果。在战后时期伊始，同劳工和解的政策被工党政府继续采用，这主要包括政府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国家计划经济的继续实行以及福利国家的引入。

1918 年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是以关于战后将采纳的社会政策的几个假设为依据的。这些政策包括：提供一个覆盖面广的健康保健体系，创立家庭补助计划，维持充分就业。这份报告预见了一个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险体系，将每周来自雇员、雇主和财政部的所有定额捐款都投入到一个义务的全国性的保险计划。在 1918 年，这个报告的大部分建议在 1919 年的社会保险白皮书中被采纳，而这个白皮书后来又变成了 1924 年国家保险法案和 1925 年国家援助法案。1928 年的国家健康服务法案也是以 1918 年的白皮书为依据的，这一法案旨在建立广泛的医疗保健体系，所需资金主要是来自大众税收。在 1928 年 7 月 1 日，法案开始生效，福利国家的时代从此到来了。^④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表 13-1 英国 1949—1983 年的福利开支

年份	绝对数(亿)	单位：1983年英镑 ¹⁾
1949	10.0	10.0
1950	11.0	11.0
1951	12.0	12.0
1952	13.0	13.0
1953	14.0	14.0
1954	15.0	15.0
1955	16.0	16.0
1956	17.0	17.0
1957	18.0	18.0
1958	19.0	19.0
1959	20.0	20.0
1960	21.0	21.0
1961	22.0	22.0
1962	23.0	23.0
1963	24.0	24.0
1964	25.0	25.0
1965	26.0	26.0
1966	27.0	27.0
1967	28.0	28.0
1968	29.0	29.0
1969	30.0	30.0
1970	31.0	31.0
1971	32.0	32.0
1972	33.0	33.0
1973	34.0	34.0
1974	35.0	35.0
1975	36.0	36.0
1976	37.0	37.0
1977	38.0	38.0
1978	39.0	39.0
1979	40.0	40.0
1980	41.0	41.0
1981	42.0	42.0
1982	43.0	43.0
1983	44.0	44.0

¹⁾按 1983 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见《英国经济史》第 10 卷（1983），表 10.1 和 10.2。

表 13-1 说明了福利开支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迅速增长，特别大的增长趋势是在过去 10 年。这与此时期所采取的政策形成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明的对比，实际上在过去 15 年里所采取的政策是尽力地减少福利开支的规模，这就产生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劳动后备军的存在，而在福利国家的条件下，工人的预期导致将对就业者所征收的税款提供给组成劳动后备军的那些人。在能够以及应该提供的服务方面，这种预期还在国家健康服务部发挥了作用。在这里，技术的进步使可利用的服务得到增加，同时延长了预期寿命并提高了对服务的预期。而且在教育方面，更复杂的技术需要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因而，需要一个有比较高的受过教育的劳动人口，这就提高了对教育系统的预期，以至于有更多的人期望接受大学教育。这些领域的开支迅速上升，如表 15.10 所示。

表 15.10 政府在实际项目的开支（单位为 10 亿英镑，按 1967 年的价格）

	1952	1957	1962	1967	1972
社会保护	12	18	24	30	36
健康	10	15	20	25	30
教育	5	7	9	11	1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79），《社会趋势·表 15.10》，第 15 页。

工人阶级的预期

战后伊始，主要由于重建的需要，开始于战时的与劳工和解的政策被工党政府继续采纳，这包括国家和工业部门间的合作与协商，国家计划经济的继续实行和福利国家的引入。较大公司的利润普遍比以往更高，但是中等或较小的公司则没有那么幸运，这是由于权力被给予了较大的公司。同国家的密切合作导致了为工业服务的官僚机构的增加，然而，这种现象在 1951 年随着保守党赢得大选并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而突然终止，也就是说，他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们终止了凯恩斯主义的强的版本而很快地转向了弱的版本。然而，这时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随着充分就业政策的采纳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标准的提高，工人阶级预期的本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二，福利国家所引起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描述为重视社会权力的公民权制度的发展，这种社会权利就是经济福利和保障的权利，包括在任何既定的时间享受社会中最高物质标准的权力。这对就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由此要求就变成了权力，问题变为不管有没有能力承担都必须承担。然而，如果“正常的”生产关系被重建时市场环境不允许充分就业，而工人继续要求把就业作为一种权力，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因此，国家的立法作用就成为经济繁荣的保证之一，就业和享受福利的权利也就变成了社会权利。¹⁸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两难的矛盾，因为只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满足这些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同时在国家已经采纳了这些意见时，保守党政府却开始从凯恩斯主义的强的版本中退回，也即卡莱茨基所说的在强的版本或通过高水平的失业来控制工人阶级之间、降低工人预期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当时恢复自由贸易的尝试得到鼓励，英镑又变成为世界的主要货币之一，但是建立福利国家的国内政策与以此方式使用英镑的对外政策却是相互矛盾的，其结果是导致了国内政策的妥协。因此，随着作为社会福利制度保证的国家立法作用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的这种弱的版本已不能再提供曾经许诺的商品了。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为止，凯恩斯政策所预示的表现为经济成功显然已不能持续下去了。整个战后重建时期，随着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这种地位在 20 世纪 70 年代遭到了破坏，那时，美国通过扩大美元的世界供应来资助越南战争，因此给其他货币特别是德国马克造成严重的压力。曾提供相对稳定的汇率并作为战后经济稳定主要象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崩溃了，20 世纪 80 年代的那种浮动汇率

制得到了恢复。1973年至1979年间石油价格的上涨所造成的不稳定以及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日益强大对既定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了威胁。很明显，凯恩斯主义的弱的版本已越来越行不通了，并出现了理论上的真空状态。当西方国家正努力克服高失业率和生产不景气等问题时，政府在这时转向了货币主义之类的信条，这是对20世纪70年代的政策即财政部观点的一个隐蔽的恢复。这在英国表现得特别明显，从1979年工党统治时期开始推行的货币主义所限制的凯恩斯主义，到1981年至1986年撒切尔保守政府推行的全面的货币主义，以及直至今天的财政部正统理论中都可看到其存在。

政策中的这些变化是重新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自由化的一个反映，其直接后果就是国家放弃维持充分就业的承诺，而把权力还给资产阶级。然而，福利国家的存在要求持续的经济增长来提供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和充分就业，以税收收入来实现在社会保护、健康、教育方面的预期。另外，经济自由化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上升，在社会安全网方面给福利国家施加了更多的压力。1979年以来的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在战后英国是前所未有的，如最穷的1%的人口得到的份额从1979年至1986年的1.7%下降到1985年至1986年的1.4%，而同时期最富的1%的人口获得的份额却从1.4%上升到1.7%^①。在过去10年里大规模失业的再次出现，极大地促进了这种不平等的上升，但这对经济的间接影响却明显地显示出自相矛盾的一面：福利国家的存在需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但若没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能提供经济增长。因此，要么经济必须返回到战后伊始的强的版本中去（鉴于国际和国内的不同经济环境，

^① 古德曼（见参考文献）等编：《英国的不平等》，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观点)，要么通过“道德上的再教育”来大大降低工人阶级的预期。后一方案自 1980 年以来已为连任的保守党政府所实行，并继续为目前的工党政府所沿用。从福利国家的角度来看，这需要个人在私人养老计划、私人健康保险、失业保护保险和支付较高教育费用等方面为他们自己作更多的准备。其根据是，个人应该通过推迟目前的消费为不确定的将来作准备，来对自己的福利负责，以此减轻国家的负担——也就是国家不需再为整个社会承担责任。这一策略的实行事实上也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由于所需的这支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并不能推迟他们的消费来支付私人保险，因此福利国家安全网仍需存在，而这又要求那些在职工人必须通过纳税来作贡献。然而，当纳税者们开始质问为什么他们一方面为福利国家进行捐赠而另一方面却又必须自己购买保险时，福利国家的本质则变得更加明晰了。政府财政的压力可以用表 13.1 所显示的公共部门在净资金需求方面收支的差额来表明。^源

表 13.1 公共部门净资金需求（百万英镑）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8），《经济趋势·年度补充表 13.1》，第 13.1 页。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重新强调所引起的不平等的上升以及劳动后备军的增加，对于作为重建时期历史遗产的福利国家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影响。因此，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在早期为了确保获得工人阶级支持起重要作用的制度，现在却成了自由市场的重担，并使剥削制度更加透明。只有继续将福利国家废除，才会产生使经济上层建筑恢复到资本主义不受束缚的状态，至少在短期内看是这样，但是这需要工人阶级预期的迅速改变。

第三条道路的欠缺

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认为，福利国家需要一套清晰的市场运作的界限来促进某种形式的社会团结，并根据它的社会效果进行调控，通过某种形式的分层捐助来提供资金，从而使一些个人能够缴纳比最低救济金水平高的金额来使他们获得更高的保险^①。他们认为尽管仍应继续支付失业救济金，但应该有一项限制性条款能使个人积极地寻找工作，同时国家在他们失业一段时间后应为他们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对于这些评论者来说，福利国家的改革涉及国家和资产阶级在福利的产生和分配方面的合作，即所谓的“社会投资国家”和“积极的福利”^②。尽管“第三条路”的明确含义很难表述，但是有一个定义应该是“……一个更加欧洲式的社会团结、公民权、混合经济和高投资的模式”^③。然而这项政策的目标却是不一致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需要为剥削劳动力和资本积累提供条件，但严格说来，

① 赫顿（勾勒社 宰郎）：《我们所在的国家》，伦敦，~~灾~~1971年，第 102-103页。

② 吉登斯（~~原~~译 宰郎）：《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剑桥，~~马~~1998年。

③ 赫顿（勾勒社 宰郎）：《我们所在的国家》，伦敦，~~灾~~1971年，第 102页。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国家和资本家之间不可能存在长期的妥协。他们提倡恢复到曾失败过的各阶级合作主义的模式，但这一模式将来仍注定要失败，这并不是由于任何个人意志的缺乏，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变动性的因素。例如，充分就业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只有当它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时才可能被容忍。类似地，因为充分就业将与刺激工人阶级提高生产率所需的社会不平等相矛盾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质，使单个资本家必须同那些不把社会福利事业当作先决条件的人相竞争，所以福利国家不可能变成某种国家与资产阶级一起投资的慈善机构。在许多方面，那些被提倡的政策都使人想起上文所描述的 19 世纪末的观点。

因此，“第三条路”只是为了表示它是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一种措辞。它是试图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问题，并使社会市场的经济问题内在化的一种混合物。现实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以此种方式进行改革，实际上，国家也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在这样一个“民主”的框架下推行必要的改革。因而，“第三条路”的倡导者试图恢复在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重建时期所成功运用的那种模式，但半个世纪后在国际国内形势完全改变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已不能复制。这种模式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不是一张可以印刻成功蓝图的白纸，我们不是生活在罗尔斯（~~砸碎罐子~~）的原生态中，在那里，社会契约可以协商，好像我们全都生活在子宫里一样。事实上，20 世纪末期的资本主义正处于另一场危机的边缘，一场因福利国家的遗产而加重的危机，如果“第三条路”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一种反应，那么，它比上一次社会民主党对危机的反应更加拙劣，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它正在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寻找它的解决方案。

小 结

福利国家的危机本身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因为它的存在是源于战后为经济重建而与劳工进行和解的需要。然而，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新凸显的时候，它自己却成了资产阶级极其讨厌的东西。开始它是一个巧妙的欺骗，所提供的福利是由工人阶级自己支付的，这就是对充分就业承诺的履行。当对获得工人阶级支持的需求减弱时，这种政策的优先权就向资产阶级所需环境逆转，也就是失业的环境，以此来作为一个约束工人的工具。然而福利国家的遗产保留了下来，而且由于工人阶级预期已经确立，该遗产很难消除。这就留给国家一项不能完成的任务，要么提高受雇者的税收，这样将会减少消费，引起产品实现危机；要么削减社会保护、健康、教育方面的福利开支，但这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行的，因为工人阶级已历史地形成了一种预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曾面临的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只是多了福利国家的复杂性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日益加强。

十四、结 论

在本书主要部分的讨论中，我们试图弄清楚：自从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发表《资本论》以来，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否依然对当代社会的发展有指导意义？答案在于经济、哲学和政治思想等几个领域，在于对马克思的方法及对该理论所处框架有效性的理解。然而，一些人把这种解释至多当作一种有偏见的分析，甚至把它当作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歪曲。因此，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着一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分析及对其中各种因素作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新古典主义者采用了一套与事实不相符的假设，诸如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及固定投资的收益。另外他们还采用了效用度量这个不适用于个人更不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方法，忽视了时间因素，而把理论和政策建立在这些不可能的构想之上。另一些人试图建立一种以自由竞争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模型，这种模型采用国家干预的方法来克服因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不适应社会发展而导致的后果，但它不能克服市场体制本身的矛盾。这些人所缺乏的是一种分析框架，该框架能够考虑到整个体制、该体制的矛盾及其相互联系的发展本质。因此，他们可以真正被描述为有偏见的分析，从而他们的政策处方在运用中也是有偏见的。据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是先进的，因为它运用了辩证法（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变动性）和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要想理解一个社会，就必须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发展中了解那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是在此基础上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而产生的，它确保统治思想来源于统治阶级，即所谓的“意识形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生产关系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时，上层建筑也随之改变，而不是像新古典主义范例所认为的那样，先塑造个人，然后把其结果与社会整体相联系，这是因为对社会的个别方面的理解来自于对社会结构总体的理解。因此，这种范例是充满活力的，它可以穿越时空，这种方法并非特定于 19 世纪后半期，今天它仍然适用。从逻辑上讲一定如此，因为驱动力是历史，历史事件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把价值理论作为解释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重要工具，并且强调了经济范畴的历史相对性。价值关系特定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价值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商品生产者进行的商品交换产生了这些商品间的数量关系，商品的交换价值显示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因为商品可以还原为都是劳动产品这个共同特性，商品的价值就可以用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有了这个理论构建，就可以显示在劳动力对于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大于其交换价值的条件下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并且资本家通过剥削就可以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一个人通过对经济结构首要性的了解，达到对系统整体的透彻理解，那么得出上面的结论就成为必然的了。孤立地看每个企业，这似乎不符合逻辑，但是单个企业并不能代表整个经济。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批评是关于所谓的“转形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那些想找到“完全的”解决办法的人们和那些想证明根本不存在一个解决办法的人们，整个的争论可以用“复杂的迂回”这个词来解释。关键在于马克思不是用数学的运算来证明每一个价值和每一个剩余价值都可以变换为一个价格和一定量的利润，或者价值的总和等于价格的总和；而是通过这种机制来揭示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劳动力价值怎样“变为工资”，剩余价值怎样“变为利润”。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十四、结 论

根本不存在一些基本的错误，马克思本人提供了一种“完全的解决方法”，显示了价格只是价值的外在形式，是流通中价值的对立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不同程度的抽象，使一些人感到某种程度的不连贯，从而导致了许多的混乱，但在这里我要重申两点：首先，马克思所用的这些不同程度的抽象是他的唯物主义方法中的一部分，且因马克思所阐述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其次，三卷之间许多所谓的不连贯与恩格斯在编辑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时遇到的困难有极大的关系。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形为利润在逻辑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并揭示了价值在逻辑上优先于价格，剩余价值在逻辑上优先于利润，因为价值和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而价格和利润产生于流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并不存在转形问题。至于是通过对一些部门进行数学运算或是通过为经济整体建立模型而达到这个过程，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关。关键不在于证明它是否能被达到，而在于揭示它怎样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变动性的整个理解的一部分。

资本主义的变动性也必须作为一种历史进程来理解，这个进程经过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是通过它们特定的财产关系形式来区分。因此，资本主义形式是随着早期社会形式的瓦解而出现的，而这又归因于早期阶段的矛盾不能得到克服。这涉及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财产关系的每个改变都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结构。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来源于封建生产模式的缺陷。因此，了解资本家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方式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指出盗窃、海盗和奴隶制是这种原始积累的重要方面。在英国为进行这种原始积累和为工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圈地运动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关于这方面产生了大量的争论。在这里马克思仿佛又被误解为认为英国政府是帮凶，故意地提供立法，使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掌握生

产资料并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可资剥削的城市无产阶级。事实上，马克思所指的并非是这种故意的决策过程，而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使这种决定不可避免；并非所有的土地都被《议会法》所圈占——当需要时，无论有没有议会的批准，所有土地都要被圈占。原工业化理论倾向于把它放在一种背景下，揭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进程是怎样地在几种不同水平上、因部门和地区不同而以不同的速度进行的。因此，原始工业化理论虽然不是以充分的论据来证明马克思的模型，但它确实有助于理解那些由于社会制度所固有的矛盾而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程。同样地，马克思使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模型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变动性，这里需重申的是，马克思不是在考察资本主义的增长进程，而是在揭示即使使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也可以证明价值在逻辑上优先于价格，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因此在逻辑上优先于利润。这与资本主义的相关性表面上似乎有点模糊不清，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中的矛盾将导致它的垮台，那么在其废墟上将产生一种不同的适合情况的财产关系，而这并非一定是武装冲突的结果^①。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固有的矛盾与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及相应的对剩余价值占有的日益集中有关。其原因在于不是每个资本家个人，而在于这个制度的总体必须用新技术来代替劳动力^②。失业是一个长期保持生存工资的条件，这个过程确保了劳动储备大军的人数是资本家保持剩余价值水平所需力量的反映。然而，由于价值由劳动所创造，雇佣的工人越少，商品的价值就越少。并且，随着劳动储备大军通过技术性失业（这是竞争过程的结果，因为资本家个人必须仿效第一个这样做的资本家以求得生存）而迅速增加时，价值的实现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作为个人，资本家竭尽全力地增加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家阶级由于该制度固有的竞争却经历着相反的遭遇。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逻辑结

十四、结 论

果，资本家通过引进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来成功地增加生产力的矛盾引起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危机的出现，是由于利润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下降的趋势，这个趋势是资本主义循环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维持生存工资，就需要保持劳动储备大军的存在，这一点在 19 世纪十分明显，高就业率的 19 世纪 80 年代，即所谓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插曲，事实上这个插曲使这一点更加明确。这个高就业的阶段出现在二战之后经济急需重建之时，而解决劳动力问题是成功完成这项任务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如果缺少国家的干预资本家阶级就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一旦完成了任务，“正常的”生产关系就被恢复，劳动储备大军又成为一种必需。卡莱茨基从惩戒工人阶级的需要这个角度分析了这一点，因为在高就业情况下，解雇就不再是一个充分的威胁和惩戒的工具，力量的优势将相对地转移到工人阶级那一边，他们就可以更加成功地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因此，工人的骚动在高就业时期达到了高潮，因为此时，在职工人受要代替他们的储备大军的威胁较小¹。几种失业理论已开始接近这种分析，甚至一些新古典主义理论对相关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含蓄的理解，但是他们倾向于从与总体制度的孤立中看这一点。在这一层次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关于失业的清晰的理论，而且该理论能够解释资产阶级必须保持劳动储备大军及劳动储备大军将导致该制度危机的原因。可见，它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尽管失业有各种伪装，但它仍然是当代所有发达工业国家很大的且日益严重的问题^源。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日渐具有全球化的性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程度日益增加），失业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是一种新现象，但在最近几年逐渐被称为全球化，一些评论者认为它代表着在福特制、后福特制、日本化以及其他观点以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调整范

例。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地区市场扩展成为国家市场，随后扩张主义又确保它扩展到国际市场，这在逻辑上来源于该制度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竞争本质。其中，竞争的力量使其现在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垄断资本主义。对此，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又显得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更能解释全球化出现的方式及其对国家作用的影响。例如，吉登斯认为协调政策现在成了国家的作用^①，从多方面来看这是正确的，因为国家必须确保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环境，如果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那么单独一个国家不能确保产生这种环境。然而，与此同时，个体的国家由于想留住位于他们国家的现存跨国公司且吸引新的企业而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这是因为多国公司在哪里开展业务的决定对东道国的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同样地，移走资本的决定将对当地经济产生严重的后果。在这些巨大的且常常多种经营的多国公司以及全球经济中具有同样说服力的因素的竞相影响下，民族和对民族忠诚的观念逐渐消失。因此，当需要国家来协作时，这些国家不得不尽力确保这些大公司留在国内，而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国家必须处理好日益增加的国内问题，如怎样为福利制提供基金，而资本主义的需要不仅密切涉及失业的大量因素，而且涉及受高等教育和健康的劳动力的问题。从而，战后处理劳动力问题的遗留症加深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矛盾，引起了福利制国家的危机，危机解决的方法在政治上是令人不快的：要么增加税收（这将降低消费），要么改变提供福利的方法。至少从短期来看，二者在政治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在工人阶级期待着国家为他们提供作为权利所应得到一切的情况下，对工人阶级进行道德的再教育将花费太长的时间。因此，在重建经济时期所采取的政策加深了

^①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剑桥，1998年。

十四、结 论

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方面是通过日益增加的失业率和伴随的社会不平等的加深（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国家用税收来实现已被工人所接受的福利水平的承诺，而这些税收通过间接的方式落到就业者和所有工人阶级的身上。另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在各国竞相吸引跨国公司参与本国经济建设的条件下，全球经济是否仍能承担起福利制国家的重担；一般说来，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竞争优势，比如低工资、低税收，国家没有复杂福利事业导致的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

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众不同的方法无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还是在解释当代趋势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更清晰更符合逻辑的分析。我的观点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比辩护该制度的新古典主义，又比绥靖政策的社会民主主义更具有说服力。所以，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还是作为一种提高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剥削本质的社会意识的方法，马克思的学说对于当代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仍然大有裨益。

注 释

一、绪 论

按照世界银行所规定的把年收入 100 美元定为绝对贫困的标准，在 1990 年，全世界有 10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有 5 亿人的人均收入低于每年 100 美元（阿特金森等编，1995 年，第 1 页）。另外，全球大约 1/3 的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的收入只占全世界收入的 1/3，而全球有 1/3 的人口生活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他们的收入占全世界收入的 2/3（舍尔沃，1995 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民主的概念不应同政治民主相混淆。如果后者暗示每一个人被赋予同别人相同的选举权的话，那么这种相同则不适用于经济民主。在经济民主中，选举权（例如货币单位）被不平等地分配，因而富人对生产的要求比穷人有更多的优先权。例如，生活在街上的人们需要住宅；在建筑业工作的许多人被解雇；可利用的资本以没有卖掉的砖的形式存在；被纳税人资助的土地被“搁在一边”而荒废掉，在那里，作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一部分，没有生长出任何东西。于是，一种需求存在，稀有资源被闲置，但由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被从经济制度中剥夺了选举权而不能进行选举，使得“市场”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个混淆实际上主要源于这个事实，尽管《资本论》第一卷在 1867 年出版，由于马克思逝世于 1883 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接下来整理那些几乎难以辨认的手稿，把它们作为《资本

论》第二卷于 1885 年出版。而《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远未完成，但恩格斯于 1895 年将它编辑出版。另外，马克思所设想的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第四卷，以《剩余价值理论》的书名出版，其内容分布于第三卷中。

二、马克思的方法

“矛盾”这个词在这儿不是指逻辑错误，而是指转化成它们的一个部分的实体的两个内部冲突的力量，在他以黑格尔的形式用这个词时，已造成了对他的作品的许多误解。

在 1901 年罗塞舍尔所著的《辩证法的神话：重新解释马克思—黑格尔的联系》（伦敦，企鹅出版社，1901 年）一书中能够看到一个有用的争论摘要和一个可替换的翻译。

在这里，马克思讨论了史前的概念，所谓史前在这里是指人类处于朝着逐渐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盛行的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的方向不断前进的状态。

三、价值理论

关于这一点，琼·罗宾逊认为近代的经济学家很小心地去避免这样的幼稚，他们把效用看作是序数而不是基数（而许多人仍然把它当作基数），这就是说，他们把消费者看成是拿着商品通过竞争性的测验，然后去选择那些得最高分的商品的人们（罗宾逊，1953 年）。

索耶解释说，已经变成新古典主义正统观念的基数效用方法是指这样的效用是不可测量的，但是两个产品的价格比与两个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将是相等的（索耶，1953 年）。

布鲁尔（1953 年）认为，没有商品交换，而同时有劳动交换，自给自足的公社能够存在，罗宾逊·克鲁索在没有曼·星期五（原始社会）出现的情况下，没有劳动分工也能进行有用的劳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不认为商品会以同它们相对应的价值成比例的比率进行交换，总的来说，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他把价格同价值的比例看作是一个简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则用这一假设去解释价格是怎样与价值相联系的。

这里暗示鉴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最低生活水平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而，生存的意思是，这个工资在当今社会能够保持劳动者的家庭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一般的生活水平，它不是一个提供固定生活标准的固定收入水平。

虽然“商品”这个词在现代经济学中可以用与其同义的一个产品或一件货物来代替，因为马克思所说的产品和商品是使用价值，一个产品只有当它体现一种社会关系，也就是一种社会价值时才获得“商品”的形式。因而，对于马克思而言，产品是一个物质实体，它是一个抽象物。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的生产关系体现在物中，社会关系的概念呈现为物的形式就被马克思称为“商品拜物教”。

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以及与其相关的劳动价值论，已经争论许多年了，但并没有得出结论（参见高戈，莱伯曼，摩塞利，霍斯顿，莫胡）。

四、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因为我们在第二章看见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的过程可以用简单商品生产来表示，而简单商品生产则用流动资本来表示。

流动资本是指那些投入在一个单一的生产过程中被完全利用的资本，而固定资本是指那些投入在几个生产过程中发生损耗的资本。

萨伊定律所指的是在流动资本的循环过程中，在任

何情况下 超越记忆

五、转形问题——一些复杂的迂回

恩拉地斯·冯·鲍尔特凯维兹于 1891—1892 年发表了两篇关于转形问题的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德国《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献》，1891 年第 1 期和 1892 年第 1 期上，第 2 篇文章发表在德国《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92）上，这两篇文章被翻译成英文，首先刊登在斯威齐编著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一书的附录中。

恩德赛指出这个定理由置盐信雄（1890）和森岛通夫（1890）和沃尔夫赛特（1890）提出。霍华德和金（1890）认为这个定理的原创者是乔格·冯·格拉索夫（1890）在 1890—1891 年提出的，比塞顿要早（1890）。

参见霍吉森。

事实上，森岛通夫看到了马克思和瓦尔拉斯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家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斯的资本积累理论都应该被冠以一般经济均衡的现代动态理论之父的美誉。”（森岛通夫，1890，第 1 页。）

六、资本主义的变动性

英国历史的这段插曲和武士道在 1868 年明治维新后的命运的相似性是相当明显的。然而，日本封建幕僚阶层的遣散并不仅仅在促进无产农民数量增长方面证明了对经济发展的好处。可以认为，在三个主要的经济分支中，它形成了具有相同文化和伦理因素国家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基础，即政府、财政和产业。这使得能够在各阶级合作的国家里通过用孔子的特权阶级的武士道的道德标准和国家宗教压迫工人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可能在那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 恩哈蒙德和 恩哈蒙德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885年出版的《农村劳动者》，另外在相同领域著名的作品还有吉尔伯特·斯莱特（即詹姆斯·斯莱特）的《英国农民和圈地运动》（1880年）以及阿瑟·扬（即阿瑟·扬）的《十六世纪的农业问题》。（对截止到1885年关于圈地运动的更多的深层次的分析文章见明戈，1885年）

但这并不是说这是资产阶级形成的唯一方式，随着更多国家市场的出现，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农业，这意味着当一些有土地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后代变成资本家时，一些工匠也变成了资本家。

这一点可以单独地写许多东西，对于俄国在革命时期只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列宁已经认识到了，并试图通过重写马克思关于这种情况的理论来迎合这一事实。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应由资本主义作为向导直到它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因而他寻求重新引进市场交换、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不幸的是，这个新经济政策由于列宁在1924年去世而终止于它的早期阶段，随后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历史改变了方向，它的经济转向了重工业并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七、资本积累和技术更新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这实质上是假设在这个制度中没有技术变化。

在这里，在社会学的动力本质和个别资本家的目标方面，同博默相联系的管理学理论都是非常相似的。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资本家的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这也必然适用于价格领域，因为如果一个资本家通过革新，以更低的成本来生产，那么这个资本家就能通过仍旧以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这个商品，而得到更多的利润。

八、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产品实现危机

缺乏对资本的组成部分的三个概念重要性的估计在赛德·菲洛（1928）以及法因和哈里斯（1929）那里被提及。

摩塞利（1928）在这一点上不同意格林的意见，他认为在19世纪 50年代利润水平的下降是同雇用非生产性劳动者相关联的，而在后 50年利润水平的上升则是同非生产性劳动者相对增长的放慢相联系的。这个争论在过去的 70年一直在继续，一些早期的重要文献是格林和萨特克利菲（1928）、威斯考波夫（1928）、沃尔夫（1928）、莱伯曼（1928）和摩塞利（1928）等所著的。

克拉克（1928）指出，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去确定他作为一个工业家的关于固定资本替换的周期率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适合于当时正在评论的关于周期的历史相关性的情况。

九、米哈尔·卡莱茨基和皮罗·斯拉法

例如，蒙吉奥维认为“斯拉法为之献出生命的理论工程从 1936年起就同一种仪器的开发相联系”（蒙吉奥维 1936，第 100页）。科尔认为卡莱茨基的著作是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的应用，他试图去解释“在他们历史的具体的形式中”资本主义的矛盾（科尔，1936，第 15页）。在罗宾逊（1936，第五章）、哈科特（1936，第十五章）和哈科特（1936，第四部分）中也有论述。

这个说法经常被认为是由卡莱茨基提出的，但是琼·罗宾逊在讨论总实际利润的确定时指出：“这个说法是由卡莱茨基总结的（我在英文出版物中没有发现）：工人花他们挣的，而资本家得到他们花的”（罗宾逊，1936，第 100页）。而索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这……引申出一个著名的格言即资本家挣

得他们消费的，而工人消费他们挣的”（索耶斯，1905）。

獭哈科特写到：“这是典型的斯拉法的姿态，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用，他在墨索里尼囚禁葛兰西时，在米兰为葛兰西开了一个无限期的赎购账户”（哈科特，1960）。

灏同上。

纒如果产出不断变化，固定按规模成比例收益将是明显的，但是，斯拉法没有考虑这个可能性。

迂这代表着被斯拉法运用的系统中的更加复杂的一个，但不是最复杂的。

十、垄断资本主义

纒这些采用了纵向结合、横向结合以及企业集团的形式，其重点是放在依靠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特殊形式上。例如一些产品被淘汰了，那些制造它们的公司则去寻找其他的生产地以及通过企业吞并进行多种经营。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以后的阶段里，吞并的形式变得比纵向结合或横向结合更加普遍。

圆食利者的讨论导致了列宁把这个阶级描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寄生虫，这个阶级以其他人的生产性活动为生，而他们只需在他们的购物券上剪个孔，这里指他们靠股票分红收益赚钱。而我们认为他指的是在世纪之交持有股票的大量增加因而把这个不断增长的数量与这个寄生虫阶级联系到了一起。

獭例如，阿若诺维茨和索耶（1905），汉那和凯（1905），钱德勒（1905），萨波（1905），沃尔西（1905），载自克拉夫茨和伍德沃德（1905），莫舍，载自琼斯和科比（1905）。

灏据估计，到 1905 年，长期的海外投资的股票已达 100 亿美元，是当时的第三大的直接投资形式。

纒参见欧布恩（1905）和奥荷玛（1905）。

迂参见帕尼克（1905），奥巴斯（1905），考如 原怀特，载自

米奇和格里费·史密斯（1988）编辑的相关著作。

这不是说吉登斯在他的评论的任何阶段都在从事马克思的研究。他当然没有这样做，但是大量的前后一致的论证实质上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政府的改变是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引发的，而不是以政府的社会民主理想作为动力推动的。

十一、失 业

这一点已被 20 世纪 50 年代 英国 菲利普斯所建造的水力发动机的原理所证实，这个机器是凯恩斯经济中环流模型的代表。在这个机器的底部有一个水箱，它象征国民收入的水平，水在回到水箱之前在绕着机器中的部件流动时要经过漏出和注入，漏出和注入能够通过使用操纵杆而改变，从而来显示就税收、储蓄、政府支出、投资、进出口而言，变化量是怎样影响国民收入水平的。因而它代表着专家的观点，即需要通过政府拉动正确的杠杆来提高国民收入。

应该指出，尽管 晕厥的概念与弗里德曼·菲尔蒲斯（1983）的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有惊人的相似，而其重要的不同在于，不像 晕厥，晕厥不是被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的作用所决定。另外，可以认为，弗里德曼 晕厥的定义似乎拥有同一个在充分就业状态下的经济相符合的特征（特维斯克，1988）。

斯科莱潘蒂指出“静态通货膨胀的假设，而“动态通货膨胀”是指动态的 晕厥的假设。

关于“当局者——旁观者”模型的一个充分的讨论可以在林德贝克和斯诺（1980）、克拉斯和奥斯沃德（1980）、林德贝克和斯诺（1989）写的文章中看到。

拉沃依（1987年和 1988年）在卡莱茨基（1983）的模型中检验了这个方面。

十二、公共部门

恩格斯在加尔布雷思在讨论国家民主时引入了“满意的大多数”的思想。这是主流政治团体目标的政策，因为那些投票者将选择他们的政府。那些没有从经济制度中获益的投票因而没有任何影响，社会的这部分群体事实上被剥夺了选举权。政府有责任通过它的竞选纲领提供低税收、法律、法令，以推进那些满意者地位的改变（加尔布雷思，1980）。

事实上，在英国，工党的竞选能力依赖于他们对大部分媒体的控制，因而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公共舆论和主流思想的影响力。

高戈批评了那些忽视工人利益的人，这些利益从工人阶级的压力和政府的反对中产生，其目的是在这种压力下去保卫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福利国家的扩展代表了工人的真正利益（高戈，1980）。

例如，马克思分析了工厂法令，认为在竞争过程阻碍了资产阶级采取有利于它作为一个阶级和个体的措施的情况下，国家对资产阶级整个利益的干涉是必要的。在工厂法的例子中，一个资本家减少工时，将导致他的竞争地位的下降，其他人将不会就范，而所有资本家共同减少工时则很可能会使他们都受益。

十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另外，1971年，英国非付税石油的利润是100亿英镑，而石油公司只有100亿英镑的利润没有付税，石油公司则为100亿英镑的利润付了100万英镑的税，而100亿英镑的利润没有付税（奥尔福德，1980 第100页）。

在这个报告出版以后，福利国家这个词已被普遍使用了，尽管这个词以前就已被创造出来了，但是贝弗里奇不喜欢这个词

而宁愿用“社会服务国家”的说法（萨恩，1992，第 104 页）。

林德贝克（1990）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社会救济金的存在将会改变社会标准，以至于由于它们将变为一种应得的权利而使得依靠救济金生活的耻辱逐渐消失。

以前公有企业的净资金需求是公有企业的借款需求。

十四、结 论

这不是适当的媒介去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定义。世纪伊始，这个在民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是仍未解决的问题之一。然而，鉴于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这种过渡的方式是不可预测的，如果这场辩论依赖于“革命”这个定义的话，我们必须记住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发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个时期，紧接着是货币主义的革命。按照这个观念，革命代表着正统观念的改变，这是一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引起的，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

在第一个例子中，一些技术的引进将使用工多样化。例如，个别公司制造计算机一开始要雇用工人，这将增加雇佣工人的数量。然而计算机的运用将意味着对工人的取代，如在银行部门，因而，其总体效应将是雇佣工人的减少。

最近几个工人同雇主争论的例子已经全部为失业工人的例子所取代。这个最高姿态的插曲可能是在 1975 年新闻国际的印刷工人和在 1976 年的裁缝的工人的遭遇。

应当记住，在英国根据失业的定义和数据的收集方式，关于失业的官方数字易于发生较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会产生减少官方划分的失业者的人数的效果。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在失业水平和劳动力的储备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专业术语

抽象劳动：指劳动力在创造价值中的劳动的共同属性。

加速器模型：这是一个假设，即投资的水平会随着产出的变化而直接改变。因而它指在任何产出水平上，投资将与产出的变化成正比。

总需求：指在一个经济结构中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

总供给：指在一个经济结构中对商品和服务的总供给。

平衡增长：指在一个经济结构中，所有主要的经济集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相同的百分比增长。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不大。

资产阶级：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资产阶级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

布雷顿森林：二战后盟国于 1944 年 9 月在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创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了固定汇率制，试图在战后时期稳定世界贸易体系。

资本品：指用于生产的商品储备，它本身可以被生产出来。应该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也指有形资本的拥有者。

周转资本：一般指运转中的资本，它包含在库存和生产过程中的那部分资本。

商品：指一种货物或服务，它可以通过市场交换买到。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劳动力和货币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但它们是商品。

比较优势：指一个国家应该生产出口那些比别的国家有更多

比较利益的商品和服务，而进口别的国家能够生产的具有更大比较利益的商品和服务。因而一个国家应该专门生产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

不变资本：指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被损耗的那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又被转移到产品的价值中去。

规模报酬不变：指当生产规模扩大时，单位商品成本却固定不变。

合作主义：指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试图去形成一个一致意见的决策过程。

折旧：指资产由于磨损而造成的价值的减少。

劳动分工：指工人的专业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工作与生产过程的特定方面相联系，而不是与所有方面相联系。

规模经济：指生产的增长引起成本的减少，其原因是生产成本的增长小于产出的增长。

交换价值：指在商品市场中，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比例。

固定资本：指用于商品生产过程中的持久耐用的商品如厂房和机器等。

自由贸易：指没有关税和配额等壁垒的国际贸易。

领导权：指一个国家（或某类领导集团）根据盛行的观点和准则统治其人民。

创新：指引进新的生产过程或新产品，它代表着研发的最高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致力于通过向遭受严重收支平衡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贷款来稳定国际货币系统的组织。它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的。

劳动力：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不得不出卖的商品，更确切地说是在从事劳动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可获取食物仅以算术级数增长。这就造成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要高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趋势，其结果是人类将面临饥荒、疾病、战争和死亡。

边际学派：其思想是通过为具体的变量寻找优化的变量来分析研究优化行为，例如通过个体消费者使效用最大化，通过公司使利润最大化，通过决策者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寡头垄断：指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在那里少数几个企业在产出和雇工方面占有一个很大的比例。

资本的价值构成：指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

完全竞争：一种理论上的市场结构，它假设许多买方和卖方都有充分的信息和同类的产品，并无进入市场的壁垒。其结果是没有一个生产商能够制定产品的价格，所有生产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必须自己决定产出水平使其利润最大化。

原始积累：指资本家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历史过程。

贸易保护主义：指用人为的贸易壁垒如关税和配额来减少进口水平，从而保护本国产品免受外国竞争的威胁。

剥削率：指产品的剩余价值和实际工资之间的比例。

萨伊定律：简单地说就是“供应自动产生需求”。换言之就是所有生产出的商品总价值与所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总是相等。当有过多的需求或过多的供应使资源不能充分被利用时，市场机制将使其消除。根据萨伊定律，失业和过度生产是不可能长久地存在的。

简单商品生产：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生产方式。因为在简单商品生产下，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他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劳动力不是商品，交换是按照生产商品所需劳动的数量来进行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假设使用现代机器，在平均的劳动技

能和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剩余产品：指从所有产品中扣除实际工资、机器折旧和原材料替代成本后剩余的产品。

剩余价值：即剩余产品的价值。它是被资本家占有的、被工人创造的价值。

使用价值：指商品用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自然属性。

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它是指通过消费一定量的商品所获得的个人满足。它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虽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它是可以测量的，但实际上用确定的单位是无法进行测量的。消费者被假设能够凭借偏好或漠视来评估商品的价值，然后去推断一个商品比其他商品是否有更大的效用。

可变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议创建的，二战后其最初的任务是向欧洲国家提供经济重建的援助。

世界贸易组织：以前为关贸总协定，它是通过谈判来减少贸易壁垒和执行协议规定的组织。

符号的涵义

酝 货币

蕴 劳动力

悦 商品资本

运 商品生产的必要资本

糟 不变资本

增 可变资本

泽 剩余价值

λ 总劳动价值

则 利润率

◁ 剥削率

糟乙 已用资本

π 利润

Ψ 成本价格

憎 产出

噪 资本有机构成

孕 生产价格

砸 总利润

早 经济活动率

译名对照表

粤译社	艾伦
粤译社	奥尔福德
月译社, 杂译社	斯坦莱·鲍德温
月译社	巴兰
月译社	巴尔
月译社	贝卡特
月译社	贝弗里奇
月译社, 杂译社	欧内斯特·贝文
月译社, 原译社	庞巴维克
月译社	布思
月译社	鲍尔特凯维茨
月译社	布鲁恩
悦译社	卡斯特罗
悦译社	查默斯
悦译社	钱伯斯
悦译社	克洛
悦译社, 员译社	科尔
悦译社	康斯坦丁
悦译社	考林
悦译社, 杂译社	莫里斯·多比
悦译社	杜梅尼尔
悦译社, 杂译社	约翰·亨德里克

艾赫巴

达兹·费纳卡匹特

法恩

弗雷

米尔顿·弗里德曼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皮尔朗吉罗·葛莱戈纳尼

高根

吉登斯

戈里克

格林

安东尼奥·葛兰西

格雷

哈里斯

罗依·哈罗德

鲁道夫·希法亭

赫斯特

赫顿

杰文斯

詹金斯

米哈尔·卡莱茨基

肯伍德

克莱因克内希特

莱亚德

列维

利皮茨

拉菲德

译名对照表

蘊梁德译 郎	卢卡奇
蘊梁德译 罗萨·卢森堡	罗萨·卢森堡
西素德译	马尔萨斯
西素德译	曼
西素德译, 粤德译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西素德译	姆德·莫特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罗纳德·林德利·米克
西素德译	曼德尔斯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卡尔·门格尔
西素德译	明戈
西素德译	莫克
西素德译	森岛通夫
西素德译	那卜勒斯
西素德译	尼森
西素德译	帕累托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路易吉·帕西纳提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庇古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大卫·李嘉图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琼·罗宾逊
西素德译	朗特里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赛德·原菲洛
西素德译	萨缪尔森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保尔·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西素德译	索耶
西素德译	萨伊
西素德译	斯克莱潘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杂志社

塞顿

谢克

西斯蒙第

亚当·斯密

皮罗·斯拉法

斯蒂德曼

施泰因德尔

斯威齐

泰索普

塞恩

宰恩阳普森

特威斯克

特耐尔

泰莱科特

瓦格纳

瓦尔拉斯

文格尔

科祖·莱特

耶菲

参考书目

阿若诺维茨和 索耶：《大公司：英国积聚和兼并的理论和经验》，伦敦， 1969年。

辛 奥尔福德：《1914年以来世界经济中的英国》， 1966年。

艾伦：《圈地运动和自耕农：1500—1800年间中南部农业的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8年。

奥特和 克里斯多：《政治经济学》， 1964年。

奥特维特和 考波夫：《不受限制的世界市场》，载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 1期， 1967年秋，第 1—10页。

安德森：《解释长期的经济改变》，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9年。

阿莱斯蒂斯和 索耶主编：《激进政治经济学》， 1969年。

阿特金森， 利维赛和 密尔沃德主编：《应用经济学》，伦敦， 1969年。

沃巴斯：《竞争：工业变化的经济学》，牛津， 1969年。

巴兰和 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社会和经济秩序》，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 1966年。

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 1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詹姆斯·巴斯勒和 曼萨沃特里：《关于卡莱茨基定价等式的一个现存的解法》，载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十六卷，第 猿期，员源年春，第 源缘- 源愿页。

詹姆斯·巴克斯特：《员世纪后期和 员世纪的英国土地所有制：争论和问题》，载自《经济史评论》，第三卷，第 缘苑- 缘员页，员苑年。

詹姆斯·伯格主编：《员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亨德里克·范·丹·泽普格，马塞奎出版社，员苑年。

詹姆斯·布劳格主编：《经济理论回顾》，第 缘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员苑年。

詹姆斯·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员），斯威齐编，员苑年。

詹姆斯·布莱德利和 詹姆斯·哈沃德主编：《古典的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伦敦，企鹅出版社，员苑年。

詹姆斯·布鲁尔：《马克思 资本论 导读》，剑桥大学出版社，员苑年。

詹姆斯·布鲁尔：《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批判的考察》，伦敦，伦敦大学亚非拉学社，员苑年。

詹姆斯·拜恩：《社会排斥和资本主义 跨越时空的劳动大军》，载自《批判的社会政策》，第十七卷，员苑年，第 缘- 缘页。

詹姆斯·陈森：《卡莱茨基定价等式的解决方法的存在及其独特性》，载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十六卷，第 猿号，员源年春，第 源员- 源页。

詹姆斯·钱伯斯：《工业革命中的圈地运动和劳动力供给》，载自《经济史评论》，第三卷，第 猿- 猿页，员年。

詹姆斯·钱德勒：《规模和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态性》，剑桥，企鹅出版社，员年。

詹姆斯·霍顿：《调节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载自《剑桥经济学》
员年

参考书目

杂志》，第二十一卷，第 308-318 页，1957 年。

詹姆斯·切波：《凯恩斯模型的卡莱茨基根源》，载自《牛津经济论文集》，第 1 期，第 1-10 页，1957 年。

詹姆斯·契蒂：《导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方向和实际的相关理论》，载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 1 期，第 1-10 页，1957 年秋。

詹姆斯·克拉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伦敦，企鹅出版社，1957 年。

詹姆斯·克雷蒂主编：《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詹姆斯·克雷蒂译，企鹅出版社，1957 年。

詹姆斯·康斯坦丁：《战争中的失业问题》，詹姆斯·克雷蒂译，企鹅出版社，1957 年。

詹姆斯·克拉斯和詹姆斯·奥斯沃德：《论工会优先和劳动市场模型：当局者和旁观者》，载自《经济学杂志》，第 67 期，第 1-10 页，1957 年。

詹姆斯·考林：《垄断资本主义》，伦敦，企鹅出版社，1957 年。

詹姆斯·克拉夫茨和詹姆斯·伍德沃德主编：《1957 年以来的英国经济》，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 年。

詹姆斯·戴维德森：《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詹姆斯·戴维德森译，企鹅出版社，1957 年。

詹姆斯·都伯：《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思想和经济理论》，剑桥大学出版社，1957 年。

詹姆斯·德赛：《马克思经济学》，牛津，詹姆斯·德赛译，1957 年。

詹姆斯·杜梅尼尔：《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詹姆斯·杜梅尼尔译，巴黎，詹姆斯·杜梅尼尔译，1957 年。

詹姆斯·邱宁：《全球化、经济重组和发展》，日内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57 年。

詹姆斯·伊特威尔、詹姆斯·米盖特和詹姆斯·曼主编：《马克思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学》，伦敦，~~配齐译社~~ 员源年。

~~猿源年~~法拉里和 ~~粤源~~威里亚多：《不对称信息和凯恩斯的
投资理论》，载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十六卷，第 猿期，
第 猿猿- 猿源页，员源年春。

~~源年~~法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伦敦，~~耕普社~~ ~~粤源~~年，
员源年。

~~源年~~法因和 蕴哈里斯：《重读资本论》，~~猿源~~社 ~~配齐译社~~
~~猿源~~社，员源年。

~~源年~~法因和 粤莫芬：《宏观经济学与垄断资本主义》，
月源社，宰源年。

~~源年~~弗洛德和 阅麦克克劳斯凯：《自 员源年以来的英国
经济史（员源— 员源）》（第二卷），第 圆版，剑桥大学出版社，
员源年。

~~源年~~弗洛德和 阅麦克克劳斯凯：《自 员源年以来的英国
经济史（员源— 员源）》（第三卷），第 圆版，剑桥大学出版社，
员源年。

~~源年~~弗雷：《货币价值、劳动力价值和马克思的转形问题》，
载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 员期，第 猿- 源页，员源年。

~~源年~~弗雷：《理解资本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剑桥，
~~配齐译社~~ 哈佛大学出版社，员源年。

~~源年~~弗里曼主编：《马克思论经济学》，~~猿源~~社 ~~配齐译社~~
~~猿源~~社，员源年。

~~源年~~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美国经济评论》，第
缘期，第 员- 员页。

~~源年~~加尔布雷思：《抛弃 粤源的时间》，载自《经济观
点杂志》，第十一卷，第 员期，宰源，第 怨- 员页，员源年。

~~源年~~加尔布雷思：《满足的文化》，纽约，~~猿源~~社 ~~配齐译社~~
~~猿源~~社，员源年。

参考书目

缘幸圃脍葛萨德：《缘怨一 缘怨英国的失业：一个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缘怨年。

缘怨脍高根主编：《关于兼并和并购的著述》，牛津，缘怨年。

缘怨脍告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剑桥，缘怨年。

缘怨脍告奥万尼尼：《政府债务管理》，载自《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三卷，第源期，第源-缘页，缘怨年。

缘怨脍伐伦耐斯特和 脍黑尔斯主编：《福利国家：社会消费经济学》，第圆版，牛津大学出版社，缘怨年。

缘怨脍伐利克和 脍依赫巴：《转形问题：一个讨告》，第二十一卷，第圆源-猿页，缘怨年。

缘怨脍伐林：《总体有利真的重要吗？》，载自《剑桥经济杂志》，第二十一卷，第缘-远页，缘怨年。

缘怨脍伐林和 脍萨特科里夫：《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榨取》，缘怨年。

缘怨脍古德曼、脍约翰逊和 脍韦伯：《英国的不平等》，牛津大学出版社，缘怨年。

缘怨脍高戈：《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伦敦，缘怨年。

缘怨脍沃诺：《现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经济学》，牛津，缘怨年。

缘怨脍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缘怨年。

缘怨脍格雷和 脍姆德莫特：《大合并的破坏：吞并战略、斗争和控制》，伦敦，缘怨年。

缘怨脍若特：《私营企业财政主动性经济学》，载自《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十三卷，第源期，第缘-远页，缘怨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远藤正古莱浦：《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和长周期》，载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十一卷，第 1 期，第 181-191 页，1987 年。

远藤重敏那和 广野重凯：《现代工业的积聚》，伦敦，西泽书店出版，1987 年。

远藤重敏那哈科特：《评论和选择：关于最近的(不是目前的)争论》，载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十九卷，第 1 期，宰野重敏那第 151-161 页，1987 年。

远藤重敏那哈科特：《社会科学帝国主义者》，普鲁·科尔编，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

远藤重敏那哈曼：《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国际社会主义》，第 1 期，第 181-191 页，1987 年夏。

远藤重敏那豪德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个极端的理论》，牛津，西泽书店出版，1987 年。

远藤重敏那霍斯顿：《生产性——非生产性劳动：在和平中休息》，载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十九卷，第 1 期，第 151-161 页，1987 年。

远藤重敏那霍华德和 广野重敏那：《马克思经济学史，1987-1988》(第二卷)，伦敦，西泽书店出版，1987 年。

远藤重敏那霍华德和 广野重敏那：《马克思经济学史，1988-1989》(第一卷) 伦敦，西泽书店出版，1987 年。

远藤重敏那霍华德和 广野重敏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第 1 版，伦敦，西泽书店出版，1987 年。

远藤重敏那霍华德和 广野重敏那主编：《马克思经济学：说明和评论选读》，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

远藤重敏那赫斯特和 广野重敏那普森：《正在讨论中的全球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 年。

远藤重敏那赫顿：《我们所在的国家》，伦敦，西泽书店，1987 年。

远藤重敏那泰索普：《资本主义和它的未来：关于调节、政府和统
1 期

参考书目

治的评述》，载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 7 期，第 251-261 页，1987 年。

詹姆斯·柯林斯和 安德鲁·科比主编：《竞争和国家：19 世纪英国的政府和商业》，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5 年。

詹姆斯·康南卡：《马克思的经济学》，牛津，1986 年。

詹姆斯·卡莱茨基：《发展经济学论集》，伦敦，1954 年。

詹姆斯·卡莱茨基：《资本主义转形的最后阶段》，伦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0 年。

詹姆斯·卡莱茨基：《资本主义经济变动性论文选》，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 年。

詹姆斯·伍德和 詹姆斯·拉菲德：《国际经济增长，1950-1980》，第 7 版，伦敦，1986 年。

詹姆斯·科尔：《马克思和卡莱茨基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第 1 期，第 1-11 页，1987 年。

詹姆斯·凯恩斯（193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 年。

詹姆斯·克莱克耐特和 詹姆斯·格尔：《经济全球化的神话》，载自《剑桥经济学杂志》，第二十二卷，第 1-11 页，1988 年。

詹姆斯·克里曼和 詹姆斯·戈龙：《转形无问题 and 无转形问题》，载自《资本和阶级》，第 7 期，第 1-11 页，1988 年。

詹姆斯·科祖·莱特和 詹姆斯·罗索：《供选择的事物过多而无从下手了吗？跨国公司和国际生产地理学》，载自《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第十四卷，第 1 期，第 1-11 页，1988 年。

詹姆斯·科里德特、詹姆斯·迪克和 詹姆斯·斯科拉姆鲍姆：《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资本主义起源中的乡村工业》，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 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科里斯勒和 月 麦克法兰：《米哈尔·卡莱茨基论资本主义》，载自《剑桥经济学杂志》，第十七卷，第 103-108 页，1957 年。

恩格斯、拉格：《关于利润率的概念》，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十卷，第 1 期，第 107-112 页，1957 年。

恩格斯、莱伯曼：《利润率下降：一个新的经验研究》，载自《科学和社会》，第五十七卷，第 1 期，第 103-108 页，1957 年。

恩格斯、莱伯曼：《价值、技术变革和危机：马克思经济理论探究》，纽约，1957 年。

恩格斯、拉莱米、恩格斯、恩格斯和 恩格斯、斯塔特波勒斯：《在卡莱茨基模型中税赋对于私人无固定住所国家投资的影响：一些经验的证据》，载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十九卷，第 1 期，第 103-108 页，1957 年。

恩格斯、拉沃依：《在一个卡莱茨基短期模型中的实际工资、就业结构和总需求曲线》，载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十九卷，第 1 期，第 103-108 页，1957 年冬。

恩格斯、拉沃依：《卡莱茨基增长和分配模型中的横向假设和生产率正常利用率》，载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十八卷，第 1 期，第 103-108 页，1957 年。

恩格斯、拉沃依：《卡莱茨基的增长和分配模型和它的新李嘉图和新马克思主义评论》，载自《剑桥经济学杂志》，第十九卷，第 103-108 页，1957 年。

恩格斯、劳森：《后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和它与其他传统的联系：一个现实的角度》，载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十六卷，第 1 期，第 103-108 页，1957 年夏。

恩格斯、莱亚德：《如何克服失业》，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 年。

恩格斯、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外语出版社，1957 年。

参考书目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1年。

列宁：《关于所谓的市场问题》，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1年。

列文：《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的家庭形成》，伦敦，学术出版社，1971年。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伦敦，企鹅出版社，1971年。

李奇腾斯坦：《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价格和价值理论导读》，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

林德贝克：《家庭行为中的激励和社会标准》，载自《美国经济评论》，第八十七卷，第1期，第140-147页，1971年。

林德贝克和 斯诺：《就业和失业的当局者和旁观者理论》，剑桥，企鹅出版社，1971年。

林德贝克和 斯诺：《工资确定、失业以及当局者与旁观者的关系》，载自《美国经济评论》，第71期，第103-108页，1971年。

利皮茨：《重读所谓的“转形问题”》，载自《经济理论杂志》，第1期，第13-18页，1971年。

卢克姆博格：《资本积累》，伦敦，企鹅出版社，1971年。

麦克米兰主编：《马克思：第一个一百年》，牛津，企鹅出版社，1971年。

梅瓦林：《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和分配：斯拉法经济学导读》，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

曼德尔和 弗里曼：《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伦敦，企鹅出版社，1971年。

曼：《全球化终结了和民族国家兴起了吗？》，载自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 7 期，第 100-107 页，1976 年秋。

威廉·皮特·马库佐、詹姆斯·帕斯耐提和 罗卡戈里阿主编：《琼·罗宾逊经济学》，伦敦，1975 年。

詹姆斯·马吉森：《服务生产中的价值创造：一个关于马克思的注解》，载自《剑桥经济学评论》，第二十二卷，第 76-78 页，1975 年。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伦敦，1975 年。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伦敦，1975 年。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5 年。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伦敦，1975 年。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本·福克斯翻译，1975 年。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5 年。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大卫·芬巴茨翻译，1975 年。

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5 年。

卡尔·马克思：《1848 年至 1851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5 年。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大卫·芬巴茨翻译，1975 年。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975 年。

参考书目

纽约，~~马~~ ~~城~~ ~~考~~ ~~古~~ ~~学~~ ~~刊~~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第~~ ~~一~~ ~~页~~。

~~员~~ ~~恩~~ ~~格~~ ~~斯~~ ~~和~~ ~~马~~ ~~克~~ ~~思~~ ~~著~~：《共产党宣言》，~~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社~~ ~~出~~ ~~版~~ ~~社~~，~~北~~ ~~京~~，~~一~~ ~~九~~ ~~二~~ ~~〇~~ ~~〇~~ ~~四~~ ~~年~~。

~~员~~ ~~恩~~ ~~格~~ ~~斯~~ ~~和~~ ~~马~~ ~~克~~ ~~思~~ ~~著~~：《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 ~~九~~ ~~三~~ ~~八~~ ~~年~~。

~~员~~ ~~恩~~ ~~格~~ ~~斯~~ ~~和~~ ~~马~~ ~~克~~ ~~思~~ ~~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伦敦，~~德~~ ~~国~~ ~~工~~ ~~人~~ ~~党~~ ~~宣~~ ~~言~~ ~~译~~ ~~文~~ ~~组~~ ~~译~~，~~一~~ ~~九~~ ~~三~~ ~~八~~ ~~年~~。

~~员~~ ~~恩~~ ~~格~~ ~~斯~~ ~~和~~ ~~马~~ ~~克~~ ~~思~~ ~~著~~：《英国经济增长 员恩格— 员格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 ~~九~~ ~~三~~ ~~八~~ ~~年~~。

~~员~~ ~~恩~~ ~~格~~ ~~斯~~ ~~著~~：《现代性、后现代性或资本主义》，载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四卷，第 猿期，第 缘— 缘页，~~一~~ ~~九~~ ~~三~~ ~~八~~ ~~年~~秋。

~~员~~ ~~恩~~ ~~格~~ ~~斯~~ ~~著~~：《原始工业化：理论和现实总报告》，第八届国际经济史会议，“粤”主题（布达佩斯），第 猿— 猿页，~~一~~ ~~九~~ ~~三~~ ~~八~~ ~~年~~。

~~员~~ ~~恩~~ ~~格~~ ~~斯~~ ~~著~~：《原始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载自《经济史杂志》，第三十二卷，第 圆— 圆页，~~一~~ ~~九~~ ~~三~~ ~~八~~ ~~年~~。

~~员~~ ~~恩~~ ~~格~~ ~~斯~~ ~~著~~：《全球经济管理》，牛津大学出版社，~~一~~ ~~九~~ ~~三~~ ~~八~~ ~~年~~。

~~员~~ ~~恩~~ ~~格~~ ~~斯~~ ~~著~~：《员恩— 员格— 员斯— 员年英格兰的议会圈地运动：它的原因、程度和影响·序言》，~~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社~~ ~~出~~ ~~版~~ ~~社~~，~~北~~ ~~京~~，~~一~~ ~~九~~ ~~三~~ ~~八~~ ~~年~~。

~~员~~ ~~恩~~ ~~格~~ ~~斯~~ ~~著~~：《工业革命时期的圈地运动和小农场主》，~~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社~~ ~~出~~ ~~版~~ ~~社~~，~~北~~ ~~京~~，~~一~~ ~~九~~ ~~三~~ ~~八~~ ~~年~~。

~~员~~ ~~恩~~ ~~格~~ ~~斯~~ ~~著~~：《劳动价值理论中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十八卷，第 源期，第 猿— 猿页，~~一~~ ~~九~~ ~~三~~ ~~八~~ ~~年~~。

~~员~~ ~~恩~~ ~~格~~ ~~斯~~ ~~著~~：《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员恩— 员格— 员斯— 员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刁菲译，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年。

1981年 蒙吉奥维：《斯拉法的马歇尔评论：一个重新的评估》，载自《剑桥经济学杂志》第二十卷，第 100-101页，1987年。

1981年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一个价值和增长的双重理论》，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

1981年 摩塞利：《利润率和资本主义的未来》，载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十九卷，第 1期，第 1-10页，1987年。

1981年 摩塞利：《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下降》，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7年。

1981年 摩塞利：《战时美国经济中的剩余价值率的估算》，载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十八卷，第 1期，第 1-10页，1987年。

1981年 英特和 斯莱特里：《当利润影响投资和价格可以后应税收时，卡莱茨基模型中的税率和宏观影响》，载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十六卷，第 1期，第 1-10页，1987年春。

1981年 耶那卜勒斯：《转形问题的一个激进的经济修正》，载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十一卷，第 1-2期，第 1-10页，1987年。

1981年 尼森：《平民：1911-1914年英格兰的共同权力、圈地运动和社会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

1981年 奥布里恩：《全球金融融合：地理的尽头》，纽约，外国关系委员会，1987年。

1981年 国家统计局：《社会趋势》，第 10期，伦敦，1987年增补卷。

1981年 国家统计局：《经济趋势，年度增补》，伦敦，1987年增补卷。

1981年 奥麦：《无边界的世界：相互联系的经济中的权力和战略》，伦敦，1987年。

参考书目

员 著 置 盐 信 雄：《价值和生产价格》，《运 大 学 评 论》，第 圆 期，员 年。

员 著 奥 麦 洛 德：《经济学的死亡》，伦敦，云 社 出 版 社 员 年。

员 著 奥 斯 丁 斯 基 主 编：《米哈尔·卡莱茨基著作选 第二卷，资本主义 经济变动性》，牛津，悦 社 出 版 社 员 年。

员 著 奥 斯 丁 斯 基 主 编：《米哈尔·卡莱茨基著作选 第一卷，资本主义 商业周期和充分就业》，牛津，悦 社 出 版 社 员 年。

员 著 帕 尼 克：《国际经济的国家管理》，伦敦，配 社 出 版 社 员 年。

员 著 帕 森 斯：《后凯恩斯现实主义和凯恩斯一般理论》，载自《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第八卷，第 猿 期，第 源 页，员 年春。

员 著 菲 必：《方法论和经济学：一个批判的序言》，伦敦，配 社 出 版 社 员 年。

员 著 菲 力 浦：《不平等、剥削和社会主义：从分析马克思主义得来的观点》，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九卷，第 猿 期，第 猿 页，员 年。

员 著 皮 泰 利 斯：《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载自《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十六卷，第 员 期，第 苑 页，员 年。

员 著 鲍 博：《推测和辩驳：科学知识的生长》，第 源 版，伦敦，研 社 出 版 社 员 年。

员 著 罗 宾 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 圆 版，伦敦，配 社 出 版 社 员 年。

员 著 罗 宾 逊：《资本积累》，第 猿 版，伦敦，配 社 出 版 社 员 年。

员 著 罗 宾 逊：《经济学论文集》，第四卷，牛津，月 社 出 版 社 员 年。

参考书目

阿·施莱瑟：《米哈尔·卡莱茨基经济学》，伦敦，配林出版社，1971年。

阿·施莱瑟：《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城市与地区研究》，载自《城市和地区研究国际杂志》，第十九卷，第1期，第28-32页，1971年。

阿·施莱瑟主编：《资本主义的精细解剖》，莫斯科，1971年。

阿·施莱瑟：《资本主义的形式及其实质》，载自《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第六卷，第1期，第1-10页。

阿·施莱瑟：《在就业和失业中的纯当局者假设理论》，载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载自《经济研究评论》，第二十四卷，第11页，1971年。

阿·施莱瑟：《“转形问题”》，《经济研究评论》，第二十四卷，第11-12页，1971年。

阿·施莱瑟：《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转形问题》，斯凯沃茨主编，1971年。

阿·施莱瑟：《全球化国家 指向国家转形的理论》，载自《国际政治学评论》，第二十九卷，第1期，第1-10页，1971年。

阿·施莱瑟：《转形问题：一个新的解决方法的评论》，载自《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二十九卷，第1期，第1-10页，1971年。

阿·施莱瑟主编：《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

阿·施莱瑟：《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个经济理论评论的序言》，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

阿·施莱瑟：《负剩余价值的正利润》，载自《经济学杂志》，第八十五卷，第111-112页，1971年。

阿·施莱瑟：《马克思和后来者》，伦敦，1971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员德年。

员德年 斯蒂德曼等主编：《价值争论》，伦敦，灾灾年 员德年。

员德年 施泰因德尔：《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员德年，员德年。

员德年 萨波：《规模和范围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和工业资本主义变动性》，载自《经济史评论》，第四十四卷，第 缘园- 缘源页，员德年。

员德年 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载自伊特威尔主编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伦敦，配精年 员德年。

员德年 斯威齐主编：《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纽约，粤京年 员德年。

员德年 萨恩：《福利国家的基础》，匀京年，粤京年 员德年。

员德年 舍尔沃：《增长和发展》，第 缘版，伦敦，配精年 员德年。

员德年 特威斯克：《非自愿失业：一个从凯恩斯观点出发的宏观经济学》，匀京年 员德年。

员德年 特耐尔：《重新开始的圈地运动》，砸京年 第 园期，员德年春。

员德年 特耐尔：《英国议会的圈地运动》，云京年 员德年。

员德年 泰莱科特：《世界经济中的长期波动：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的危机》，伦敦，砸京年 员德年。

员德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市场权力的积聚和它对国际市场的影响》，纽约，联合国，员德年。

员德年 威斯考波夫：《马克思危机理论和战后美国经济中的利润率》，载自《剑桥经济学杂志》，第三卷，第 猿员- 猿愿页，员德年。

员德年

译者后记

本译著是我们结合硕士研究生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组织翻译的，现正式出版，对高等学校、党校、行政学院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研究，以及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评价，提供一本较新的国外参考书。本书也是作为云南省十五规划重点建设学科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项目，并得到资助出版。

本书由陈国新教授主持翻译，杨成果、袁群各译两章，并担任全书的译校；刘笑元、方德芬、刘殿臣、熊贵彬、吴莹、朱建定、金辉、魏建华、袁泽民、刘春元各译一章；刘笑元、郭燕来参加了部分校稿工作。经济学博士李德甫教授认真审读了全书译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本译著的出版得到原作者及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授权同意，并得到云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著不当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00年 源月